

1988

年

第

卷

第

7—9

期



中国青年

'88
Chinese
Youth

青年摄影家介绍

杨元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现任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理事。

《探索》杂志编辑。

杨元昌的摄影作品，多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他与林、李一行、刘大为等人，组成广东的“纪实”派，深受哲理的启发，从而赋予他的作品新的意义。他不是拍学家，却把他的眼睛赋予了艺术的色彩。



人生道路就是探索之路



同一屋檐下……

传统在停立，何时与新潮产生共鸣

等待是心灵的碰撞



生活·艺术·探索



1988.7

社 长：张希欽

总编辑：肖东升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出版

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之四）

于无声处听惊雷.....湘 牛 郑 里 2

——十年来中国青年的价值观革命

· 新闻启示录 ·

民主的故事.....光 辉 段 跃 6

我们不懂的民主.....邓 捷 8

· 中国潮 ·

创造，一个甜蜜而又痛苦的字眼.....晓 剑 18

· 走向未来读书笔谈 ·

中国青年走向未来读书笔谈有奖竞赛

获奖名单.....9

混沌之说.....王燕平 10

一双手洗另一只手.....华 尔 11

“筛选”是“剔除”与“吸取”的前提.....亦 木 12

科学家都适合参政吗？.....梅 秋 9

· 五四奖章评奖 ·

高国成的“排列组合”.....程桂林 14

一个大企业的团委书记.....一 林 16

· 当代青年 ·

不是命，靠的是努力和真诚.....王 林 22

· 漫漫人生路 ·

独步人生.....张 总 34

我要自己试试.....胡小弟 36

· 走出误区 ·

他也孤独（外一篇）.....曹明华 38

· 民主 法制 生活 ·

两个少女的恩怨怨.....王 静 26

SOS：灵魂紧急呼叫.....吕 涛 王 冰 28

· 社会一角 ·

百万富翁和他的保镖.....陈大光 罗忠玉 何大新 40

· 青年艺术家 ·

破晓.....王岳龙 24

——记中国第一名奥斯卡音乐奖获得者苏聪

· 赛场风云 ·

袁伟民与足球.....晋 鹿 30

· 科学大世界 ·

迪·博诺的思考术.....姚诗煌 42

寻找历史的真实.....朱长超 43

身高的学问.....黄煌长 33

头顶重物的奥秘.....李 荒 33

· 答朋友问 ·

致富受挫怎么办？.....赵玉强 44

学会“放松术”.....王 雁 44

· 青年呼声 ·

还我产权.....李 军 姜万信 46

· 微型调查 ·

大学生的“经商热”.....赵文涛 13

· 议论纷纷 ·

假如我捡到提包.....梅子实 45

不能一“钱”障目，不见泰山.....郭 钧 45

关键是机会均等.....肖玉明 45

· 读者 作者 编者 ·

评刊员来信.....29

· 美术与摄影 ·

群（摄影）.....陈文月 封面

青年摄影家介绍（二）——杨元昌.....封二

愿友谊天长地久.....紫 汕 47

——封面赏析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小井316号

电话：306.2288 电报挂号：6125 邮政编码：10007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总发行处：北京市邮政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2820信箱）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工商广字0297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月9日出版

于无声处听惊雷

——十年来中国青年的价值观革命

● 湘 牛 郑 里

静悄悄的革命

这是一股看不见的潜流，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找不到奇伟的瀑布似的落差，找不到惊心动魄的突变性的转折。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股潜流中的一滴水珠，自我冲刷或者相互冲刷着每个人的心灵。

这是一个价值观转型的过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且太琐碎，但也惟其是发生在大众层面的事情，是具有实践特征的俗文化的变迁，因而才愈显其深刻而不可逆。

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在对历史哲学的体认中，倾向于多因论。因此，我们绝不低估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倘若有人问：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于过去、于现在、尤其是于将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那么，不是站在反思历史长河从而探寻历史规律的立场，而是站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层面，我们会毫不踌躇地回答说：以当代中国青年为主体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心灵的觉醒。

我们很容易记住昨天的辛酸，也很容易将今天的境遇与昨天的苦难相比较，可是当我们一旦告别了昨天的自我时，那个“我”便变得陌生了。今天我们不再耻于谈钱了，可我们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我们在提到钱时是怎样的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在不再有人谈论“流氓是服装革命的先驱”了，而十年前，在服饰方面“敢为天下先”的有几个是公众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呢？4年前，获“金鸡奖”和“百花奖”的电影《红衣少女》仅仅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女中学生敢于自行其是，自我肯定的故事，便在观众中引起了心灵的震撼，而让今天的中学生再来看这部片子，恐怕是难有共鸣了。其实这一切都无需赘述，习惯于写日记的朋友，只要打开自己十年前的日记，我们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对昨天的“我”不同程度地感到吃惊、惶惑、可笑……

思想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世界近代文明史一再证明：价值观念的转型（尤其是大众性的）预示着社会发展的一条新的轨迹，同时也呼唤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重估一切价值”

价值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于人的意义，价值观则是人们对这些意义的评估和看法。人们的价值指向决定了人们的追求，从而也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的决策目标、经济、政治体制选择的指导思想。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的名言，这位跨世纪的思想家在他辞别人世80年之后的中国赢得了相当一批热心的读者，恐怕是他生前所未料及的。不过，正如有1000个读者便有1000个汉姆莱特一样，有1000个读者也有1000个尼采，当一批中国的读者接过了“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口号时，他们的内心体验、他们的渴求、他们的挑战对象同尼采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尼采的矛头指向是传统基督教的价值观，并且捎带着对新教革命以来西方的世俗化的人生和道德的愤恨；而中国人重估的则是中国的新老价值传统，在绝大多数人当中，所追求和呼唤的恰恰是世俗化。

其实，这一价值重估的过程比尼采的广泛为人所知来得更早，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展开的人生观大讨论揭开了这一序幕。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激起了上百万人的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杂志的发行量破记录地直线上升到近400万份！从版面内容上看，始而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体认，继而怀疑思索的对象扩展到人性、社会、道德、法律、艺术、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理想与现实、利己与利他等一切方面。透过讨论可以看出，人生的思路不是窄了，而是迅速拓宽了。许多空洞的东西开始被人们抛弃，许多教条的东西也不得不转向实际，理想也从“大道理”的空中楼阁里走下来。敏感地觉察到这一历史变迁的青年学子们抓住这个机会，把“重估”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

世俗化之潮

在价值观念系统中，有深层的价值观念和浅层的价值观念之分，浅层的价值观念是由深层的价值观念派生出来的，而深层的价值观念则主要体现在人对其自身内心欲求的看法。按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有5种需求：



生理、安全、归宿、尊重、自我实现；按过去我们的一个更为粗陋的划分，人则有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这些需求持什么态度，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哪些比较高尚，哪些比较卑下？这种判断构成了我们深层的价值偏好，从而也决定了我们在生活中具体的价值选择。例如，倘若我们将物质需求视为卑下的，那么，对珍肴美味的渴望便会被当作耻辱性的动机，豪华的羊毛地毯在我们的眼中也会黯然失色。

中国的新老传统在价值选择上都带有禁欲、制欲、寡欲的色彩。儒家主张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道轻食，把人的自然欲求贬为最大的恶。有人问朱熹：吃饭是天理还是人欲？朱熹回答说：饿了想吃，是天理；不仅想吃，而且想吃好，则是人欲；而人欲当在根除之列。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虽然同儒家教义有很大不同，但前者主张“四大皆空”，后者主张“返朴归真”，在制欲、禁欲、寡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于无声处听惊雷

——十年来中国青年的价值观革命

● 湘牛 郑里



静悄悄的革命

这是一股看不见的潜流，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找不到奇伟的瀑布似的落差，找不到惊心动魄的突变性的转折。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股潜流中的一滴水珠，自我冲刷或者相互冲刷着每个人的心灵。

这是一个价值观转型的过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且太琐碎，但也惟其是发生在大众层面的事情，是具有实践特征的俗文化的变迁，因而才愈显其深刻而不可逆。

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在对历史哲学的体认中，倾向于多因论。因此，我们绝不低估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倘若有人问：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于过去、于现在、尤其是于将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那么，不是站在反思历史长河从而探寻历史规律的立场，而是站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层面，我们会毫不踌躇地回答说：以当代中国青年为主体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心灵的觉醒。

我们很容易记住昨天的辛酸，也很容易将今天的境遇与昨天的苦难相比较，可是当我们一旦告别了昨天的自我时，那个“我”便变得陌生了。今天我们不再耻于谈钱了，可我们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我们在提到钱时是怎样的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在不再有人谈论“流氓是服装革命的先驱”了，而十年前，在服饰方面“敢为天下先”的有几个是公众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呢？4年前，获“金鸡奖”和“百花奖”的电影《红衣少女》仅仅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女中学生敢于自行其是，自我肯定的故事，便在观众中引起了心灵的震撼，而让今天的中学生再来看这部片子，恐怕是难有共鸣了。其实这一切都无需赘述，习惯于写日记的朋友，只要打开自己十年前的日记，我们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对昨天的“我”不同程度地感到吃惊、惶惑、可笑……

思想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世界近代文明史一再证明：价值观念的转型（尤其是大众性的）预示着社会发展的一条新的轨迹，同时也呼唤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重估一切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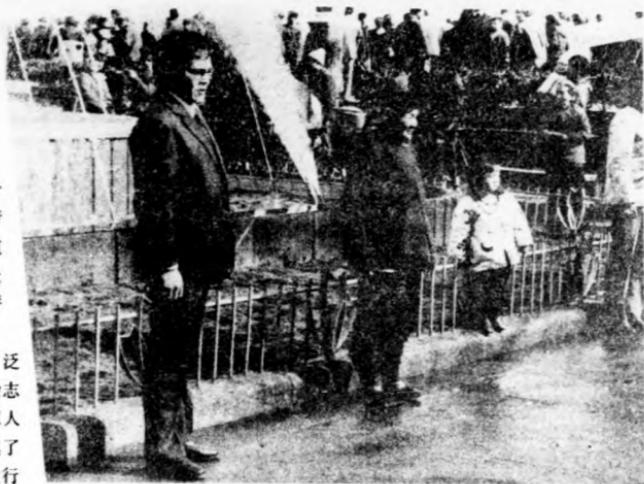
价值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于人的意义，价值观则是人们对这些意义的评估和看法。人们的价值指向决定了人们的追求，从而也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的决策目标、经济、政治体制选择的指导思想。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的名言，这位跨世纪的思想家在他辞别人世80年之后的中国赢得了相当一批热心的读者，恐怕是他生前所未料及的。不过，正如有1000个读者便有1000个汉姆莱特一样，有1000个读者也有1000个尼采，当一批中国的读者接过了“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口号时，他们的内心体验、他们的渴求、他们的挑战对象同尼采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尼采的矛头指向是传统基督教的价值观，并且捎带着对新教革命以来西方的世俗化的人生和道德的愤恨；而中国人重估的则是中国的新老价值传统，在绝大多数人当中，所追求和呼唤的恰恰是世俗化。

其实，这一价值重估的过程比尼采的广泛为人所知来得更早，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展开的人生观大讨论揭开了这一序幕。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激起了上百万人的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杂志的发行量破记录地直线上升到近400万份！从版面内容上看，始而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体认，继而怀疑思索的对象扩展到人性、社会、道德、法律、艺术、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理想与现实、利己与利他等一切方面。透过讨论可以看出，人生的思路不是窄了，而是迅速拓宽了。许多空洞的东西开始被人们抛弃，许多教条的东西也不得不转向实际，理想也从“大道理”的空中楼阁里走下来。敏感地觉察到这一历史变迁的青年学者们抓住这个机会，把“重估”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

世俗化之潮

在价值观念系统中，有深层的价值观念和浅层的价值观念之分，浅层的价值观念是由深层的价值观念派生出来的，而深层的价值观念则主要体现为人对其自身内心欲求的看法。按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有5种需求：



生理、安全、归宿、尊重、自我实现；按过去我们的一个更为粗陋的划分，人则有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这些需求持什么态度，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哪些比较高尚，哪些比较卑下？这种判断构成了我们深层的价值偏好，从而也决定了我们在生活中具体的价值选择。例如，倘若我们将物质需求视为卑下的，那么，对珍着美味的渴望便会被当作耻辱性的动机，豪华的羊毛地毯在我们的眼中也会黯然失色。

中国的新老传统在价值选择上都带有禁欲、制欲、寡欲的色彩。儒家主张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道轻食，把人的自然欲求贬为最大的恶。有人问朱熹：吃饭是天理还是人欲？朱熹回答说：饿了想吃，是天理；不仅想吃，而且想吃好，则是人欲；而人欲当在根除之列。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虽然同儒家教义有很大不同，但前者主张“四大皆空”，后者主张“返朴归真”，在制欲、禁欲、寡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人们仍是把平等、和谐、精神充实这些价值放在首位，并以此来规范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作为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决策之优劣的标准。我们过去赞扬社会主义的理由是它带来的平等和“精神充实”，而我们指斥资本主义的基本理由也是：“别看他们物质生活富裕，可他们精神空虚！”谁要是在穿衣吃饭上表现出稍多一些的关注，便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然而，回顾这一切就像是回顾一个早已淡忘的梦，始于1979年至今仍绵延不断的世俗化之潮已经使传统的价值偏好成为历史的陈迹。所谓价值选择的世俗化，简言之，就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肯定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具体追求的合理性，就是鼓励人们去干他们本来就想干的事情。这股世俗化之潮最早表现为八十年代初的人性、人道主义大讨论，而这场大讨论的实质则是要为人的现世幸福正名，蕴含着对虚幻的类似于来世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否定，并体现着一个要求：一切社会理想、一切社会决策都要以它们是否有助于人的现实幸福为预测标准来证明其合理性。继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物质利益原则的讨论、效率与平等之争、生产力标准的确立，都体现了同一主题。较之理论界更为贴近大众心灵的文学界成了这股浪潮中一朵巨大的浪花，作家张贤亮推出的两部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启示录”无非是要通过形象的故事和心理情境的渲染告诉人们两个简明的价值“真理”：吃饱了不饿，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从而也才有真正的精神追求；没有女人的男人不成其为真正的男人，性压抑者最终将掩埋整个自我。总之，这一切展示了一种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

卡里斯玛权威的衰落

卡里斯玛是早期基督教的语言，后来著显社会学家韦伯在论述权威的类型时用它来特指具有创新精神人物的某些非凡品质。卡里斯玛权威型人物及其追随者都相信他有天赋的神圣权力，他是社会秩序的创立者，是一切价值与信仰的制订者和仲裁者；而公众对卡里斯玛权威则取一种几乎是无条件的信从态度。

传统中国社会有3种卡里斯玛权威：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家族经济基础上并被儒家伦理纲常强化了的老者的权威，二是以封建专制为基础同时又被传统政治哲学作了合理化证明的帝王的权威，三是儒家圣贤的权威（这种权威通过他们传诸后世的经典和人格起作用）。共和国成立之后，这3种权威置换为政治领袖的权威，中间经过“造神运动”，最后发展为一种空前绝后（但愿绝后！）的个人崇拜迷狂，忠字舞、“红宝

书”、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都证明了毛泽东成了当年中国社会中的超级卡里斯玛权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至少在社会的表层居然成为事实，甚至连服装的式样和颜色都统一了。在当年，敢于对权威的某些言行产生些许怀疑的恐怕仅有极少数“胆大包天”者，而且即使他们在这样做时还混杂着偷吃禁果的不安或有罪感。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预示着中国式“圣经”时代的结束，对“两个凡是”的破除从根基上动摇了政治上的卡里斯玛权威；持续多年的对“代沟”问题的关注标志着长者权威的衰落；几乎波及几代人的信仰危机、西学东渐过程的加速、舆论上对个人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强调、生活选择上的“自己设计自己”，婚姻、家庭、道德、政治、艺术等问题上的众说纷纭，都证明了一个价值上的相对主义时代的来临。不少关于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调查问卷都设有这样一问：在生活中你最相信和崇拜的人是谁？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选择的答案是：我自己。

“正当”范围的拓展

道德评价本应有3个层次：失当、正当、应当。失当表现为诫律，做了失当的事谓之卑鄙或缺德；正当表现为权利规范，做了正当的事可以得到人们的赞许；应当表现为劝喻，按应当去做谓之崇高。或者说，在崇高与卑鄙之间本来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崇高者和卑鄙者都在少数，就人们最真实的动机而言，绝大多数人做的绝大多数事都在正当之列。

然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道德评价上的一大特点却是两分法：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崇高就是卑鄙，没做到大公无私则意味着自私自利，不像君子则是小人，于是人们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了，人们最真实的行为动机被否定了，从而也就抽离了人的活力和能量。这种充满禁忌的文化反映了文化对人的苛求。

价值选择的世俗化必然最终体现为禁忌的松弛和对个人权利的呼唤。于是我们看到，十年来“人心不古”到了何等的地步。最初仅仅是服装选择的多样化，随后则开始为钱正名、为利润正名、为物质利益原则正名、为个性自由正名、为做人方式的多样化正名等等；而且正名的程度越来越高。例如钱的问题，开始只是承认金钱作为财富的代表于生活的必要性，继而提倡“能挣会花”，进而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默认了“一切向钱看”并以此作为行为指令了；大学生、研究生在职业选择上不再讳言“红道、黄道、黑道”（做官、经商、出国）所具的实惠对自己的诱惑力；不少社会

调查表明，“求实惠”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最大特点；“重义轻利”的传统训诫被当作了笑柄，甚至有人公开撰文为动机上的“唯利是图”辩护，声称只要不违背经济合理化所要求的经济规则，唯利是图就是正当的。又如，公私问题，过去人们只承认大公无私是唯一可取的境界，现在连较保守而持重的理论家也承认公私兼顾的境界和利己而不损人的境界是正当的了。

人格期待的变迁

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期待历来是谦谦君子型的，社会所推崇的楷模的内涵是老实、厚道、顺从、驯服。这一方面造就了一批唯唯诺诺、不思进取的国民，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批故作谦恭、八面玲珑的伪君子。

世俗化之潮、商品经济的冲击波以自身的逻辑呼唤出一种新的人格，从下述历史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窥视出这种人格的内涵和变化轨迹：

在社会嘉奖方面，无论是运动场上的“十佳”，还是企业家当中的“十佳”，人们对他们业绩的关注远胜于对他们为人的关注；

在社会楷模方面，人们对张海迪式的强者的偏爱远胜于对传统的雷锋型的“好人”的兴趣；

在文化欣赏方面，奶油小生一类的形象遭到普遍厌弃，人们呼唤着高仓健式的“男子汉”；

在择友、择偶、人才招聘以及日常的人品评价上，能力、“本事”和气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天平；

在人际交往方面，个人的自我表现欲大大增强了，中国人对充满自信的毛遂自荐者不再感到那么惊奇和反感了；

……

总之，这是一种具有强健的内在征服力和创造力的进取型人格，当它同一种合理的协调性道德有机结合的时候，它是一种“生产型人格”；当它无视善恶的轨道自由地表现自己时，则是一种“买卖型人格”。

《红高粱》于我们的启示和困惑

电影《红高粱》是一部自由颂，是一曲人的野性的赞歌。导演张艺谋说：他要表现一种“活法”；通过画面和音响引发的观众的心灵震颤，使我们不难体会出这种“活法”的意蕴：痛痛快快地活着、无拘无束地活着、洒洒脱脱地活着，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豪放、敢追求。

由于传统文化有着过多的禁忌，传统的中国人活得沉重、活得压抑、活得不自由不洒脱不痛快。联系这一背景，我们可以窥视出这部电影的文化精神：对

自由的呼唤；这也是近年来价值观革命中同世俗化之潮并驾齐驱的一个主题；《爱是能忘记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疯狂的君子兰》《你别无选择》以及诗坛中第五代诗人的诗，都从不同角度张扬着个人自由自主的价值，而《红高粱》则是一个巅峰。

情感化的发泄、愤怒的呐喊、沉郁的召唤、本我的张扬，无疑对于人们告别旧的价值规范是有益而且必要的，然而，细细品味用以表现“某种活法”的几出戏（颠轿、野合、杀麻疯病者、酒桶里撒尿），再联想到时下新观念的倡导者和接受者的心态（凡是向人的本能“献媚”的东西说起来便理直气壮，接受起来也心安理得），不禁使人产生了一个困惑：对旧的社会理性的反判能够以非理性主义取代之吗？由于传统而文化的缺失我们就一定要取一种反文化的态度吗？

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在为所欲为和有所不为之间寻找一个中庸，因而文化对于人的自由而言总是一种限制。过多地限制人的自由是对人的扼杀（从人类社会面看，是对活力的扼杀），完全放任人的自由则是人类的集体自杀。以中国的情况而论，我们眼下还缺乏许多应有的自由，但在某些方面，（如经济秩序、人际关系）旧的毁弃了，新的则未建立起来，因而已经出现了不少价值规范（包括行为规范）的真空。事实上，一个彻底的相对主义的社会是不可取的，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存活着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一些过分地渲染使人们误以为美国是一个彻底的相对主义社会，其实，我们别忘了，这个社会还有许多基本的价值是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如民主和人权以及信守契约等等。因此，当我们带着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回顾十年来中国价值观念变迁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这一过程中令人忧虑的危险。



民主的叙事

● 光辉
● 段 跃



中国的那些好干部们总爱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听话的，是好百姓。过去我们听这样的感慨，也陪着感慨。可有一件事或者说有一个地方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思索这句话。

1987年10月，在黑龙江依兰这座古城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县级换届选举时，人民代表们把上头派来的县长候选人选了下去，选上了代表联名另提的候选人——张宝柱。

“这是1945年10月共产党接管依兰以来最大一次民主！”一些人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而这“最大一次民主”背后的故事却把我们压得“深沉”起来。

采访选题1：政府素质、 民众素质与中国民主素质

为什么要选张宝柱？

人民代表A说，张宝柱的最大特点是求真务实，歪门邪道的事不干，跟那帮“捞官”比，真是天壤之别。咱依兰老百姓对某些挂着共产党干部招牌的捞官可没有好印象。说过口头话，要是再打起来，用不着敌人逼供，就会有人主动招出，“这小子是头儿！”那帮捞官太糟践我们党的形象了！张宝柱老实厚道，大伙对他有好感。既然叫我们选，我们就选个看着顺眼的。

人民代表B补充，去年市委组织部来搞过一次干部民意测验，张宝柱得分最高。人民代表C则列举了张宝柱在任农业副县长期间的治政实绩，特别提到了他在山洪爆发时和群众一起抗洪……

几乎所有和我们交谈的依兰人都说张宝柱是个好官。再接着谈，又十有八九要给我们讲“俩一把”的故事。

“俩一把”是前任县委书记和前任县长的简称。

前书记姓刘，名俊杰，这刘俊杰够笨，在依兰主政三年，也着实干了几件大事：一是依兰的厕所素有“三不怕”之美谈（上厕所要不怕羞不怕脏不怕死），刘刚到任，就有一位从粪池里爬上来的公民跑进办公室为民请所来了。刘下决心整治了厕所。二是修路。依兰县城原先没有一条像样的大道，一下雨就得穿靴子趟泥浆。来往车辆过不了艰难地段，旁边有拖拉机等着赚钱，拉一辆30元！刘上任后为修路扒了些民房，也包括一些官员家属的房，因此得了个美称——刘老扒。三是修了大小牌楼和20个适合打麻将的凉亭，以及雕塑、花池等等。这一切也着实叫依兰风光了一阵。佳木斯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是在这里开的，13个县的头头脑脑们都来参观学习找差距，会后又来了186伙达1万多人。咱们的刘书记连烟都分不过来了。群众说，这叫花了上百万，买了个文明县。

刘是从宝清调来的。前县长贾振斌则是从集贤调来的。刘有刘的八个干儿子，全是局长之类的人物。贾有贾的劲

力，亦非等闲之辈。刘办事有气魄，但做得不干净，花公款6万到佳木斯为自己买了房子，受贿少说也有3000。贾也有上千元的经济问题。刘贾各有各的问题，刘贾各有各的考虑，刘贾还有各各的路子，于是刘贾互告，最终落得个刘贾一起下台。

刘贾为依兰做了些事，更多是作孽。历史和刘贾联手给依兰留下的这个包袱是沉重的：县财政挂账850万，企业亏损2000多万，加起来将近3000万！新任的书记、县长就算任期三年，光是还这笔欠账，平均每天得还3万！

“俩一把”双双被免职，县级机构即将换届，市委调绥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广运来依兰，意图再明白不过：准备接任县长。可依兰人不明白，依兰山不穷，水不瘦，人也不傻，36万人口难道就选不出一个县长来？“俩一把”是外派来的，前几任也多是外派，有的来了就捞，捞了就走，这些年把依兰造了个空壳，为什么还非得外面派县长来？

但我们纯朴的依兰人民不应该忘了，刘老扒的干儿子们可全是土生土长的，当他们的乡亲还在住破草房的时候他们却大兴土木，用私建公助的方式盖别墅式建筑，有一位干儿子的私宅光是门就有24个！关键不在是否外派。

那么关键是个清官？可那些后来作孽的官也并非天生就是混官、昏官，刘老扒不是也办过不少令人怀念的好事么？人民只要一旦交出权力，仰仗于接受权力的长官，长官便成了救世主，便有可能成为人民意志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

廉洁政府绝对是当务之急，但这种廉洁并非替换上两个廉洁清明的官员就能完成的。清官固然非混官能比，但渴望清官的民众不也是产生混官的土壤么？从中国民主主体的素质是否也可看出现阶段中国民主的素质呢？

采访选题2：这是党的意志么？ 为什么党的意志不是民众的意志？

在依兰的天空里，张广运就像一颗流星，匆匆亮相匆匆离去。张广运为什么没能选上？

县人大会一位副主任说，根据组织介绍，张广运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43岁，原来在经派干得不错。组织上派他到依兰来，作为县一级组织，应该积极工作，要把他选上。县委先后开了四次会，先是常委扩大会，然后是县直机关中层干部会，又开了乡镇长会，中心意思都是一个，要求大家和市委保持一致。组织上尽到了责任，可一选举就大不一样了。

副主任说得一点不错。两天的会议，全用来讨论候选人了。在宣传讨论候选人时，对张广运同志的推荐介绍又占了最突出的位置。对其他几位县级领导人选的介绍材料都只有一页纸，而有关他的介绍材料则是3页。

在县政府一楼小会议室召开的机关中层干部会上，市委组织部长介绍了张广运的简历，才干和工作情况，接着明确提出：希望大家能够相信市委，做好工作，保证选举。

在三次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县委负责人也作了同样的要求。“要保证组织派来的人选上，否则没法向上级交代。”这意思再清晰不过了。与会者面面相觑。

还有个别做工作的。县委组织部长找自己一位老上级、现在的人民代表谈话。

部长：我想找你谈谈。

代表：谈什么？

部长：对换届选举的人选你怎么个想法？

代表：组织部长找我谈工作只能是三个方面：一提拔我，二降我职，三做我的思想工作。此外恕我不谈。

更多的人不认识张广运。张广运毕竟选举前两天才来。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偶一把”的业绩记忆犹新，依兰的人民代表们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他们所不了解的人了。一个简单的条件反射。可能会错过了合适人选，但比起轻易地相信、轻易地接受，毕竟是个大大的进步。

会议主持人不是要求大家酝酿讨论候选人吗？代表们真的开始酝酿起他们熟识并且中意的候选人来了。全县上下20台宣传车不是反复宣讲新《选举法》吗？新《选举法》不是规定县级政府领导人选可以差额选举产生吗？代表们真提出一个来了，看你搞不搞得额？

法律规定，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另提候选人。1987年10月26日中午，各代表团汇报情况时，第6代表团团长略显激动地说：“我们那疙瘩有将近20人联名提张宝柱当县长。”第3代表团团长说他们那疙瘩也有9人签名。还有一张小纸片夹在第5代表团团长壳里：

第5代表团提议张宝柱同志作县长候选人

接着是用各种字体签署的11个姓名。

这种情况大出主席团意外。下午1点多，投票马上就要开始，县人大会主席团赶紧打电话向市人大请示。市里意见：尊重民意，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张广运列前，张宝柱列后。

赶紧叫印刷厂重印选票。主持人赶紧在会上宣布：代表们的意见符合选举法的规定，增补张宝柱同志为县长候选人。

选举结果：到会代表169人，张广运42票，张宝柱127

票。

静默许久的会场响起一阵火辣辣的掌声。一位代表大发感慨：说实在的，这些年没有鼓掌的习惯了，这次不知怎么的就是想鼓！

事后我们与市人大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交换意见。市人大的同志认为，依兰整个的选举过程是合法的，上级组织从中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外派干部太晚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除了持如前意见外，还补充说，干部人选的某些情况是只有组织上掌握的，下面不知道。也不便于让下面知道，要知道了就不利于这个干部日后开展工作。党组织的考虑没得到代表的理解，很好的同志也会落选。另外，也不能忽视对宣传的逆反心理，地方上的排外思想等等。

当然不应忽视这些。不过更不能忽视的是：为什么党组织的意志不是人民代表的意志？为什么不能把所掌握的有关候选人情况告诉人民代表？党组织考核确定政府人选，叫代表们理解通过，是否就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结合？党组织是否更应该在保证人民代表体现人民意志的过程中作出努力，而不是把一个现成的方案交给代表？

采访选題3：民主就从这不划圈圈起步。

走出圈圈之后呢？

一位参加过两次县级换届选举的人民代表说，过去选举搞形式主义，大伙拿到选票都划圈圈，等额选举，装个样子，不同意的顶多也就一票两张，没什么用。这次选举搞差额好，咱们代表可以比较，可以选择，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是只能划圈圈，要我们这些代表干什么呢？

一位普通选民说，这次选县长，代表们为我们老百姓出了口气。当初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我们离了那么长时间，也该痛快一回了。

人民要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好，民主就从这不划圈圈起步，走出圈圈之后呢？离了那么长时间，民主一回，痛快一回，那么痛快完了，是否还窝着呢？

刘老扒的干儿子们依旧在当这长那长，依旧住白花花铁皮瓦盖的“官僚住宅区”，而旁边的平民人家，依旧两代铁口窝在一个炕上。

局长儿子还在念书就已经给留出好位置来了，而当了父亲的待业青年还窝在家里待业。

谁都知道村里最富的往往是老三户——书记、村长、会计，谁都知道他们往往是靠权力致富。

谁都知道只考虑如何搞破鞋的厂长不是好厂长，谁都知道那厂长尽管把厂子搞黄了自己却官运亨通……

面对所有这些不合理、不公平、不像话的事实，我们善良的百姓们只能窝着，只能摇头叹气，最多在摇头叹气的余端上一两曲顺口溜发泄怨气：

跳舞几步都会，打麻将一沓不累，喝酒不醉，干工作不会——形容的是精力过剩的干部。

对这些宝贝疙瘩，还有一种形容法——吃烧鸡，抽大烟（烟），睡野鸡（野女人），摸鸡（打麻将），总升级，简

称五鸡干部。

还有一股专门说今日某些干部轻松自在得意状的——下乡坐吉普，小肚吃鼓鼓，回来报两块五，问啥啥没谱。

顺民们和领导顺民的好干部们都给我们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依兰县小偷横行，更绝的是有的小偷偷当官的。今年春节前后，10来户当官人家遭了贼，其中有原县长贾振斌家，也有公安局长家。有知情者说，实际遭了贼的当官人家决不止十几户，有的被偷了都不吱声。有人说，这是“富招贼”，有人说这叫“劫富济贫”。

偷盗这种犯罪行为居然也蕴含着些许正义的愤怒，居然也成了对更大犯罪的一种抗争！实在可悲可叹。

可喜的是更大的问题终于引起了重视：官员们的100辆小汽车每年光是耗油就得100多万元人民币，而依兰县全年的财政税收才600万！官员们那片别墅式房子，每幢造价都在好几万，就算他们从8岁开始赚钱，就算他们不吃不穿，也赚不下这笔钱：在小偷们作案的同时，我们的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正在考虑如何处理房子、车子问题，如何整治社会治安。新任县长不热衷于陪吃陪喝，只是一个

劲地往下跑。新任县委书记不搞特殊化，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忙。这自然是依兰百姓的福气。有的老头老太太甚至由此想到了依兰历史上一位叫王瑞的惰官，“该不是王瑞转世吧？”人民代表们再一次为自己的选择庆幸。

应该庆幸。但仅仅庆幸就够了么？

历史行进到今天，似乎人人都知道，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实不尽然。现在我们不少人所能理解和所能做到的恐怕还停留在选择（有时甚至仅仅是接受）好官员来为民作主。没有哪个选民不认为自己在选上级，没有哪个选民选完后不把这个官员看作上级。于是悲剧产生了，这个上级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而用不着向授权于他的真正上级——人民负责。

民主不是请人来为民作主，也不是简单地由每个人上台作主。民主是人民选择其代理人又时时监督其代理人的一种体制，是人民参与整个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体制，“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列宁语）。依兰这次“最大的民主”是逼出来的，那么，民主被“逼”出来之后又会怎么走下去呢？民主的主体——人民在自己的意志醒来后还会在听话中沉沉睡去么？民主和渴望民主的人们仿佛都进入了一个魔阵。

我们不懂的民主

● 邓捷

当我们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之慢而顿感沉重时，当我们为中国人代会上终于有了反对票而倍受鼓舞时，自去年开始的全国五级人代会的换届选举，却使我们一时间推翻了所有的“沉重”“鼓舞”。

这便是民主么——

主人翁的觉悟 人民代表选择推举自己的执政官员，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确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然而，选择推举的背后却支撑着一个怎样的梦想——附在主人翁民主权力上的梦想：清官执政。依兰老百姓体现在民主上的最高觉悟，就是“我们就选一个看着顺眼的”。

我们的民主，就诞生在这般觉悟和这样素质的模糊中。于是有人说，中国尚不需要民主。中国不可能有民主。中国只需要清官。清官思想依旧根深蒂固。不是吗？在广阔的多镇，成千上万的人在心甘情愿地爱戴着和拥护着“青天”们。

悲剧便这样产生了：一旦“青天”们不再代表百姓的利益，百姓怎么办？百姓又能怎么办？再行使一次选择推举的权力。时，但周而复始的仍旧是悲剧。

党组织会错么 党政分开。但你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体制，能够说分就分开么？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官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都是党派干部，党管干部。人代会是尽人皆知的橡皮图章“你办事，我放心”。

现在，“我”不再放心了，要自己亲自去“办事”。于是，党组织的意志和人民代表的意志有时发生背离了——权且不论选这个人（党员）就是体现党组织的意志，选那个人（党员）就不体现党组织的意志，“党的意志是人民的意志。”此话不错。但顺序似乎被颠倒了，党不过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人民的意志才是党的意志。

党组织也会错的。这似乎要推翻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人民代表就这么说了。过去几十年党组织决定干部人选交代表举手通过的方法不那么灵验了。民主选举干部的制度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交叉点上摸索，改革我们的干部体制。前无古人可仿，身无令人可效。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民主还要走多少年 民主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中国的民主刚刚起步。差额选举又仅仅是民主的起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推进，健全的民主体制要靠几代人的奋斗建设。这里，有我们不曾料及的艰难和困苦。

从给不认识的人划圈画，到实行差额选举，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民主就得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会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是历史。原以为“我们要民主”的标语一贴，西方的民主就会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现在才明白：即使别人双手递给我们民主的权力，我们也不过仅仅能领一份。真正的健全的民主还没有到来。这同样是历史。

我们还不懂民主。我们得学习民主。我们，十亿人和十亿人的国家。

中国青年走向未来读书笔谈有奖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 王润生《观念变革中的几点忧虑》
俞果《简洁、透明、有力——现代化政治的追求》
华尔《一双手洗另一双手》
蔡拓《几页沉重的篇章》
许韶立《人类会走到那一天吗?》

二等奖

- 苏燕《我看到了两幅图景》
陆符嘉《突破生存的极限》
姜剑《原地踏步只会留下一片空白》
梁地《英格尔斯讲了一个明白而又简单的故事》
曲炜、于金陵《补充一句话》
李以渝《优圈 劣圈 怪圈》
陈念平《富饶还是贫困》
王燕平《混沌之说》
赤木《“筛选”是“剔除”与“吸取”的前提》

梅秋《科学家都适合参政吗?》

三等奖

- 胡文 程永德 梅冬佳 赵孝文 彭光明 黄诗琦
刘朝阳 熊慧明 费一雄 刘学兵 陈红日 唐刚刚
红 鸿 冯颖一 冯博一 张良庆 许小平 刘 云
宋建文 左栋梁 林大忠 吴 刚 郭建贤 张在发
姜志刚 王继会 徐 军 刘庆发 于绍波 浦荣曹
谷 兵 马奇峰 刘加顺

集体奖

- 山东齐鲁石化公司团委
北京三五〇一厂团委
天津市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三队团总支
大庆石油管理局汽修厂教育中心团总支
重庆西南铝加工厂职工大学八六级计算机班团总支
(本次活动蒙齐鲁石化总公司大力赞助、支持,在此鸣谢)

科学家都适合参政吗?

●梅 秋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社会生活中更多领域的进一步数量化、精确化要求,决策已不可能继续是一个根据以往经验推测未来或靠主观意志决断的过程了。因此,吸收更多的科学家(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家)参与各级政府的决策,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点也越来越为今天的中国所意识到。

但是,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科学与政府》(见走向未来丛书《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向我们提出的却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所有的科学家都天然地适合做科学决策的人选吗?什么样的科学家适合参与政府决策?什么样的科学家不适合?

近几年,由于强调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有许多科技工作者走上了领导岗位,总的说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把科学家的知名度或在本领域内的成就与科学

家从事领导工作、决策工作的能力等同起来。毋庸置疑,科学的职业训练使科学家们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本身在它的人性侧面使得科学家的内心“知道一个向着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并且,科学家从他们的角度也常常能对一些人文学领域提出有价值的真知灼见。但所有这些能力本身并不意味着应用它们,就能够在与科学领域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或人文领域作出同样正确的判断。由于科学的纵深发展和专业化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对专业以外的知识知之甚少,而他们自己对从事行政工作也毫无热情,为了追求某种需要,强行将这样的科学家拉到领导决策的岗位,不但发挥不出决策的科学性,反而会耽误他们的专业研究,不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除去知识准备、从政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外,品格、修养、气质等因素也使一些科学家不宜从事决策工作。斯诺认为“任何陶醉于新发现的人都是祸害,……他越是对他自己的新发现有一种亲切感,他的判断就越糟糕。”对于新发现、对于掌握某种秘密或诀窍有一种沾沾自喜感觉的科学家,必须排除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

我以为,科学家参与决策是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而吸收科学家参与决策也有一个科学化的问题。

称五鸡干部。

还有一段专门说今日某些干部轻松自在得意状——下乡坐吉普，小肚吃鼓鼓，回来报两块五，间喻喻没谱。

顺民们和领导顺民的好干部们都给我们讲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情况：

依兰县小偷横行，更绝的是有的小偷专偷当官的。今年春节前后，10来户当官人家遭了贼，其中有原县长贾振斌家，也有公安局局长。有知情者说，实际遭了贼的当官人家决不止十几户，有的被偷了都不吱声。有人说，这是“富招贼”，有人说这叫“劫富济贫”。

偷盗这种犯罪行为居然也蕴含着些许正义的愤怒，居然也成了对更大犯罪的一种抗争！实在可悲可叹。

可喜的是更大的问题终于引起了重视：官员们的100辆小汽车每年光是耗油就得100多万元人民币，而依兰县全年的财政税收才600万！官员们那片别墅式房子，每幢造价都在好几万，就算他们从8岁开始赚钱，就算他们不吃不穿，也赚不下这笔钱！在小偷们作案的同时，我们的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正在考虑如何处理房子、车子问题，如何整治社会治安。新任县长不热衷于陪吃陪喝，只是一个

劲地往下跑。新任县委书记不搞特殊化，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忙。这自然是依兰百姓的福气。有的老头老太太甚至由此想到了依兰历史上上一位叫王瑚的隋官，“该不是王瑚转世吧？”人民代表们再一次为自己的选择庆幸。

应该庆幸。但仅仅庆幸就够了么？

历史行进到了今天，似乎人人都知道，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实不尽然。现在我们不少人所能理解和所能做到的恐怕还停留在选择（有时甚至仅仅是接受）好官员来为民作主。没有哪个选民不认为自己在选上级，没有哪个选民选完后不把这个官员看作上级。于是悲剧产生了，这个上级只需要向上上级负责，而用不着向授权于他的真正上级——人民负责。

民主不是请人来为民作主，也不是简单地由每个人上台作主。民主是人民选择其代理人又时时监督其代理人的一种体制，是人民参与整个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体制，“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列宁语）。依兰这次“最大的民主”是逼出来的，那么，民主被“逼”出来之后又会怎么走下去呢？民主的主体——人民在自己的意志醒来后还会在听话中沉沉睡去么？民主和渴望民主的人们仿佛都进入了一个魔阵。

我们不懂的民主

● 邓 捷

当我们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之慢而顿感沉重时，当我们为中国人代会上终于有了反对票而倍受鼓舞时，自去年开始的全国五级人代会的换届选举，却使我们一时间推翻了所有的“沉重”“鼓舞”。

这便是民主么——

主人翁的觉悟 人民代表选择推荐自己的执政官员，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确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然而，选择推荐的背后却支撑着一个怎样的梦想——附在主人翁民主权力上的梦想：清官执政。依兰老百姓体现在民主上的最高觉悟，就是“我们就选一个看着顺眼的”。

我们的民主，就诞生在这般觉悟和这样素质的疆域中。于是有人说，中国尚不需要民主。中国不可能有民主。中国只需要清官。清官思想依旧根深蒂固。不是吗？在广阔乡僻，成千上万的人在心甘情愿地爱戴着和拥护着“青天”们。

总归便这样产生了：一旦“青天”们不再代表百姓的利益，百姓怎么办？百姓又能怎么办？再行使一次选择推荐的权利。对。但周而复始的仍旧是悲剧。

党组织会错么 党政分开。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体制，能够说分就分么？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官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都是党派干部，党管干部，人代会是尽人皆知的橡皮图章。“你办事，我放心。”

现在，“我”不再放心了，要自己亲自去“办事”。于是，党组织的意志和人民代表的意志有时发生背离了——况且不论选这个人（党员）就是体现党组织的意志，选那个人（党员）就不体现党组织的意志。“党的意志是人民的意志。”此话不错。但顺序似乎被颠倒了，党不过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人民的意志才是党的意志。

党组织也会错的，这似乎要推翻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人民代表就这么说了。过去几十年党组织决定于干部选交代表举手通过的方法不那么灵验了，民主选举干部的制度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交叉点上摸索，改革我们的干部体制。前无古人可仿，身无令人可效。这就是中国民主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民主还要走多少年 民主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中国的民主刚刚起步。差额选举又仅仅是民主的起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推进，健全的民主体制要靠几代人的奋斗建设。这里，有我们不曾料及的艰难和困苦。

从给不认识的人划圈圈，到实行差额选举，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民主就得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会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是历史。原以为“我们要民主”的标语一举，西方的民主就会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现在才明白：即使别人双手递给我们民主的权力，我们也不仅仅能领份一番。真正的健全的民主还没有到来。这同样是历史。

我们还不大理民主。我们得学习民主。我们，十亿人和十亿人的国家。

中国青年走向未来读书笔谈有奖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 王润生《观念变革中的几点忧虑》
俞果《简洁、透明、有力——现代化政治的追求》
华尔《一双手洗另一双手》
蔡拓《几页沉重的篇章》
许韶立《人类会走到那一天吗?》

二等奖

- 苏燕《我看到了两幅图景》
陆符嘉《突破生存的极限》
晏剑《原地踏步只会留下一片空白》
梁地《英格尔斯讲了一个明白而又简单的故事》
曲坤、于金陵《补充一句话》
李以逾《优圈 劣圈 怪圈》
陈念平《富饶还是贫困》
王燕平《混沌之说》
亦木《“筛选”是“剔除”与“吸取”的前提》

梅秋《科学家都适合参政吗?》

三等奖

- 胡文 程永德 梅冬佳 赵孝文 彭光明 黄诗筠
刘朝阳 熊慧明 费一雄 刘学兵 陈红日 唐则刚
红 鸿 冯颖一 冯博一 张良庆 许小平 刘 云
宋建文 左栋梁 林大忠 吴 刚 郭建贤 张奋发
姜志刚 王继会 徐 军 刘庆发 于绍波 潘荣曹
谷 兵 马奇峰 刘加顺

集体奖

- 山东齐鲁石化公司团委
北京三五〇一厂团委
天津市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三队团总支
大庆石油管理局汽修厂教育中心团总支
重庆西南铝加工厂职工大学八六级计算机班团总支
(本活动蒙齐鲁石化总公司大力赞助、支持, 在此鸣谢)

科学家都适合参政吗?

● 梅 秋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随着社会生活中更多领域的进一步数量化、精确化要求, 决策已不可能继续是一个根据以往经验推测未来或靠主观意志决断的过程了。因此, 吸收更多的科学家(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家)参与各级政府的决策, 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点也越来越为今天的中国所意识到。

但是, 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科学与政府》(见走向未来丛书《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向我们提出的却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所有的科学家都天然地适合做科学决策的人选吗? 什么样的科学家适合参与政府决策? 什么样的科学家不适合?

近几年, 由于强调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 有许多科技工作者走上了领导岗位, 总的说来, 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不可否认, 我们的社会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把科学家的知名度或在本领域内的成就与科学

家从事领导工作、决策工作的能力等同起来。毋庸置疑, 科学的职业训练使科学家们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科学本身在它的人性侧面使得科学家的内心“知道一个向着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并且, 科学家从他们的角度也常常能对一些人文学域提出有价值的真知灼见。但所有这些能力本身并不意味着应用它们, 就能够在与科学领域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或人文领域作出同样正确的判断。由于科学的纵深发展和专业化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对专业以外的知识知之甚少, 而他们自己对从事行政工作也毫无热情, 为了追求某种需要, 强行将这样的科学家拉到领导决策的岗位, 不但发挥不出决策的科学性, 反而会耽误他们的专业研究, 不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除去知识准备、从政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外, 品格、修养、气质等因素也使一些科学家不宜从事决策工作。斯诺认为“任何陶醉于新发现的人都是祸害, ……他越是对他自己的新发现有一种亲切感, 他的判断就越糟糕。”对于新发现、对于掌握某种秘密或诀窍有一种沾沾自喜感觉的科学家, 必须排除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

我以为, 科学家参与决策是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 而吸收科学家参与决策也有一个科学化的问题。

浑沌之说

也许，我这番议论纯属“混沌”之说，但它确是我读完《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一书后之所想。议论所发即是非学术性的“读书笔谈”，我想，也就不必顾忌许多了。

书中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起源、发展、机制的分析，令人信服。也正是受书中分析的启发，使我发现，中国古代存在着—颗有可能使中国科学的发展走一条不同于近代科学发展道路的种子，这就是属于中国古代思想范畴的，以“气”和“阴阳”所代表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

书中的观点对以“气”和“阴阳”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是不信任的，说它用在科学理论中，使理论“含混不清”，进而导致“理论上削足适履”，最后坠入“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

然而，科学本没有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既然如此，就可能存在着不止一条通向科学圣殿的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看看医学上的例子。

解放以来，我国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但实践上大部分地方还停留在将中医的方子和西医的方子综合起来使用。这样做虽有时取得较好的疗效，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治病方法上，中西医并未达到真正的“综合”。在理论上，双方各成体系；在临床上，中医看病，统观病人全身的情况，春秋朝暮，方颇不同，男女长幼，治病异样。西医看病，查出病情后，经常把它归入某某病，一般即用治此类病的普遍方法治疗。同是研究人体，竟有这样大的差异！

有人不承认中医理论是科学，但数千年来来的临床实践却不断地证明着中医学理论，“气”“阴阳”等概念仍被延用。虽然“经络”的物质实体在解剖学上尚未得到最后的确认，但世界各地仍有不少人依据经络原理对病人施行针刺治疗。曾有多少人想发掘灿烂的中医学宝藏，用显微镜观察、用解剖刀解剖，收效甚微。

●王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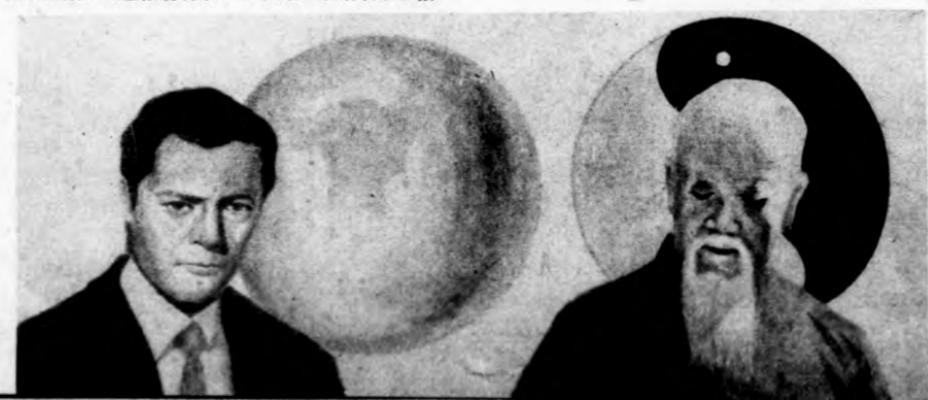
于是，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角度并终于有了一些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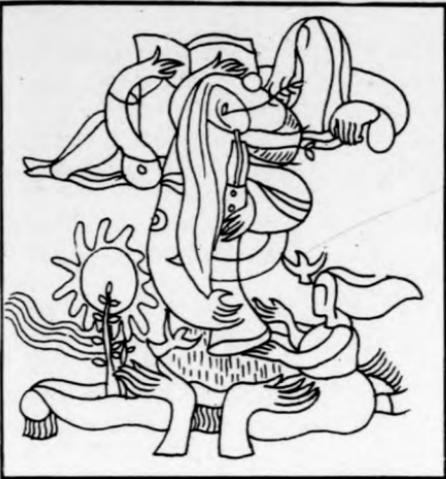
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医与中国古代哲学是浑然一体的。中医学在古代创立时曾大量吸收哲学精华，如“气”“阴阳”等辩证概念。中医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的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进行考虑。用“气”和“阴阳”的概念表达他们对世间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互相矛盾、发展变化之中的认识。用这种自然观和方式去观察人体，中医的结论自然不同于西医。难怪有人指出：中医学绝不单纯是关于人体的学问，它是综合运用了与人体有关的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医的生理、病理、治疗、药物等每一部分理论中，处处都渗透着古代人们对天文、历算、地理、气象、生物、心理以及哲学的理解。中医的这种整体性是很难用西医的方法研究解释的。

医学上的这个例子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认为，作为近代科学技术一部分的西医理论的形成，无疑走的是伽利略的道路：先把理论搞成一个构造性体系，对构造性体系中的每一个结构单位研究入微，然后再根据逻辑将它们排列组合。这种从相对静止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构造性自然观”，和在这种自然观指导下研究事物的方法，的确确实发展了人类的认识。再看产生于古代东方的中医学，它是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事物，把事物放在永恒的运动和普遍的联系中去考察，它坚持的是“有机自然观”。我们没有理由说，以这种“有机自然观”指导下研究事物的方法绝对地发现不了真理。

中医学和西医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所抱的自然观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两个不相同的理论体系，却又都不失其科学性。科学的顶点只有一个，但通向“顶点”的道路却不止一条。我相信有一天我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会重放异彩。

(图：盛灵君)





一双手洗另一双手

不是一个人人生下来就由一双手牵着走，长大了还要有另一双手牵着。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拒绝一双手的牵引时又注定落入另一双手的牵引中？当夜晚从窗前远走是否一定还有某个角落仍漆黑一片？是否你有了一个想法就一定是对另一个想法的背叛？

这些问题有些古老了，甚至有些辛酸，辛酸到你不愿重新提起。但这的确可以说成是“一双手洗另一双手”的故事。

而我要说的是，有一天你终于学会自己拿主意了，“这该有多棒！”

可是十几年前，你自己不拿主意：你受制于某种东西，在浪头上追赶另一个浪头。就是说，你听从一个最高声音的——旗杆子指向哪儿你就杀向哪儿。你用不着反求诸己，你的生活是由一系列标语、辱骂和尾随人们冲上大街组成的：凡事你都跟着大伙喊“滚他妈的蛋”！你本该想的都由别人颁发下来：你的明天、恋爱、婚姻和信仰。那时每个人都为那些自己事之外的事忙碌着，喘着大气守护某个人或奔向战场、村庄；其实，你为自己用不着选择什么感到高兴，也甘于这种“一切被安排妥了”的幸运日子，你也并不觉得有失落感或人格自损的危机感。

所以，你以前是被一双手在背后鞭打着走的人。这已成定论，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生活与人脱局的局面只是信仰专制下的一段典型插曲。而且不但你这样，

60年代的整个世界青年部落都由各种不同的专制思潮牵着走，不是去赶热闹，也不是起哄寻佳。那时，你也是在一本正经地生活，你的的确是认真地用你的生活证实：由一双手领着走照样能“轰轰烈烈”。这是个不正常的例子。

现在，你觉醒了。你甚至把一句阿拉伯格言贴在床头，每天看上一眼“骆驼总是走在沙漠里，让狗去叫吧！”

你开始觉得按自己的主意去生活也是一种乐趣。你为自己重新选择职业和做人风格，为自己结识朋友、做西餐、甚至为自己想点什么，如：你该如何去打动谁？怎样能征服你的邻居和情人？什么样的交际场合与哲学更适合你？不过你很难闭门思量出个究竟，因为你毕竟活在这个激流涌进的时代，由不得你苦苦地心斋坐忘悟出个大谛来才行事。所以，你开始把自己塑造为急性子，遇事都要高效率地找到答案，譬如你要出差了，你选择一套外出服装时马上会想到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去翻阅时装期刊，记下法国时装大师们为本年度预言的流行款式和颜色。

这样，你就开始不拘一格地读点东西，不管读什么，碰巧还能提供一些答案。

所以不比前些年，书店里只有零落的几本经典著作来安排人的生活。现在的书店、摊铺简直能安顿好你的一切。不但有满足你生存本能的烹饪大全、宫廷食谱和性学百科全书；更有适合你雄心的各种指南，如卡内基50年前就为你开好的种种处世药方，丛书编辑们为你接通“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阳光大道；进而有使你虚荣心得到承认并且高扬的种种书面表示和教化（在巴尔扎克时代，老巴就说只要虚荣心不朽，广告业和美发店就不会破产，现在你也要独立地证实这句话），如“世界流行发式”豪华本、聪明法大全；如果你想成为先知（这是大彻大悟的少数几个人），你肯定能买上一个《伍柳遗踪》之类的求仙圣书，这是通向仙身的必由之路。

就这样你自觉地走进另一双手里去了。这双手虽没有前面的那双手专横，甚至用哲学家的话说，有本质的不同，但照样能安排好你的日子：它最初取悦你，继而让你离不开它的指点，最终使你软化在它的巨影里。实际上，与前些年相比，你还是没拿真正的主意，你还是沿那个俗套的人人都走的通道走过来，你自失了。

从这种意义上，仅仅从这种意义上，信仰专断和书籍专断都在让你失去自己。这何偿不是一双脏手在洗另一双脏手呢？

（图：王红卫）



“筛选”是“剔除”与“吸取”的前提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亦 木

中国近代为什么落伍？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几千年？这是中国的史学家及各国研究世界文明史的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马克斯·韦伯从反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为什么作为近代文明标志的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及东方各国出现，而是首先从欧洲兴起？韦伯认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欧洲产生了一种新精神，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而新教禁欲主义则是培养和熏陶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事业所需人才的社会文化渊源。

韦伯的结论为后来的人们争论不休，这里不作深究。然而，他的一些观点及其阐述却不得不令我们深思。我们经常说，共产主义文化只能是以往各时代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从零创造。但事实上，我们却习惯于将所有资本主义的东西视为应被剔除的历史糟粕。这种习惯在两个方面突出表现出来。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侵略、掠夺、压迫、榨取，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罪恶。

毫无疑问，资本是带着血腥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战争、掠夺、杀戮、尔虞我诈与投机取巧。就是韦伯，也不讳言这一点。他说，“利用机会，谋取各种金钱利益的投机家，这种企业家，这种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在一切地方都存在……他们的行为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和投机性，或者说主要是通过强力获利，尤其是通过掠夺获利……”然而，韦伯同时认为，现代西方已发展了一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且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主流。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经营与封建地主的强取豪夺有巨大的差别。它们都剥削，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不断促进扩大再生产，一个维持简单再生产；一个通过经营获利，

一个反映着封建贵族的腐朽性。资本主义的赢利不靠强力手段，而是靠赢利机会、成本核算、预测市场……因此，韦伯称之为合理的资本主义。这个合理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在经济效益和推动社会进步意义上的合理。而我认为，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并非专属资本主义，而是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过去，我们常把某些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等同于腐朽的资本主义，对其进行批判、抵制。结果却严重地抑制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蔑视客观规律的做法正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的缘由，同时，也是我们改革所遇到的无形障碍。

第二，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体现这种精神的人——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丧尽天良的化身。

诚然，许多资本家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不择手段。但韦伯认为这种赚钱的冲动，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见之于侍者、车夫、不正派的官吏、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和乞丐等人身上。这种动机已存在了几千年，为什么直至几百年前才产生所谓“合理的资本主义”呢？韦伯认为，这是因为现代资产阶级主要遵循如下新教伦理原则行事，一，认为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过。二，把劳动当作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三，要清心寡欲，享乐会妨碍人们对上帝的信仰。

我想，韦伯是过分美化了现代资本家，他们并不都是那么“高尚”的新教徒，挥霍、享受起来也不一定比封建王室贵族逊色。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的独立、行动、竞争、个人奋斗与不依赖父母的精神确实形成了现代西方价值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同样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它属于现代文明。而我们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恰恰缺乏这种现代人的品格。正如杨振宁、杜维明等美籍华人指出的那样，他们万没想到经过几十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国青年是如此鄙视劳动，害怕吃苦，依赖父母。

因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从资本主义文明中发掘、借鉴、学习有用的东西，这不仅指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技术，还包括政治建设中符合政治发展规律的内容，以及先进的思想文化。（图：王红卫）

大学生的“经商热”

本刊通讯员 赵文涛



经商，这个字眼一直与大学生无缘。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经商的热潮也波及到了大学。继“理论热”之后，大学生当中又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热点“经商热”。笔者最近对衡阳医学院进行了调查，发现，昔日大学生“口不言利，言必称义”的清高形象，被一股自发的经商热所取代。从3月底到现在，该院2000余名学生中，已有200多人自发形成20多个经商团体，原来那些“社团”“沙龙”都纷纷向这方面转化。他们大致从5个方面进行有偿服务。

一、传授知识。利用学到的知识，从事社会服务，获取合理的报酬。如85级学生小罗，课余时间给一名10万元户的一对儿女当家庭教师，每月工资可得20元，全年奖金700余元。由于小罗的尽心尽力，雇主不仅为其提供自行车，免费供应周末伙食，还许诺，只要儿女能考上大学，考上一个奖金1000元。如今小罗信心百倍，同学们也都非常羡慕。

二、文化服务。同学们的文化生活需求，为经商的大学生提供了市场。85级学生谢明等率先办起吉他速成班，40天一期，学员每人交费2元，入学者踊跃。一些同学深受启发，利用大学生中的英语热、音乐热等，摆小摊干起了出售录音带的买卖。还有的学生摆起了书摊，提供和出租最新社科书。尽管收入不多，但却尝到了经商的乐趣。

三、传授技能。气功作为古老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有其非同寻常的功用，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讲更有吸引力。于是，曾昭池等就办起了气功辅导班，每期60天，学费每人15元。现在他们已教授学员400人，光小曾一人就得了600多元的收入，他用这些钱买了单车，换上了新装，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朋友，您想尽快学会骑车吗？我部为您提供单车和教练，短时即可学会，收费每小时5角。”“你想具备社交技能吗？请参加交友舞、迪斯科培训班。”如此之类的广告，在校园随处可见。

四、信托服务。“朋友，看着您拥有的个人财产，定有尽管能用但您对其感情淡薄的东西。与其让它睡大觉，还不如欣然卖之，以换取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大学期间，购物应以实用为中心，R拍卖公司愿为您提供下列服务：拍卖图书、工艺品、球类、吉他、收录机和日用品。”以85级学生陈小平、周华松等组织的R拍卖公司，开张不几天，便有了200本图书，4把吉他，1部收录机和2架出租照相机，生意十分兴隆。问及收入，他们诡秘地一笑：“还可以”。

五、生活服务。远离家庭的大学生们生活上自然有许多不便，一些大学生则干起了生活服务的行当。有的与个体服装批发商挂上勾，办起“新潮服装公司”，大声叫卖。有

的开办生活服务部，熨烫衣服，修理电器、自行车。84级周铭艺，见个体饮食摊既贵又不卫生，便办起了粉摊，以每碗低3分钱的价格与个体户竞争，晚上为同学们提供夜宵。团委书记夏义生路过，被拉去捧场，结果多收5分钱，理由冠冕堂皇，“夏老师有工资，多收点钱。”

当然，利用假期当“倒爷”的也有，但毕竟是少数。

该院大学生“经商热”的兴起，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的危机感：

一、知识上的危机。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深感死啃书本，成为“书虫”，必将被时代所抛弃。现代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通过经商，三教九流都能接触，正是弥补知识不足的一条渠道。

二、能力上的危机。将来要有所作为，除了拥有广博的知识，还必须具备各种能力。于是他们把经商作为培养自己人际交往、信息利用、经营管理能力的好课堂。

三、经济上的危机。物价不断上涨，消费欲望又不断增加，单靠父母资助很难得到满足。通过经商，既可获取一定报酬，又为走向社会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打下基础。

问及是否会影响学业，他们大都说，毫无影响是不可能的，但不经商，业余时间也是在打牌、看小说、闲谈中浪费掉。与其这样，还不如干点事。我们当然也怕影响学业落个留级或退学的结局，所以平时更加抓紧时间学习了。干了一阵子以后，我们感到内心充实多了，也自信多了。

对大学生的“经商热”，校内外议论颇多，有些人很不以为然，有些人嗤之以鼻；大学生掉在钱眼里，教育事业令人担忧。而校团委的作法是提倡竞争，加强管理，把握方向，以期更多的大学生放下清高的架子，闯出自立的路子。



高国成

的「排列组合」



高国成正儿八经是条汉子：1.81米的个儿朝你跟前一站，腰板挺挺、双肩直直、两眼炯炯，完完全全地把军人的英武和潇洒结结实实地给你锁在那儿。更何况他还有数身的绝技：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吉他、提琴、二胡、舞蹈，大炮、小炮、雷达、无线电……几乎样样精通和过硬。他就是凭着这些硬朗本事，从军营中的一个小兵，直干到班长、排长、指导员、副营长、旅团工委书记。

1 1985年的一天，中国向全人类宣告裁军100万。这个消息对于一个中国军人来说，高国成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心里清楚中国军人为了世界和平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继续留在军营、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

高国成所在的部队由师改编成旅。绿色的军营依旧还是绿色，但绿色军营内的排列组合却发生了变化：指挥机关缩小、政工干部减编。11个营级团总支45个连级团支委书记全部易人，而排列组合到他头上的就

是由副营长改任旅团工委书记，而且只“光杆”一人。

2 军人不是天生就是军人。当高国成随同旅长、政委一起到连队检查工作时，他遇上了一连串的尴尬场面：在A连，见到的是一些战士蓄长发、留山羊胡子，白天溜出去滑旱冰，夜晚到舞厅学跳舞；在B连，听到的是有的战士盗卖公物，打架斗殴；在C连，指导员说：“拜把子”的同乡会在战士中盛行，还分“大哥”“二哥”，目的是为了“哥们义气”，不受别人欺负。基层团干部递给他的不是什么先进材料，而是一份份“关于给予×××开除团籍的处分报告。”高国成的脸火辣辣的难受。他觉得这是部队青年工作者的失职，而作为一名军人，没有什么比失职更为耻辱。

3 能责怪我们的战士吗？当他们被父老乡亲用颤微微的双手交给部队时，他们那一双双天真无邪、期待兴奋的眼睛里并没有包含任何贪欲。高国成想起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那时，他还是一名无线电报务兵。他和他的战友们出征前几乎个个个牢骚满腹，为“提干”，为退伍安排工作，甚至为评一次先进而斤斤计较。但一上战场，什么名和利、恩和怨，统统见鬼去了！那份热血，那份刚强，那份无畏和那份男儿气概，令人十辈子也回味无穷。高国成所不解的是：对于新一代中国军人来说，难道战争与和平就那样水火不相容吗？

4 高国成开始寻求答案。他用了几乎三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地下到全旅几百公里防区内的所有连队，向上千名团员青年调查了解，得出的结论是：受多年“左”的思想影响，新时期部队青年工作不能适应部队青年思想变化，其中，致命的弱点是把军营和社会人为地隔离和封闭起来，单调乏味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过时的陈旧的价值观念。

5 高国成想到了部队青年工作面向社会。他想用社会变革的春风吹活部队青年工作这潭死水，用他的话说就是“走出去”和“请进来”。

走出去，就是让部队团员青年走出营房，走进工厂、学校、街道、走到地方同龄人的生活中去，同同龄人一起交流思想、联络感情，让部队青年了解社会、了解同龄人、自己的人生。请进来，就是把地方优秀团员青年，优秀团干部请到军营，向部队干部战士介绍自己的奋斗成才经历，传授共青团工作经

验，畅谈自己的漫漫人生。

军营开始泛绿，部队共青团工作也开始有了起色。为了这“请进来”和“走出去”，高国成跑了驻地五县一市上百家有关单位。为此而得了个“长腿”的雅号。

6 高国成毕竟只有一双“长腿”。如果能凭这双“长腿”解决部队共青团工作的所有难题，他宁愿一年365天不停地跑下去，哪怕是把腿跑断。他计算过，如果每个团支部跑一天，要跑完全旅所有团支部，需要整整100天。100天后又该是怎么回事，恐怕只有天知道了。如果一双“长腿”变成十双长腿，百双长腿，全旅的共青团工作又将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7 2营有个排长懂专业，带兵指挥有一套。但干起团支部书记却力不从心。因为做团的工作不存在命令和指挥。团员青年对他很有意见，认为团支部徒有虚名。排长也满肚子委屈，口口声声表明自己不是干团支书的料，是上级逼他上的“梁山”。而14连班长邓力群自荐当的团支书，凭着知识和能力，硬是把自已的团支部搞得热火朝天。高国成从中悟出点名堂：得让那些想干而且会干共青团工作的人而不是让不想干而且不会干共青团工作的人干共青团工作。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团员青年说了算，民主竞选全旅团工委、团总支、团支部三级团干部。

8 方块加线条的军营容得下民主吗？战士中流行的一首歌中写道：男人可以学会抽烟、学会喝酒，学会织毛衣，但不能学会微笑。高国成对此深有感触。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广西凭祥。一个月黑天高之夜，他和班长一起摸到哨位。班长一声命令“趴下！”高国成便“扑”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很快，他闻到一股恶臭，胸口也感觉有团软乎乎的东西。他伸手一摸，发现自己趴在一堆大便上。他向班长请求换个地方，班长却丢来一句，“找死！”于是，高国成只得一声不吭地在大便上趴了两个小时，直到战友来换哨。

9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底下的军队都奉行这条原则。中国的军队也不例外。高国成深知在部队搞民主竞选所要担的风险，这种军营中开天辟地的举动所带来的风险足以使他掂量。他下到连队征求意见，调查摸底，发现全旅45名团支部书记就有15人不愿干，团的工作成了负担，9人不会干，没任何号召

力。270名团支部委员几乎1/3的人无群众基础，在团员青年中没威信。100%的团员青年反感这种“内定”“指定”当团干的做法。共青团干部队伍中不仅缺乏人才，连起码的热情都显得不足。高国成铁了心大干一场。在军营这个男人世界里，他的经验是不能让雌激素占了上风，先干再说。

10 军营沸腾了。共青团第一次把军营男子汉的热情煽动起来，全旅几千号团员青年无一不参加民主竞选。每4个团员就有1人自荐或他荐候选人。演说辩论，质询、掌声、笑声，如潮水般席卷军营的每个角落。当兵几十年的首长也不曾见过这种热烈场面：“我这人胆子小，平时不爱当众讲话，你们看我的腿在发抖……”站在讲台上——边发抖——边演说的是1营2连战士人称“胆儿小”的黄国华。他的脸憋得通红，手和腿在讲台上弹着棉花。14连团员朱革文，一看姓名就知道整个儿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臂上，胸上刺满了青龙和海鸥，自认为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打架闹事像一年中的节令。可民主竞选开始后，他竟变了个人似的兴奋和激动，跳到台上，第一次低下高傲的头，指天发誓要好好干。埋藏在军人心底的自尊自强的意识像火山般地爆发出来。民主竞选的结果是，全旅无一张弃权票。新当选的团干部，几乎全部是连队最棒的干部和战士。

11 一个优秀的团支部书记能带出十个、百个优秀的团员青年。民主竞选，使一批有威信，有能力，有热情的“青年领袖”当上了团干部。他们干起共青团工作得心应手，振臂一挥，团员青年就能群起响应。9连营房在山头上，连队没有篮球场，体育活动无法开展，连队干部为此作过种种努力。新任团支部书记韦锦义一当选，当即就发动全连团员青年，利用业余时间苦干了两个月，挖土石800多立方米，把篮球场建成了。4连团支部一班人，人人会吹拉弹唱。他们组织起“星星演唱队”，每周教连队新歌一首，每月举办晚会一场，成了驻地小有名气的“文艺团体”。全旅团组织成立了320个业余学习小组，建立军地青年联谊点58个，确定青年工程57项。每个团支部都成立了军事竞赛组，每周都有军事比赛，全旅出现了少见的练兵热。

12 高国成由此获得“全军优秀青年工作者”称号，并被南京军区推荐为“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获得者候选人。推荐者有眼力！

五四奖章评奖

“做团干部，就要有气派。那种站在厂长、经理办公室门口半天不敢进去的人，决不能做团干部。”

上面的话是王志明说的。

王志明，山东齐鲁石化公司团委书记，35岁，瘦瘦的，戴一副眼镜，看不出什么气派。不过他同朋友喝起酒来，每每大呼要“喝个透明”，结果别人一番痛饮后醉不支身，他仍在一旁插科打诨，没事人一样。不是酒量大，而是王志明会劝酒，这是有名的。

王志明说的气派不是外在的威风，这威风在王志明身上一点也没有，他也最讨厌人摆架子。机关大楼里，数团委办公室最活跃，在这里没人掩饰自己的思想和喜怒哀乐，这与王志明性格的活跃和随和有关。

但王志明也有气派。

1985年，王志明带领团委在公司组织交谊舞大奖赛。跳交谊舞当时在一些大城市已不算新鲜，但在齐鲁公司却是新鲜事。新鲜事，就有人看不惯。恰巧当时北京老干部合唱团正在演出，于是有人给经理李毅中打电话，说北京老干部在唱革命历史歌曲，这儿的小青年却跳迪斯科，乱扭乱跳，后进青年都去了，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王志明对团干部们说：我们搞大赛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为了热闹一阵就完了。我们是为了把存在于齐鲁公司中的封建思想冲击一下，要来一次置换，把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置换出去。咱们青年团干部是干什么的？就是干这个的！王志明向李毅中做了汇报，李毅中来到商店问售货员：什么磁带最畅销？售货员说：迪斯科音乐。于是李毅中在干部会议上说：青年人的爱好，老同志不要干涉太多。我们党的干部，要多看点书，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青年人健康的爱好，我们就应支持。青年人喜欢快节奏，迪斯科节奏快，你不喜欢，可以回去下棋嘛。下棋节奏慢。你不喜欢跳舞，就不要去舞场嘛。

王志明说：这话，听着痛快。

团干部们聚在一起，难免发一些牢骚，牢骚的中心往往是经费问题。王志明不发牢骚，发也没用。他



一个大企业的团委书记

找到公司财务处，商量为每个青年批3元活动经费问题，全公司共4.5万元。财务处打回。再找，又打回。得，Pass。王志明直接找到总会计师，说：我来向您汇报汇报工作。会计师笑了：怎么到这儿汇报工作了？王志明说：您要调到总公司去了，给我们留个想头吧。会计师问：什么想头？王志明把报告给了会计师。会计师看了，说：改改吧。王志明立刻改好，又送来。会计师说：我找经理去。于是王志明又迂回到经理李毅中处，先汇报工作，最后提出经费问题。李毅中说：报告我看了，我同意。第二天，报告批了。于是王志明带着团干部又找到会计师，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请他做做财务处工作。经费问题立刻落实下去，下面的团干部乐得捋胳膊挽袖子。

王志明说：发牢骚没有用，发牢骚是因为你打怵。你要有力气，事就成了一半。

经理负责制以来，王志明基本每月向经理汇报一次工作，不占经理7点到10点的黄金时间，只用15分钟，最后问经理有什么要求。王志明说：我不问“有什么指示”，我听见这话就牙疼。

李毅中希望王志明了解一下夜班工人的伙食问题。王志明干了一个星期，了解了工人的意见，连夜班工人带的是什么饭，值多少钱都搞清楚，然后向经理汇报：提高夜班费问题；上倒班的双职工孩子入托问题；夜班工人白天的文化娱乐项目的建设。……一二三，汇报完了，提出具体解决方法的建议。王志明说：光汇报困难不提出建议，那靠边去！

反映青年工人的意见，帮助厂长、经理进行决策，



上海钟表 全国冠首



jin Q u u



上海钟表公司 地址：延安东路110号 电话：210425 总经理：张国雄



活起来，与厂长、书记的关系融洽起来，不能见到厂长、书记，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

同时，王志明也常向团干部们讲，消极地等待上级的指示和关心是下策，而上策是学会影响你的上级，在这种影响中得到你希望获得的支持。这学问王志明是从《有效的管理者》中学到的，学了就应用而且在团干中推销。

王志明在团的工作中施行的是目标责任制。每个人各司其职，制定工作目标，讨论议定后，个人负责完成，团委定期讨论、修改或补充，而在完成过程中，王志明一般不再过问。有的团干部开始不习惯，见了王志明就问：志明，怎么不开个会啊？王志明说：开会干什么？目标明确了，你去干就是。王志明大撒手，但他是外松内紧。前年他做了阑尾手术，出了院就到了办公室，给二级团委书记打电话，与他们聊天，聊房子，聊老婆，嘻嘻哈哈，工作怎么样，王志明不用直问，聊一会儿都知道了。这是王志明的本事。

王志明精明能干。他说：我是从学徒工干起的，眼里能没活？王志明善于变通，不蛮干硬干，对各种关系照顾周到。对此，王志明说：我当过工人，当过车间干部，又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接触过，我知道怎么处理好人的关系，但目的是为了把事情办好。王志明厌恶官架子，他是个随随便便的人，但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使他的伙伴们知道不能敷衍工作，而且在他的感染下拼命工作。

王志明知道自己已到“转业”的时候了，他已为公司团的工作建立了程序，他的不少工作方法已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但王志明依然满脑子事要做。公司团委承包了一个工程，上万元的经费到手了。有了钱，王志明腰又粗了不少，于是不少新的点子又冒了出来。这使团干部们对他非常钦佩。

来北京参加共青团十二大的一位山东代表说：山东团干部有个特点，就是嘴里没那么多新名词，但都踏实肯干。王志明可以做为这句话的印证。但王志明可不爱沉默，他爱与人神聊，而且发自我那瘦瘦的身体中的大笑也挺能感染人。

这就是王志明，一个大企业的团委书记。

团干部在这时便是桥梁。这桥梁不是可有可无。没有它也许不会觉得怎么样，一旦它架起来，你就会发觉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政治工作成了一个难题，本来就无权无钱的共青团如何生存下去，更是一个问题。王志明在1985年开始主持团委工作时，就已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看到，在齐鲁石化公司这个大企业，青年职工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大，而这便是开展共青团工作的沃土。共青团的工作应与发展生产同向。于是王志明提出了共青团要创名牌：在新的建设区开展为重点工程献青春活动，创建青年工程；在老区工厂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竞赛，创建文明岗。几年来，公司团委屡次获得了团中央、总公司、山东团省委的嘉奖。经理李毅中在调离公司时的送别宴会上，端起酒杯，向王志明表示了由衷的感谢。王志明知道，这是对共青团工作的肯定。

共青团干部要活份，切忌死气沉沉。王志明常以此提醒他的伙伴。王志明曾带着公司团委一班人，开上一辆吉普车，到二级单位的党委书记家，登门拜访，感谢对团的工作的支持，交换对团的工作的看法，并开玩笑地问上一句：张书记、李书记，有什么困难没有？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化厂的朱书记，能记着团支部书记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王志明握着他的手说：朱书记，能记住我们团干部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书记，您是第一个。王志明说得真诚！朱书记高兴得脸红了。回去的路上，大家开玩笑地说：志明真可以，团委书记表扬起党委书记啦。王志明说：我是想让团干部们

上海钟表公司是由上海钟表工业供销公司、上海手表二厂、上海第三手表厂、上海钻石手表厂、上海手表五厂、上海钟表厂、上海钟厂、中国钟厂、上海第四钟厂、上海电钟厂、上海钟表元件厂、上海钟表元件二厂、上海钟表配件三厂、上海表壳一厂、上海表壳二厂、上海华中异型表壳厂、上海钟表材料厂、上海钟表钢材厂、上海钟表工具模具厂、上海钟表研究所等36个企、事业单位组成的经济实体。现有职工2.5万人，厂房面积38万平方米，主要设备2万多台（套），固定资产近3亿元。

公司主要生产宝石花、海达、钻石、金鹰、精达等牌机械表、石英表、砂表、怀表和钻石、三五、马牌牌闹钟、闹钟、各种特殊用钟以及各种表元器件、零配件和钟表的专用材料、工装、设备、仪器等，热烈欢迎与国内外企业界人士广泛合作，开展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业务。

上海钟表公司预祝“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评奖活动”圆满成功



创造， 一个甜蜜而 又痛苦的字眼

——记青年发明家周林

● 晓 剑

“一个民族丧失了创造性，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压制创造，也就是取消了生存的权利！”他这样说过。

他以他那永远不会泯灭的热情目光看到了什么而发出这样悲愤的呐喊？

是的，他看到创造这一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似乎在 960 万平方公里广阔而古老的大地上消失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水瓶、电子表、铝合金门窗、电热水器、收录机、录相机、电视机、石英钟、吸尘器、卷发器、煤气灶……大多是舶来品，以至于那些稍有影响的小说、电影、戏剧、绘画、诗歌、音乐，都可以使你从中找到外国同类艺术品的原型或影子。

谁能否认这个现实？！

面对这个现实是痛苦的，有着使人类震撼的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世界四大发明的故乡啊！

推翻这个现实更是痛苦的！因为，只需要有惰性就可以麻木地面对悲剧，我们的民族恰恰不欠惰性；而改变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走向炼狱！

他从炼狱来。他用青春的全部经历体验着这样一个真理：创造，一个甜蜜而又痛苦的字眼！

他渴求创造，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也不愿失去创造的欲望。他并非每时每刻都把拯救一个民族、使它恢复向往新生活的灵魂当成责任，但他确实从没有把耻辱当成是个人的。

当那个枯瘦如柴的瑞士老太太面对他和他的治疗机轻度地说，“我不接受这种治疗，中国只有红茶菌和巫术”时，一贯性情和善的他发怒了，“我这是科学，我这种仪器治疗你这种病是最优秀的，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中国人谦逊的美德呢？但他本能地懂得，中国人更需要的是自尊、自信、自豪；否则，谦逊的结果便是再有多

少代也无法解脱的民族自卑的痛苦。

那是一次没有金牌的较量，在第七届世界自然疗法博览会上，各国最先进的自然疗法医疗设备云集巴塞尔。按摩器、磁疗机、太阳浴床、水浴盆、脉冲仪等，琳琅满目，各种肤色的美女操作着这些仪器，热情地伸手去拉住每一个从展台边经过的参观者，使之体会疗效。他没有携带中国美女，他的多功能治疗机也没有那么华丽夺目，但他治好的一个又一个病人在验证着他所创造的神奇仪器。

终于，瑞士发明者协会副主席被他的仪器所震撼，前来邀请他去为年迈的夫人治病了。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下肢缺血，已经长期不能行走，腿、脚到处糜烂、化脓，尽管她拥有高级私人医生，请过欧洲和美国名医治疗，却都没有效果，她对此生治好此病已失去信心。

他去了，他对老太太的态度愤怒，但却信心十足地让她试试，哪怕只试一次。

夫人要请示她的私人医生，那医生说：“可以试一次，但她伤口中有各种细菌，传染上我不负责任！”

同意一试试就行！他打开治疗机，才为老太太照射了十分钟，她就感到已经失去知觉许久的大腿有热流传至大脑，以至于她担忧血流太快，会使她心脏病发作。

第二天，夫人的私人医生看到她一直流水的疮面已经干透了，不禁大惊，认为不可思议，当场表示要把她给他的全部费用转给年轻的中国发明家，并且要与之合作。

他没有这个权力，他遗憾他没有力量去创造个人和外国人签合同先例，以至于失去使国家赚得外汇的机会。

尽管瑞士老太太很怕心脏负担不了，只照射完第二次，就拒绝继续治疗，但当他十天离开瑞士时，她丈夫在电话里这样告诉他，“已经好了，她可以行走了。”

他并没有特别的兴奋，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样的病例太多，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也因为他作为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承受欢欣和痛苦的能力比任何前人都强！

他的那套没有任何创造性的组合柜里摆着8块从国外拿来的金牌，这是外国人为了表彰他的那一系列发明创造而发给他的。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金奖，比利时国王颁发的一级骑士勋章，国际新发明博览会银奖，卡洛国王特别奖（此奖国际上仅发过三枚），比利时卫生部长特别奖，国际新发明博览会金奖三枚。

他的发明创造生涯是从一台冻疮治疗机开始的。即使到了他享有8块国际金牌的今天，他影响最大的仍然是那治愈过成千上万冻疮患者的冻疮治疗机。因而，不少善良的和不善良的人在谈到他发明创造动机的时候总是说：“因为他从小就生冻疮。”

这肉体的痛苦毫无疑问给他某种动力，但他更经常的是想着这样两个可怕的数量：按生冻疮率3%计算，每年中国有3000万以上冻疮患者；两次世界大战因冻伤而非战斗减员100万人以上。

其实，使他萌发实质性创造欲望的是牛！这种契机更为纯朴而简单。有很长时间，他上下班都要从郊区的农田边经过。看着那人类几千年前第一次所使用的非自身动力——牛，他感到的是无法抑制的心灵痛苦，现在已经是开发外层空间的年代了啊！

就算一些人理解他心灵的痛苦，说他只不过由于自身伤病而萌发了些许创造欲望，他也绝非渺小。因为除了创造，这一生中他没有什么别的追求了。这种创造的实质，就是为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以往形象，而不是去加深外国人以往对中国形象的印象！

冻疮，这是一到寒冬就会折磨许多人的疾病，早在公元前230年就有人研究其治疗方法了。直到现在，中西医有了上百种治疗手段，但不是些保护药物，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涂料。

面对大量资料，他得出一个结论：需要彻底改变以往的治疗方式，甚至治疗理论。

任何创造都是基于革命这一前提的！也就是否定过去。他的天赋，他的经过大学学习所积累的科学知识，他的善于观察的眼睛，使他想到了“谐振作用”。倘若研制一种仪器，使人体的基本质点也能谐振起来，那么，血液循环将得到改善，组织营养和新陈代谢也随之得到增强，得冻疮的人体环境就会消失，冻疮不是就得到根治了吗？甚至还可以治疗其他多种人体循环不良的疾病呢！

依据这个理论，他拿出自己微薄工资的全部购买电子零件，进行研制。

这不是恋爱，他却倾心而待。他在很长时间里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当时自己都无法预见其轰动效果的一台小小仪器上，以至于几个有意于他的姑娘都感到了阳光的暗淡。

他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山坡上，他曾在这里和同伴们

建立起了一座工厂，经过3年大学学习之后，又回到了这里。

那每天第一个被山谷的浓雾遮掩的小屋就是他的住处，这间小屋昏黄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1978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台有点像新式台灯般的小玩意儿诞生于世了。对于人类，它可能还不会像爱迪生的魔盒那样震撼，但对于每年几千万冻疮病人，却是实实在在具有深远意义的福音！

他需要病例来验证仪器，最好自己立刻就是病例。可十月的天气，昆明还不足以让他生冻疮，他也没钱购买冷冻实验设备，于是便把凉水于深夜最寒冷时提到屋外，把手脚浸泡进去，使自己生出冻疮来。

当他把冻疮放在仪器下面照射了20分钟后，他的预想出现了，创面疼痛止住，脓水干枯，第二次照射，嫩肉上便复盖了痂皮。几天过后，冻疮痊愈了。他不敢相信这奇迹，又重复了一次人为的冻疮过程，这回竟然只照射一次就好了。

他奔走相告，但人们无法相信。正好有一位团支部书记患了冻疮，脚肿了，皮破了，不能行走，他请此人去治疗，照射一次见效，四次就好了。还有几个人不但治愈了冻疮，而且在同样寒冷、潮湿的情况下，不再复发。

整整一个冬天，他在厂内外治好了100多个冻疮病人，实践证明了他的成功。他感到初恋般的甜蜜充盈全身。此时，他还不敢把这和发明创造4个字联合起来，他只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颗心愿。

他没有时间总结冻疮治疗机的理论，尽管今天的专家认为他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应该被称为“周林体系”。他太渴望实践了，太渴望一个又一个冻疮病人在这台小巧仪器的照射下解除痛苦了。

一个不是大夫的人在治疗病人，不务正业！

多少年轻的灵魂被埋葬于不务正业的大山下，罪恶啊。那些创造出不务正业词汇的人，使成千上万青年从此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他们美好的想像，也就是创造的源泉被永远冰封于冻土带！

在他进入了一家轻工研究所后，认为可以用研究所的雄厚力量推广冻疮治疗机时，所里的领导却告诉他：“轻工所只能搞轻工，推广是商人的事，只要我在，你就死了这条心！”

他并不高大魁伟，也从没有故作深沉状，更不会时时把男人的尊严挂在嘴上，而他却大逆不道地向“不务正业”挑战了！

正值一场强大的寒流给昆明人带来疼痛难忍的冻疮，他觉得天降大任于己了。他要继续“不务正业”。

他把在家里闲置了不少日子的仪器拿出来，每天东西跑地为患者治疗，那种神奇的疗效使这台冻疮治疗机名声大振，求治者络绎不绝，这时，一位副所长支持了他，不但让他到了冻疮发病率较高的工学院进行治疗，并召开了省级鉴定会。在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下，冻疮治疗机通过了省级鉴定。

但是，所里主要领导对待这个结果的态度是：“这是连医生都不干的事。”“这种事以后不准开鉴定会了。”

他仅仅是为了得奖吗？虽然，一张奖状，一个奖杯，一块奖牌可以使人得到莫大的宽慰。

他的治疗机本来已经评上了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并且报社已经做出了见报的清样，但不知谁一个电话撤了下来，他去找领导，领导不管，去找领导的领导，依然是推托了事。一个支持他的教授说：“这仪器的原理是发现了新大陆，开创了一种治疗新方式，我要是你，根本不要云南的奖，而是要到国外宣布重大发明！”

他苦笑，当他们仪器获得国家经委“金龙”奖时，所里领导根本不通知他，只发给他一张票，说是去听报告。他坐进会场，听到念他的名字才知道获了奖。

为此，他在爱人预产期临近，并且确诊是臀位的情况下，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优秀新产品展览。不解的是所里不给盖章，主管厅也反对他去。但他已经熟知创造之路的艰难了，毅然去了北京。虽然报名期已过，但负责同志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热情为他安排了展位。

当他从北京回来之后，妻子已经超过预产期半个月，他送爱人到医院一查，妇产科主任发火了：“你们简直在拿生命开玩笑，马上动手！”

他的儿子降生时，已经窒息，经过抢救，才有了呼吸，而爱人拆线回到家中，由于缺少照料，一连10天高烧不退。奖并不能弥补这些。一直到今天他都对自己的家庭充满歉意，唯一使他获得安慰的是人类正在接受他的创造！

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外国人会在他的本子上签上：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周林先生，因为他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

他也许还会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会比自己的同胞对治疗机热情一百倍！

1985年10月，他从飞机上下来，一脚踏保加利亚的土地，就有人告诉他：“你可能得金奖，因为来问这台仪器的非常多，大会主席要见你。”

果然，他的仪器在世界首届青年发明家科技成果展览会上轰动了，当保加利亚新闻中心主任的父亲从500公里外赶来，治疗了若干次就扔下拄了许久的双拐，可以行走时，他顿时成了真正的新闻中心。

保加利亚人是很懂礼貌的，但为了能被这台仪器治疗居然吵架了。保加利亚副总理也前来参观，并指示不要收走仪器，长期展览。

他不再是发明家，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从早到晚，一刻不闲，甚至连中午都不能休息，只好早晨从旅馆里抓上两个面包做午餐。

当11月15日，获得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金奖的金色徽章被工作人员贴在他的仪器上时，他觉得这是必然的，这是一个经受了无数磨难创造者公正的结局。

1万多项发明中，只有区区200个金奖啊！

当热情的人们拥抱着他时，他也许是木然的，他想起

了什么？

那遥远的故乡，那瘦骨不堪的妻子，那严重发育不良的儿子……那自己未知的前途。

一个获得世界金奖的发明家竟然对前途感到渺茫了吗？是的，他的故乡虽然极其缺少发明家，但却不乏给发明家头上遮起阴云的人。

他从1984年11月份起就手无分文地“流浪”了。为了他那创造，为了让人们能够了解和用上他们的创造。

金牌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吗？

多么悲哀啊，数不清的中国人才要靠外国人的承认之后才能从压抑和埋没中挣脱出来！

他给研究所的领导写了报告，又直接上书省领导，表示不要国家一分钱，成立一个研究所，推动发明创造的广泛开展。

省里领导支持他，但到具体落实时障碍重重，还所谓中枢阻塞。

他困惑了，为什么一些中层干部会如此阻挠改革？他们甚至从没有停止过对他发明创造的干扰。

他还远远没有深刻了解中国，没有了解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也没有了解自己的故乡为什么还有许多地方处于极度贫困中！

“立正！敬礼！”解放军某部后勤部长——一个老战士领着自己的部下排列成整齐的队列，向他——一个年轻的发明家致以最高的敬意。

这是1984年春节过后，应沈阳军区司令邀请，他深入到东北的冰天雪地之中为战士们治疗冻疮，给军医们办学习班推广冻疮治疗机的使用后，得到的最高奖赏。

面对战士们热忱而严峻的目光，他感到的不仅仅是衷心的感谢，还有一种不屈不挠、勇敢战斗的精神，一种要保护人民安全和幸福生活的广阔胸怀。

是的，一个发明家理应是一名开创新生活的勇士！也就是说，当人类需要时，必须作出自我牺牲。

9个月之后，他选择了牺牲者的道路。他不能浪费时间了，在自然疗法领域内，他领先了外国人三到五年的时间，若一旦失去这时间，将会使中国人在国际上不多的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又少掉一项！

他把“停薪留职”的报告交给了领导，表示要挣脱束缚，打开发明创造的新大门。

“为什么还要留个留职的尾巴？你不是要彻底改革吗？那就干脆退职好了！”有人这样回复了他的报告。

他只有离职而去了。

他来到大兴安岭的深山之中，用借到的5000元钱请人拍摄在最寒冷环境下使用冻疮治疗机的电视片，用以宣传和推广这一发明创造，而他却无钱为自己购置冬装，在零下二三十度气温下，只有一种在春城御寒的毛皮裤和一件借来的军大衣。

那些阻止这科教片播放的人不感到良心的刺痛吗？！

其实，年轻一代并不喜欢吹嘘经历中的磨难和痛苦的煎熬，因为他们还有漫长的人生之途可走。

当他走上香港中文大学讲坛之时，所流露的是愉快而充满自信的神情。

他忘记在流浪之时，而对量向全国的诬陷他的红头文件和送至中纪委及法院的告状信，依然顽强拼搏，而终于疲惫不堪，没经过输血，就被医生确诊为肝炎，住进医院的日子了吗？

住院近一个月，没有任何地方给他报销，只能够借债交纳医疗费，至今他还收藏着那500多元的医疗单据。

一个免费治愈了成千上万人的发明家却靠借债来医治自己的疾病！

他想到死，这一点也不庸俗，巴金认为老舍的死是一种抗争，人民认为范熊熊的死是一种醒世。那么，他的死不也会是一声警钟吗？

但是，他没有死，他不敢说自己比老舍和范熊熊更坚强，他只是认为历史不会再现那时的黑暗，故乡的阴云不能笼罩住全国的艳阳天！

他带着“要绝对卧床休息”的医嘱，背着3台共重70公斤的样机和资料，再一次自费奔赴北京，参加世界青年科技成果展览大会的选拔。

当他浑身虚汗，走进团中央地下室的招待所时，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然而，第二天他没有任何准备的答辩，以创造性的理论，不容怀疑的疗效震动了评委，以至于科委成果局局长让他马上回去准备出国时，他的肝部突然不疼了，浑身轻松，忘记了连回昆明的钱都没有，也不知道出国的钱从哪出。他只觉得他比许多年轻人都幸运，因为他的磨难没有白受。

他没有向香港的学者和人们讲述这些，他不愿给祖国和故乡的形象再添丑陋，虽然他真诚地希望一些中国人应该彻底地换掉大脑。

他宣传着自己所从事的“朝阳科学”，宣传着代表中国人智慧水准的系列治疗机，从而改变着大陆科技人员的形象。

他哭了，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哭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吧。

从保加利亚捧着金牌回到祖国，故乡依然冷漠地对待着他。尽管他的仪器还获得了医疗器械中唯一的全国发明奖，尽管科委和中组部联名打电报到了昆明。

他哭得太伤心了，在国家科委和组织部的座谈会上，他整整5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是为自己的委屈吗？是的，他不否认这点，但更是为了祖国，为了故乡。一个太忠诚的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僵化状态的，他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第二种忠诚！

他想起了自己曾和伙伴们扛着水泥电杆爬在陡坡上，想起故乡越来越少的树，想起昆明城坑坑洼洼的道路，想起全省招聘进几个知识分子却离开了几千知识分子，想起有人对他说：“省长管全省几千万人，不管你一个人的事！”他发言了，鼻子在喷血，火气太盛，肝又在疼……

新闻界被触动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报》纷纷发表大块文章，以至于香港《明报》也在声援。

历史终究要发展，民族必然要进步！

在中央领导人的直接过问下，他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实现了创办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愿望。他和读者一同得到中国式传统的结局——大团圆。

他绝不认为这是他人生的顶峰！

全国青联委员，省自然科学研究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省劳模，昆明市青年十杰，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云南省发明协会副会长，云南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

即便是1987年9月，他那台被称为“东方催眠术”的《生物反馈血压调整仪》荣获卡洛路国王特别奖时，他也觉得人生漫漫，还有许多的事情等待他去做。

做为一个中国的发明家，他的确在马德里国际新发明博览会上享尽风流；教育部长由中国大使陪同前来治疗高血压，20分钟后便降至正常；大会主席来治疗失眠，7分钟内就在乱哄哄的展厅内睡去。大会为此感到为难，认为他们说的奖牌不够奖励他的规格。

于是，他得到了国王的勋章，整个世界，他是第三个得到这个荣誉的。也于是，一反领奖人上台领奖的惯例，大会主席走下台来，紧紧拥抱住他，向他颁发了那块无数专家、学者向往的奖牌。

看着这块奖牌，他想到了诺贝尔奖！中国人在那里还是空白，正需要勇于创造的人去树立中国人的光辉形象！

但就是站在瑞典的领奖台上，也远非一个中国青年创造者的人生目的和甜蜜的终结！

创造就是为了得奖吗？创造仅仅是让五星红旗在某一个国际展厅或博览会广场上升起吗？这是他今天的惶恐，更是他今天的苦恼。

是的，国家科委的领导人鼓励他，“中国女排得了三连冠，我们科技界为什么不能出现三连冠呢？用你的发明创造去连续获得国际金牌吧！”

是的，他的故乡有人问：“周林在保加利亚无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有本事再到国外拿一次奖！”

他承认，他第二次出国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的。

他使用由冷冻治疗机发展而成的多功能治疗机，奇迹般地治好了一个多方求医而不愈的神经性腹痛患者，以至于这个人不敢进行第三次注射，怕解不出大便；紧接着又治好一个脚部骨质增生的妇女。

在比利时尤里卡国发明博览会上，他又一次激动了，电视台天天采访，大会主席亲自介绍病人，展台边求医者围得水泄不通。搞得其他展台的外国人提出抗议，因为没有人去看他们的展品了。

大会主席，法国、西班牙、瑞士的发明协会主席纷纷拉他在五星红旗下合影留念。

不是命，靠的是 努力和真诚

——记薛景文

● 王 林

好像是人各有命。

20多年前，学校组织看电影，薛景文连一毛钱的电影票钱也拿不出来，那时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来要当这个有9000名职工的工厂厂长。

1967年的一天，薛景文正在学校参加军训，这时，父亲来了，父亲同老师讲了几句话，老师便把他叫出了队列，父亲拉着他走出学校，告诉他，他该接父亲的班了。

那年薛景文16岁。

18年后，薛景文当上了吉林省石砚造纸厂厂长。这时工厂也是处于连续18年冬季枯水、秋季少电，利润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的困境之中。

两个18年，像是巧合。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厂长，即使给我们同样的机会。厂长应该是什么样的，谁也说不清。

薛景文呢，薛景文很普通。

薛景文个头不高，谈吐和缓，表情温和，待人热情。在他身上，看不出带有传奇色彩的东西，我们也无法用“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之类的词语形容他



所进行的改革，但他给人的感觉是稳健扎实，他的眼睛不是流光溢彩，而是深藏着机智和坚毅，给人一种平和和信赖之感。

这一点来自他普普通通的经历。在这些经历的分析中，我们也许会发现生活其实随时给每个人创造着成功的机会和补充着营养。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

薛景文的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父亲是造纸厂原木场拍木头的工人，长年劳作，脖子上磨出一个厚硬的肉茧，这在薛景文心里留下了混杂着各种感情的回忆。父亲每月48元工资，担负着全家五口的生活。一直到上延边大学读书，薛景文未穿过一件新的毛衣。贫困的生活使他懂得勤俭，同情别人的疾苦，也使他一直未染上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因此而不爱幻想。勤奋努力，是他行事的准则。

薛景文带着孩子气，不得已来到了化学浆车间蒸煮工段，在充满瓦斯味的热气中，一干就是5年。5年，那一点孩子气随着汗水流走了，薛景文似乎服从了命运的安排。他眼快手勤，自己能干的活就不让师傅干。师傅们喜欢这个憨厚的小伙子，都愿意教给他技术，他只用了4年，便当上了车间最高岗位的蒸解手。5年的生活，使薛景文懂得了一个人应担负的责

12月5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市长身穿皇家军服，腰挂长刀，在4个女警察陪伴下，以国王名义向他颁发了个人发明荣誉最高奖——一级骑士勋章。

他是此次博览会获这个奖最年轻的发明家，他的获奖照片被向全世界印发。

以后的几年里，他一口气夺得8块金光闪闪的国际奖牌，实现了科技界三连冠的愿望。

但是，他的惶惑没有消失，苦恼没有减轻。

为什么他不能把他的创造卖给那个提出购买要求的法国财团的首脑？他创造的目的不就是要使之达到被全人类使用的社会效益吗？

为什么出国参展总是讲“我们是去交学费”？

中国的发明创造何时才能从展厅和橱窗里走向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他想起了中国模特儿身上色泽艳丽的新款服装，也想起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服装依然是那么灰暗和单调……

他觉得中国目前缺少的不再是金牌！不，不是因为他自己拿够了，不缺少这种荣誉了，而不想让别人超过自己。他只是认为中国普及科研成果的障碍太多太多。

这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无法摆脱的困惑和痛苦的根源！

推广，向全人类推广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而不只是在沙龙中获奖，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形象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他今天的工作。

任。他敬重师傅，一直到今天，提起师傅都是充满深情。师傅不让他抽烟，酒可以慢慢喝。到现在他一支烟不抽，白酒却已经可以与人对着干到底，这一点连有“酒库”之称的厂部机秘书也自甘认输。这5年的生活，我们将会看到在薛景文后来生活的转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2年，经推荐考试，薛景文进入延边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他回厂担任了团委副书记，他本不想干，但他没有拒绝，而且一干就干出了兴趣，这一年半的团干部生涯，给他留下了充满生气的回忆。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大批青年工人，1975年以前入厂的青年工人他几乎全认识，而这批工人现在正是工厂中的骨干。这对他后来的工作至关重要。

1976年底，在三结合中，薛景文当了厂革委会副主任，他起的是降低革委会平均年龄的作用。同时，他是党委常委，分管生产，兼生产科科长，时26岁。

1979年3月，整顿领导班子，双突干部全下来，薛景文回到了化学浆车间任车间主任。此时，12年前领着他进车间的师傅是副主任，薛景文力请师傅当主任，他做副手。师傅不干，他信得过自己的徒弟。一干又是5年，在老师傅的全力支持下，车间4年被评为先进车间。这期间，他学会了管理生产，这为他后来担任厂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已决定了今天的成功。他知道了车间是怎么生产的，他了解车间工人的苦恼，现在他在车间主任们面前不是外行。在生产调度会上，他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却自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他可以敏锐地发现错误，批评车间主任时句句在行。这服人的力量，是得自他有5年的车间生产管理经验的，而他所以能在老师傅的支持下充分地获得这些经验，又是得力于他最初5年的工人生活。那时他凭着热诚无意中打下的基础，在今天显示出了巨大的承受能力，在这上面，他可以充满信心地建竖

自己事业的大厦。

这好像是命，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握住每一时刻生活给我们的安排。而诚实努力、热情肯干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也不会放过生活显示给我们的每一次机会。薛景文就是这样。

1983年后，薛景文做过副厂长、厂办主任、党委副书记。1984年，深受薛景文尊敬的老厂长病逝，1985年2月，薛景文担任了石砚造纸厂厂长。薛景文把握住了生活给予自己的一个崭新的机会，3年来改变了石砚造纸厂的面貌，创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继而又荣获了“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的称号。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奖章而干的，他的目光很远，工厂的水库即将建成，热电站也将投产，1985年以来，每年造林50万亩，为工厂50年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工厂要有后劲，薛景文要做的是有眼光的企业家。

这一切是薛景文的命？如果是，那么重要的转折点在哪儿？不是在当厂长的1985年，而是在担任车间主任的1973年。

薛景文一人并无回天之力，在他的周围，有朋友一样的同事支持他，有经验丰富的长辈辅佐他。老厂长李玄瑛有“造纸国王”的美称，退休后，依然乐意协助薛景文工作。不是薛景文因为当了厂长才需要礼贤下士，而尊敬师傅和长辈、与人坦诚相待，这一因素早在20多年前就已形成。因此，一切过往的生活在将来都会找到回应，一个人只要生命在延续，你就要为以往的过错付出代价，为以往的努力收获果实。——不管你有意无意。

这不是命。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薛景文有意无意地走到今天，全靠他的真诚和努力。

(照片为作者与薛景文合影)

他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事，交给下一代去做没有道理，虽然我们承担了上一辈留下的债务！”

他所不理解的是：外国一下子签定了以1500万美元购买他的仪器的合同，成为建国以来医疗器械出口的最大的一次合同，而我们国内却还远远不能普及，尽管百分之九十的农村缺医少药，尽管大城市看病难、住院难。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在责难、反对、告状！

要改变中国人的形象啊，而不是去加深中国人小脚、长脚、马褂、姨太太、内讧的形象！

一个80年代的创造发明者所面临的任务绝非仅仅是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他必须也必然要承担着对社会进行改造的重负。否则他的发明会等于零！

他叫周林，34岁，在他的房门口至今留有别人写下的“周扒皮”三个大字。

当第七届人大代表大会证书发到了他手中时，他感到的仍然不是甜蜜，而是责任，是一种紧迫感，是成千上万科技工作者痛苦心灵的聚集。

特异功能在向牛顿定律挑战！

多维空间在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挑战！

他特要在第七届人代会上大声疾呼：为创造者，为一切不循前人之途而行者！

颀长的身材，白净的面庞，眼镜后面是一双常常好奇地睁大的眼睛。这就是青年作曲家苏聪，第60届奥斯卡电影音乐创作的获奖者。

影坛大师与乐坛小辈

西柏林一间极平常的寓所里。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苏聪从睡梦中惊醒，他抄起听筒，心里暗骂，是谁这么早来打扰他，今天早上还有最后一门课要考试，休息不好非得考砸了不可。

“苏聪先生吗？”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电影《末代皇帝》的副导演，导演本那多·贝尔托卢奇先生让我通知你，经过一年多的挑选，他决定将影片中的部分音乐交给你来完成……”

他懵了，后面的话只听懂了一句：“现在是柏林时间几点？”

“大概是10点吧！”

“好，请在一周之内赶回北京。”

苏聪放下听筒，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液晶版上显示的却是：1986年7月16日早晨5时。

他极力想按捺住许久没有的冲动和喜悦，他知道他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出乎意料的机会，一次终于争取到的机会——

苏聪198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随即便来到联邦德国，就读于慕尼黑音乐学院作曲研究班，1985年转到西柏林自由大学约·库克尔兹教授门下专攻博士学位。

就在这年初，他偶然地在一本电影画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当今世界十大著名导演之一本那多·贝尔托卢奇要拍一部描写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生的故事影片，片名叫作《末代皇帝》。他眼睛登时一亮，他早有写一部电影音乐的风愿，这部影片或许要一个懂中国音乐的人来配乐，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他把自己作品的录音和履历寄给了这位名导演。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查询的结果是，他寄去的磁带和履历丢失了。他赶紧又补寄了一份。却又听说，贝尔托卢奇已选定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外国作曲家。

他觉得自己太可笑了：“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拍摄尚未开始，世界影坛就已哗然。贝尔托卢奇用了4年的时间做了充足的准备，演员、摄影、制片都是世界一流的。这是他向奥斯卡奖冲击的影片啊！而我，初涉乐坛的小辈。”

是啊，苏聪虽然已创作了一些较为成功的管弦乐、室内乐和声乐作品，但从未写过一部电影音乐。

那时，他没有想到，贝尔托卢奇这位慧眼独具的艺术大师，已深深地爱上了他作品的细腻和高雅，只是对他尚无比摆——

而今，苏聪怎么能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呢？

五天后，他叩响了《末代皇帝》北京摄制现场导演办公室的门。“你就是苏聪？”贝尔托卢奇瞪大了他很少惊奇的眼睛，“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刚20岁吧？”

“我都30出头啦！”他打消这位大师的不信任，随口撒了一句。

“我请你非常严肃地回答我，你能否保证写好？”贝尔托

卢奇脸色阴沉地问。

苏聪明白，导演需要的是肯定的回答，因为他要拍摄一部绝对成功的影片，一部超过以往几部同一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杰作，况且，制片商已准备了3000万美金的赌注……

“我从未写过电影音乐……”苏聪不想下保证。

制片商来了。他与贝尔托卢奇商定，暂不与苏聪签下合同，让他先写影片中的一小部分音乐试试。行，就留下；不行，则请便。

然而，第二天，苏聪去北影厂，又不小心碰破了头，满头是血。贝尔托卢奇一见头缠绷带的苏聪，大发雷霆：“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别的作曲家我都辞了，你偏又出事。”贝尔托卢奇真有些急了，开拍的日子即在眼前。但当他看了一眼苏聪的目光后，说：“算了，去买个摩托车头盔戴上吧，免得下次再碰破了头。”

更为严峻的是，苏聪第一次明白了给电影配乐与自己创作完全是两回事。他要体现的是导演的艺术构思，而不是自己的，“首先要满足的不是你自己，而是观众。要让各国的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到美。”贝尔托卢奇对苏聪说。

第一稿完成了，苏聪兴冲冲地找到了导演。没想到贝尔托卢奇听后，大泼冷水，“不，不，太俗了，不高雅。”他又去写，7天内4易其稿，直到贝尔托卢奇对第5稿表示满意为止。可谁知在这7天里，只有4个夜晚，他合过眼。

离开机还剩一小时了，导演贝尔托卢奇将苏聪叫到了身旁：“苏，我想了想，觉得那第2稿要比现在的第5稿好得多，还是录第2稿吧。”苏聪哭笑不得，前几稿早不知她到哪里去了，现在找怎么来得及？贝尔托卢奇却不容置疑地说：“你马上去想，就地抄谱排练，快去！”苏聪只好找到一个僻静处，抱着头使劲地回忆起来，然后又匆匆地指挥乐队排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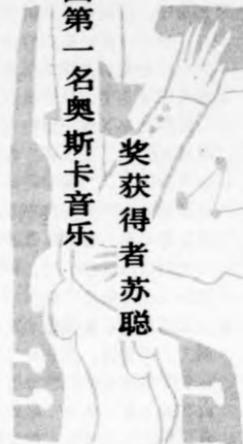
此后，苏聪变得聪明起来，他把每段音乐都写上三四稿，以供这位挑剔的导演挑选。

20多天后，大导演终于和这位小伙子签订了《末代皇帝》同期录音部分配乐的创作合同。末了，干脆把后期部

破晓

记中国第一名奥斯卡音乐

奖获得者苏聪





分音乐的作曲也交给了苏聪。

1987年7月,《末代皇帝》全片的样片剪辑完毕。贝尔托卢奇带着苏聪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呷着咖啡,热烈地攀谈起来。话题已不仅是电影音乐的成功与否,贝尔托卢奇诚恳地请苏聪作为第一个观看了这部影片的中国人,谈谈自己毫不掩饰的看法。

夏夜的梦幻

夏夜,月色朦胧星似醉,平湖深黛,映射光影迷离。片片落叶轻坠湖面,涟漪浅浅,一圈圈,渐次远去,似语无语。

这是一个中国夏夜的景色,是一个中国青年用音符赠给1986年布达佩斯春天的礼品。随着钢琴家指尖的跳动,流物的音符翩翩而出,曲淡情远,弗兰兹·李斯特音乐大厅中的数千名观众,屏息凝神,进入了音乐所描绘的世界——苏聪的《钢琴幻想曲》正在纪念李斯特逝世100周年的音乐会上演奏。

然而,一年以前,在维也纳的街头,谁也不会注意到他沮丧的神情。当时,苏聪抱着一叠乐谱闯入他的老师塞基黑音乐学院理论教授狄特·阿克的家。

“这是什么?”阿克不以为然地翻看苏聪送来的乐谱。

“《钢琴幻想曲》,我的作品。”苏聪坐到钢琴边弹奏起来。

“好了,好了。”阿克打断了他。“这样繁琐的作品实在是不适于演奏,也许永远只能留在乐谱上。”

失望之极,他踏上了开往维也纳的列车,去拜见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施特劳斯的灵魂,或许从他们那里能找出一些什么。

但是,有一件事他向阿克先生隐瞒了起来,那就是,他写完《钢琴幻想曲》就给世界现代音乐协会寄去了一份。

后来,当他从报刊上报道李斯特钢琴作品比赛揭晓的消息中,见到了“苏聪”的名字时,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怀疑是否有个人和他重名重姓!那次大赛他获得了第二名。

苏聪的成功引起了世界乐坛的注意。不久,他又受西

柏林艺术节的委托,创作一首乐队作品,以供在作为特别节目的“亚洲音乐节”中首演。

作品很快完成了,应该赋予它一个什么样的标题?苏聪请在柏林留学的几个中国同学来到他的宿舍,向他们讲解了他的构思。

“破晓”。一个人脱口而出。“什么?”苏聪像没有听清,追问了一句。实际上他听得很清楚,只不过是这响亮的标题震惊了。

“破晓”。对方又重复了一遍。“对!就叫《破晓》。好极了,恰如其分。”苏聪激动地高喊。

苏聪的《破晓》被安排在整个音乐节的最后压轴。

乐曲从轻柔的弦乐齐奏开始,然后是上行的呼唤般的旋律,紧接着音响盘旋而起,形成粗犷的舞蹈,最后,排钟与铝板琴敲出清脆的钟声,竖琴急促的琶音,似一轮红日喷薄腾升……

掌声、欢呼声,成了这部作品当然的结束部。苏聪又获得了一次成功。当他走出柏林爱乐音乐厅,轻舒一口气时,东方的天空正出见一抹鱼肚白色。

音乐的起点

苏聪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灵的世界永远像一个夏夜的梦,平和、淡远、含蓄而轻柔。

苏聪又是这样一个人,他好激动,这与他细腻如春日和风般的风格似乎不大一致。他总是激动地捕捉、把握,这是他观照世界的方式。他试图在心灵与物象之间寻求某种契合,一旦流过心灵的乐思被捕捉,灵感便如闪电划破天空,他激动地颤栗了……于是,从他的作品里你可以窥见中国传统艺术所独有的天人合一的美。

1987年8月,他请假回到了祖国。

“我还是想回来,我的音乐的起点在中国。我已逐渐感到自己与生我养我的国土疏远了。”他焦躁不安地喃喃着,低着头,搓着手,似乎这不是面对阔别重逢的家人,而是对着自己说。

在联邦德国的日子里,苏聪每周都如期去资料室阅读所有的有关中国的报刊杂志,祖国发生的每件新鲜事都会令他激动不已。他生怕自己与她疏远了。

“虽然这样,我还是觉得有许多东西报刊上读不到。”他咬咬嘴唇说,“而没有这些,我的艺术一钱不值。”

苏聪永远忘不了这土地凝结在他身上的欢乐与哀愁。这个时时刻刻离不开音乐的人,小时候却只喜爱玩玩具枪。父亲为了让他坐在琴凳上,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在《彼得与狼》的总谱封面上画有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大灰狼,父亲指着尖尖的狼牙说:“不好好练琴,大灰狼就来咬你!”小苏聪委屈地哭着坐在了钢琴边。

苏聪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或许这个独生的儿子得到了“音乐基因”的遗传,渐渐地,苏聪的心灵与音乐溶汇成了一个合谐的和弦。

十年浩劫中,父母作为“反动权威”,被强迫参加学军“改造”去了,苏聪则开始终日在家练琴,为的是一旦上山



两个少女的

恩恩怨怨

●王静

下乡，好在宣传队中混口饭吃。

中学毕业后，孱弱的苏聪被分配到北京一家浴池当服务员，热腾腾的蒸汽使他的血也要沸腾了。他要写，他要用音乐去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感觉。尽管当时的作品还未脱稚气，但那是在深重的岁月里，一颗备受压抑的心的呻吟与呐喊。

直到1978年，苏聪才得到一次转机。他多年花费的功夫在这一天得到了补偿，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了他。

然而，苏聪永远忘不了的是他在广西采风的日子。

那是1980年，广西西部龙胜地区。苍翠的山间，流过辘轳般的迷雾，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鸟鸣兽叫。与这清翠的水光山色对峙的是寨民们一色青黑的穿扮。夜晚，油灯跳动的火焰，照着一双双深重的目光，时间在这里被凝固了，像夜晚被星辰所凝固。但每当这时，山上传来交替起伏的男女对唱，质朴而毫无雕饰，直率而从不隐曲，一种人性中热烈跃动的渴念和追求使苏聪激动不已。

每个民族都从这里起步，同样，音乐也从这里发轫。他似乎感悟到这正是人类的“根”。他彻底敞开了心灵，去感受、去体认这鲜美的自然与人生。

当侗民们围在竹楼般的竹堂旁起舞欢歌时，他捕捉着那种简单、朴拙的动作中所含有的生的欢乐和追求。

当风雨骤至，灰暗的竹楼吟唱起凄凄的鸣鸣，人们毫无抱怨地相视而坐时，他感受到依时而动、顺天而行的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一切剥落了现代人身上的文化鳞片的原始的气息，给苏聪的心灵注入了勃然的生机。就在这里，他找到了他音乐的起点。

他用一首《为弦乐四重奏与弦乐队而作的音乐》来表现这次采风中的感受。

这作品中，有对明丽山水的描写，也有寨民对古老生活的倦怠与愤懑，有情歌唱唱的欢悦和打谷场上起舞的奔放，也有大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而在整部作品宏大的构思中表现出现代人对自然与人和生态与生活方式的思考。

这一切，无疑体现了苏聪的艺术追求。

苏聪认为，古典音乐早已在狭窄拥挤的山路上走到了峰顶，我们已不可能再沿着它走下去。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是另外一条，但起点还是音乐的原始形式。

艺术总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现代音乐并不是什么魔法师的咒语，它需要另一种理解：欣赏现代音乐不需要听众去捕捉旋律、感受节奏、分析曲式，只需要你去体认，进而共鸣。

是的！体认、共鸣！

苏聪找到了起点，而前头的路却可能布满了荆棘，也许根本就没有路。但苏聪毕竟已经起步，他不会迟疑，因为他懂得，最重要的是走，只要脚踏在这块土地上。

这就是苏聪。

(图：岳昕)

1985年，李兴玲揣着一个18岁少女对未来美好的梦想，步履坦然地跨进了遵义地区中心师范学校。

对这个来自山区农村，很少出过远门的姑娘来说，眼前的世界是那么新鲜。美丽的校园使她陶醉。那张张崭新的面庞等待她去了解……是啊，她对世界了解太少，她要抓住从面前飘过的所有美好的东西：知识、友爱，许许多多。她表现积极进步，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推选她当了班干部。

渐渐地，李兴玲发生了另外的变化。

街上那些梳着新潮发型，穿着时髦服装，洒着高级香水，花枝招展地出入于酒吧舞厅的妙龄女郎，对李兴玲的诱惑太大了，她羡慕这些同龄人，她知道自己长得不错，白净的鸭蛋脸，高鼻梁，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以及那苗条的身材，哪点比城市姑娘差？如果在穿着打扮上讲究些，不就超群脱俗了吗？

不久，李兴玲的穿着便开始表现出不同于他人的新追求，并且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回头率。

正当她为自己的成功而得意时，她也在为经济危机而苦恼。起初，她精打细算，向家里多要点钱，还能应付，但没过多久，大量的开销把她推到了山穷水尽之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她头脑中闪过：偷。不久前，她们寝室的黄雁偷了别人的10元钱，贼的名声已

经臭出去了。李兴玲想，只要手脚做得巧，不会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也有黄雁这块挡箭牌。于是，她带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心情，默默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一天，同班同学都到东风小学见习去了，只有李兴玲和同舍的邹启荣因故未去。邹呆了一会觉得无聊便甩门出去了。当李兴玲抬头发现邹的钥匙时，她的心紧张地跳起来。然而，对金钱的渴望使她迅速控制住紧张的心情和发抖的双手，急忙拿起桌上的钥匙，打开邹启荣的箱子，取走了里面仅有的8元钱。

初次的成功，增强了李兴玲的信心。两天后，她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隔壁房间张琳的钥匙，乘无人之机，取走了张琳的31元钱和4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

她盗走了邹启荣39斤粮票。

她又盗走了张琳30元钱。

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发生的4起盗窃案，扰乱了这两个女生寝室同学的正常生活。经校保卫科调查，确定为“内盗”。两室的同学得知这一消息，一边诅咒可耻的盗贼，一边猜测谁是作案人。为了开脱自己，李兴玲公开把矛头指向黄雁，一时间，黄雁成了被怀疑的第一目标。

然而，有一个人例外。

二

那就是与李兴玲同班同舍的姑娘陈昌芬。

记得刚进校时，李兴玲和陈昌芬关系融洽，如同姐妹。可是不久，心眼颇多的陈昌芬敏感地发现，无论老师还是同学，都对好友李兴玲抱有一种奇特的好感，而自己则常遭冷落，这都是因为李兴玲长得漂亮，而自己相貌平平。其实，陈昌芬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奋斗和刻苦钻研在其他方面超过别人，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然而，狭隘的意识包围了她：“哼，看她那副得意劲儿，我和她在一起不过是当她的陪衬而已。”渐渐地，昔日的好友变成了对立的仇敌。

盗窃案发生后，陈昌芬首先怀疑的就是李兴玲。长期以来，陈昌芬一直带着一种敌对情绪注视着李兴玲的一举一动。她曾暗暗为李兴玲算过帐，发现她多出一笔钱来。从作案时间看，清晨早锻炼时可能性最大，而宿舍里只有李兴玲不去早锻炼。加之案发后李兴玲的表现反常，更使陈昌芬产生了怀疑。

李兴玲表面镇静，内心却虚得很。每当同学们讨论盗窃案，痛骂窃贼时，她便如芒刺在身，坐立不安。而她最不能忍受的还是陈昌芬冷漠的眼光和含沙射影的话语。为摆脱窘境，她开始主动去接近陈昌芬，甚至不惜降低自己来讨好她。这样一来，陈昌芬更坚定

了自己的看法，她心想：“老天有眼，这个贼货终于要倒霉了。我一定要让她身败名裂。”

面对陈昌芬的这种神情和校保卫科对盗窃案追查的深入，李兴玲感到自己要暴露了。一想到人们当着面叫她“贼”，她真有点不寒而栗。“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自首、私了，一定不能让老师同学知道，不能让家人知道。”她想。

决心下定之后，李兴玲找到邹启荣承认了错误，并退还了钱和粮票，同时恳请邹为她保密。接着，她又去校保卫科自首。6月26日，李兴玲又向张琳认错赔礼，她对张琳说：“钱我会还你的，假期还一部分，下学期还一部分。我不敢告诉家里，哥哥知道后会一锄头打死我的。”说着，两个人都哭了。张琳答应为李兴玲遮掩此事，李兴玲如释重负，暗自下决心以后再不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陈昌芬得知李兴玲自首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她终于抬不起头来了，可耻啊，从将军到奴隶。她现在难道不像只被斗败的母鸡吗？我非剥掉她的美人皮不可，叫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无立足之地。”

6月28日晚，陈昌芬借李兴玲关宿舍门过猛之机大发脾气，挑起事端，大声骂道：“你这个烂强盗，发哪个的脾气？”继而打开宿舍门，站在门口破口大骂。李兴玲见状，赶紧离开了宿舍。陈昌芬更加来劲，吼道：“你有本事就不要跑，像你这种强盗不如死了好。”然后，她向被吵骂声引来的同学讲了李兴玲偷盗之事。

三

当一贯争强好胜的李兴玲得知陈昌芬将她的丑事张扬出去以后，如同坠入地狱一般。她想通过私下认错，求得谅解，重新做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想到同学们轻蔑的目光和哥哥凶狠的神态，她觉得自己再也沒脸活在人世。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悲感折磨着她，使她痛不欲生。

她想到了死，而且因为痛恨陈昌芬，决心要与她同归于尽。

7月5日清晨，陈昌芬洗完衣服，正站在4楼阳台上拧水，被恶梦缠绕的李兴玲失去了理智，从背后将陈昌芬猛地向下推去，只听“啊”地一声惨叫，陈昌芬摔了下去，接着又是一声尖叫，李兴玲也从4楼阳台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这两个可怜的少女都没摔死，只是严重瘫痪。作为凶手的李兴玲，不可推卸地将负刑事责任，而被害人陈昌芬难道不应该负一些责任吗？

少女啊，愿恩怨将伴随你们终生。

SOS 灵魂紧急呼叫

●吕涛 王冰

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我们的记忆里出现了一些丑恶的记载。若不是新闻记者那有鼻子的报道，你决不会信以为真。

下面陈列的，只是这些记载中的一部分：

1987年春节前夕，在山西省大同市某矿区饭馆，一名劳改犯人当着经理和4名女服务员的面，将另一名女服务员两次强奸，当时在场的5名“观众”不但不上前制止流氓的犯罪行为，反而帮忙开门、关灯；

2月20日，在安徽合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公共汽车售票员陆忠之死；

2月28日，在沈阳市205路公共汽车站站务室，一名遭流氓追杀的青年前来求援，包括书记、站长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将那个青年赶出门外，送入虎口，亲眼看着他作了歹徒刀下之鬼；

7月31日，山西长治市第二医院临时工王文明等4人在小南关护城河游泳时，王不慎溺水，其他3人虽竭力抢救却无济于事。岸边围观的300多人皆君子动口不动手，一部分人提出“不给钱不救人”。当医院领导把20张“大团结”高举过头顶时，人群里才涌现出4个“活雷锋”。打捞者探到尸体后，先派人把钱拿到手够数，才把尸体捞上来；

1988年3月2日，空军某部政治处主任、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哈尔滨与歹徒搏斗。现场100多人围观却无人相助。最后，这个曾4次奋不顾身与歹徒作斗争的一级飞行员终于英勇牺牲，罪犯却逃之夭夭。

二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称，上下几千年，涌现过多少仁人侠士。“义”在文学艺术中更受崇尚，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娲补天，何其恢弘壮丽。《水浒》里一百单八将，哪个不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他们敢恨敢爱，活得何等豪放、洒脱，与列祖列宗相比，今天某些人的“活法”又是多么萎缩、没劲。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病根到底出在哪里？

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使我国的民族精神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也带来部分人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混乱。

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除因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

理环境和所沿袭的特定文化习俗外，根本上取决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变革。改革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产生了令人振奋的转变，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由此引起的一些观念混乱。轰动全国的上海于双戈枪杀人案中的另两名罪犯——于的女友蒋佩玲和于的好友徐根宝——也受到法律的制裁，许多人认为蒋佩玲明知于已犯罪却仍能同其生死与共，了不起；而徐根宝慷慨解囊300元资助于犯出逃，更够哥们。人们说：“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如果说这里的谬误显而易见、不值一驳的话，那么另一个例子从表面看来似乎颇有些“道理”，这便是李鹏礼英勇牺牲后许多人的疑问：“李鹏礼死得值得吗？”这不由使我们回想起几年前大学生张华救农民引发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我们仍然不能为这场讨论划上一个满意的句号。

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助长了为非作歹者的气焰，使正直善良的人们不再有正义感。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党风不正，官风不正，民风社风必然不正。在许多地方，仍然是权大于法，法不过是权势的可怜的婢女，党纪处分成了某些人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岂不知许多人“不怕党内警告，就怕法院传票”。法制不完备不健全，党风官风不正，至今许多人不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和真理，有的把独善其身、与世无争作为人生的追求，用冷漠的眼光对人生和生活，逐渐走向消极悲观；也有的人便因此丧失了道德，开始了反社会的违法犯罪的人生。许多罪犯在被告席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假如我是真的”的辩词，正是这种社会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

三、经济生活条件的贫困和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削弱了我们的民族之气。

我们历来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然而一旦开放，我们才发现，原来，吃不饱穿不暖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尽管她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生活并非是美好的享受，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们似乎只知道她的艰难而无法体会



她的可爱。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低下，人们普遍寄希望于好人政治，并主张由“好人”来为民作主，这恰恰表明人民自己还不能当家作主。

在这种贫困的经济条件和低下的政治地位的挤压下，人们的精神、心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态，否则，只因考试成绩不如意，亲生父母便将儿女活活打死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便无以解释。

三

李鹏总理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要富强，光有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一定要有精神方面的力量。”一个民族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它代表着这个民族的面貌。近

两年来，耳闻目睹的事情使每一位正直善良的人忧心不已——人们的麻木不仁、萎靡不振、道德堕落、世风日下，以这样的民族精神状态，要想参加激烈的世界竞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败无疑。弄不好，我们就会被开除“球籍”。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华老栓们用以治疗痼病的仍然是人血馒头。

人们哪，你们听到那灵魂深处的紧急呼叫了吗？

结束本文时，笔者获悉几个消息：

消息一：美国10个男女儿童，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获得1987年美国儿童英雄奖。他们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10岁的小英雄兰普，从池中救起一名昏迷的男童，再跳下零下40℃的冰水中救起另一个男童，然后又把不醒人事的男童救醒。8岁的雪夫，碰到一个伙伴被糖果哽住了喉咙，便用人工呼吸救活了他。

消息二：由全国先进个人劳动者阎晓莹首倡的见义勇为基金会，4月9日在沈阳成立。阎晓莹为基金会一次捐款一万元。

消息三：据报道，苏联最近修正了部分法律条文，新修改的法律规定，见死不救者将被视为有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图：王卫东)

评刊员来信

●《大学生们请注意：“保险箱”已出现裂缝》透视热点，言中时弊，行文自然深刻；小标题提纲挈领，富有哲理。

(福建 刘信德)

●有数据，切中现实，但对其中原因的分析不太中肯。建议就此类题材做跟踪报道。

(广西 张中华、江西 李鹏程)

●贵刊刊登步鑫生的文章，令人赞赏。它向人们展示，我们的社会已不再那么以成败论英雄；那种“得势众人捧，失势大家踩”的情况已开始减少。虽然他的文章我不敢完全赞同，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开

脱和赞美使人觉得他仍未超越自我，但他以自己的事例为大家做镜子，总比别人的长篇大论要好得多。

(辽宁 翟留建)

●“难不倒”很有特色，灵活、简洁，栏目名称注目新颖；回答的也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不准确的小道消息就没有市场了。

(山东 董道广)

●4期封面很好，一幅“无题”胜有题，让人产生一种直觉的美感，使人爱不释手。(浙江 孙永江)

●从艺术上看，可能有可取之处，但就思想内容而言，的确是

“无题”，可谓虚无缥缈。“封面赏析”也没说到点子上。

(北京 高茹琨)

●这画面任人想像，从这里拓展开去，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效果的艺术享受。

(贵州 刘正品)

●当5期的《魔水 魔块 魔魂》这个题目映入眼帘时，我立即想到了4期的《优圈 劣圈 怪圈》(我对“圈”文很不以为然)，于是一种反感之情袭上心头。然而慢慢地，我却被此文的“魔力”吸引住了，并为此推迟了吃饭时间。此文情节曲折，层次鲜明，主人公的命运牵动人心，使人不能不看下去。故事的结尾留给人遗憾，也引人深思：虽然正义战胜了邪恶，丑恶的东西却由于有权力这个保护伞而得不到惩处。(北京 孙葶)

袁伟民与足球

● 鲁 胤

在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前，赵紫阳同志接见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时，指着身旁的袁伟民介绍说：“你认识他吗？”萨马兰奇微笑着点头答到：“认识。”赵紫阳接着风趣地说：“他在中国的名气要比我大，和你一样是世界名人”。

的确，在中国一提袁伟民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然而，有关袁伟民牵头抓足球的事，人们只是近两年才略知一些。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中国足球领导小组组长，以他的才华韬略和领导魄力，与足球界的同仁一起共渡难关，终于使历尽坎坷、悲歌苦多的中国足球有了转机，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在这梦里，将向青年朋友们介绍一些关于袁伟民与足球的故事。

重组国家队

“5.19”失利之后，国家体委决

定由刚上任不到半年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牵头成立足球领导小组。这是一段非常时期。多少年来，曾有多少风华正茂，壮怀激烈的热血英雄在这里翻了跟头。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落得满鬓秋霜，满目苍凉，甚至众叛亲离，流落异乡。任你多么德高望重，成绩斐然，一旦摆弄足球，稍有闪失就会身败名裂。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失败的危机处处隐藏。可袁伟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任务。

通过大量的深入调查，袁伟民基本摸清了足球圈内那些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头绪，他面临的是一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极低，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如一支22人的运动队，竟有四五家机构管理。平时一点小事也要请示所有部门，得到所有部门的同意才能办成，若有哪一个环节出了点毛病，不管多么迫在眉睫的急事也没人管。世界杯预选赛前，国家队主教练要想随时调一名外省队员进京有时比登天还难。大赛当头，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国际足联要求限定的球队人数，致使还没比赛自己先折损兵。混乱的管理，荒唐的行径。“5.19”前夕，主教练曾雪麟曾再三要求观摩香港队的比赛，可申请了两三个月就是批不下来，而郭家明要刺探中国队情报，一天就办完手续来到北京。鲜明的对比，反映出“5.19”的胜负绝非出于偶然。要想挽救中国足球，必须痛下决心改革，必须大胆果断地对那些存在几十年的旧管理体制开刀，必须不留情面地打破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那些微妙敏感的人事关系。袁伟民建议取消那些分散的机构，成立一个足球办公室，全权而集中地解决有关足

球的一应问题。这个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批准。

随之而来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重组国家队。“5.19”使足球像一个可怕的魔鬼人人躲避犹恐不及，谁还敢主动迎上前呢？担任了足球队主教练的职务就意味着你将随时可能受到人们的唾骂，你将满腔的委屈无处诉说，你将会成为苏永舜第二，曾雪麟第二。袁伟民在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中，就总要时不时冒出一句，“你认为谁在足球界威信更高些？在这个时候谁出任教练比较合适”。渐渐地，大多数人提出的人选都集中到年维酒这个名字。

袁伟民把年维酒叫到他的办公室。话题是此时派谁出任国家队教练。年维酒这个老资格的教练员慢悠悠地吸着香烟，他心里清楚袁伟民叫他来这里的目地，可说心里话，他并不稀罕这个主教练的位子。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都经历过。爱之弥深的足球呵，也是伤心至极的足球。为了

足球，他曾断断了腿落下伤风，把命都豁上了，刚刚50岁出头，就已满头白发。更何况家里还有90多岁的老人瘫在床上。袁伟民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现在只有让你干教练最合适。你大胆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年维酒为人正直，不轻易服人。听了袁伟民的一席话，他的眼窝有些湿润，像他这样的“老足球”，干到今天并不是寒了心，怕了足球，

而是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现在他从袁伟民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那颗接近冰点的心禁不住沸腾起来。他狠狠地掐灭了烟，神情激动地说：“袁指导，您已是几届排球冠军的教练，还来管这不争气的足球，就冲您不怕倒牌子这一点，我年维酒舍命陪君子！主教练我干！”

南京会上的“军令状”

新组建的国家队，一出山就连打了几个哑炮，与北京队的表演赛，“安保杯”足球赛和在上海举行的“飞达杯”足球赛，都输给对手，使中国队刚燃起的希望又重重跌落下来。

当时，作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袁伟民，忙得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即使回到家里，往往又待不上几个钟头。这一天，他刚从新疆回来又马上去郑州。他走出家门之后，爱人郑沪英还站在阳台上目送着他。他挥手边喃喃地说：“走啦，走啦”。袁伟民也边走边若有所思地回答：“走了，走了”。走出很远的一段路，突然他对旁人说：“先等等，刚成立的国家足球队又输了球，压力一定很大，我还



得回去给年维泗打个电话，做做工作，要有信心，不能泄气……”。接到电话的年维泗顿感一股暖流涌到心头，工作这样细心的领导，在他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对袁伟民主管足球，足球圈内有些人一开始是颇不以为然的。足球不是排球，他能把排球搞上去未必能玩得转足球。然而在1986年的南京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人们却从心里敬服了袁伟民。当时袁伟民作为团长刚带领中国女排第4次夺得世界冠军从日本回来，他没有心思去参加在人大大会堂举行的庆功大会，立刻马不停蹄地连夜飞到南京。连日的疲劳使他的气管炎都复发了。

会议开始后，袁伟民一直坐在下面静静地听，各省市的教练及有关同志依次发言。袁伟民听着眉头不禁皱紧起来，他不仅发现有些同志谈的不充分、不实在，花里胡哨，而且还发现有的同志不安心开会，精神上松松垮垮，应付差事。这对袁伟民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等大家发言完了之后，他说：“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我感到很不满意。”乱哄哄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光说好

听的话，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说着他点名叫起了一位省队教练：“刚才听完你的发言，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讲了你们订有完善的训练计划，那么你们每天的有效训练时间究竟是多少？一年又是多少？对不同的队员安排了那些针对性的训练方法，在多长时间内在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训练和比赛怎样相互配合？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一连串的问题，使那位教练满脸通红，一句也答不上来。袁伟民的话锋越来越严厉，

“中国的足球就指着我们这些在座的同志，如果我们整天混混沌沌，松松懈懈，敷衍了事，工作处于盲目性想不花大力气干好一件事，那是幻想，绝不可能。这种状况不改变，别说中国足球永无起飞之日，就是全国人民知道了我们是这种状况，他们也绝不会答应。足球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侥幸，一个教练员带领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队，他必须有头脑，有学问，是一个管理、训练、竞赛等学科的专家。我干事情总强调落实，强调讲实效。我们足球多年来上不去，几年才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再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落实不了下一步的具体工作，那我们到这儿干嘛来了？开会期间，我房间的门昼夜开着，谁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来谈，我有问题也会随时找大家，希望大家不要有顾虑，畅所欲言，树立一个好的开会风气。”

袁伟民发言时，会场上格外安静，这样一针见血的批评，这样动真格的发言，大家已经多年没有听到了。以前

开会，因为大家都是熟人，好不容易凑到了一起，无非就是拉拉家常，叙叙旧，既没谁触动什么矛盾，也没谁站出来解决落实几个问题，都是不了了之。走走场。虽然不少有事业心的同志急在心里，可面对这种局面，也是无可奈何。今天袁伟民的发言，一下子捅破了窗户纸，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袁伟民批评的骨子里，绝不是要一棍子打死人，而是在真心诚意地把自己宝贵的工作经验教给你，点拨你，打开你的窍，使你获益匪浅，大长见识。因此袁伟民的语音刚落，会场上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可是这种会议上罕见的事情。大家感到心里格外的痛快。

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大家积极找问题、找差距，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制定出明确的责任分工。军中无戏言，主管足球工作的袁伟民以后就要根据这些“军令状”来检查考核每一个教练的实际工作。不少人对袁伟民刮目相看了。

准备奥运会

1987年是24届奥运会预选赛大赛逼进的时期，也是刚有些起色的中国足球队又面临严峻考验的时期。

为确保奥运会外圈赛的胜利，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袁伟民带领着足球同仁没日没夜地干起来。缺乏经费，袁伟民多次找到荣毅仁等实业家筹集赞助，缺少人员，袁伟民又做通各省市教练工作，保证随时向国家队输送队员，他还找到可口可乐公司资助办了几次高级教练培训班，并用很快的速度促成了中国队留学

巴西，为中国足球队进军奥运会打通了一切道路。中国队蒙开得胜，先挫香港队，再赢尼泊尔队。但当与日本队相遇时，中国队才真正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10月2日，袁伟民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飞赴广州，一下飞机，他就直奔中国队驻地，听取年维泗、高丰文等同志的汇报。他详细地问了一遍准备的情况之后，心里仍有些不踏实，遂向高丰文道：“按你看，这场球我们能拿下来吗？”高丰文有些迟疑地回答：“队员的信心不像打香港队那样。”

袁伟民又问：“这场球万一出了意外，队员们想到没有？你怎样解决？”高丰文答：“我们基本有个想法，首先争取主动，先进球，如先输了球，队员要能够稳定情绪。”袁伟民接着说：“依我看，必须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跟队员讲清楚，让他们明白这是对心理磨炼的最好的考验，无论是胜了还是输了，只要教练员、运动员经住了考验，不泄气，就是一大进步”。





这天下午，足球队训练，袁伟民换上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兴致勃勃地来到训练场。自从他当上国家体委副主任以

来，已经很久没有穿运动鞋了。他先是和一带球迷站在边上观看训练，看了一会儿，也许受了感染，他情不自禁地跑进场里，年维泗穿着一身运动服也随后跟了进来。一名队员主动把球一脚踢到袁伟民脚下，便做了个防守动作守在足球大门前。那意思很明显“袁指导，来几下”。

袁伟民先是盘带几下，再看者球门，冷不防一脚劲射，球应声入网。“好！”场内场外的队员、球迷们又是惊讶又是兴奋地围拢过来，谁也没想到袁伟民踢足球还真有两下子。其实袁伟民在中学时代就十分喜爱踢足球，当上国家女排教练后，仍然是一个球迷。在训练空隙，只要一有电视转播的足球赛，他总是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尾。他特别欣赏足球比赛中那种激烈对抗的气势和高超的技巧，他往往能从一个精彩进球中悟到许多竞技奥妙与用兵之道，甚至在女排的训练中，他也常用踢足球的训练方法，来培养队员高强度高对抗性的适应能力和拼搏精神，培养那种灵敏、协调、球到人到的竞技意识。袁伟民与年维泗，各展神威，痛痛快快地踢了几个回合。国家队的队员们心里都明白这是踢给他们看的，老一辈运动员用心良苦，翘首期待，他们能不豁出性命去拼搏吗？

10月4日晚，中国足球队员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地奔向了赛场。年维泗穿了一身笔挺的黑西服，显得精神抖擞，格外年轻。他忙前忙后有说有笑。不料比赛结果，中国队竟以0:1败北。那沉重阴郁的乌云，又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不用再再去描述队员们了吧，只要看到年维泗，就会明白这场比赛的失利，给这些呕心沥血的人们带来多大的打击。比赛才90分钟，而年维泗前后却判若两人。此时他眼围发红，腿也一瘸一拐了，疲倦的面容、苍白的头发，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虽没有流泪，可这时他的心在流血呵。他觉得没脸再见袁伟民，但袁伟民却主动走到他的身旁，语气依然那么平静而坚定：“老年你怎么啦，我们只输了这一场球，还没有完全输掉，我们还有胜利的机会。”袁伟民的沉着冷静，一下子稳定了教练员的情绪，他那临危不乱，头脑清醒的大将风度，也深深感染了其他的人。他在以身作则，帮助中国足球这只伤痕累累的雄鹰度过这最难闯过的失败后心理压力的大关。

他工作的作风有一大特点，就是如果球赢了，拿了个世界冠军，他感到这是很正常的，是一个运动员应该的，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大肆庆祝的，因此胜利后人们常常找不到袁伟民的身影。可一旦球输了，当失败的运动员伤心至极，特别需要别人来关心抚慰时，他却总是悄悄地出现在你的身旁，你会到处看到他的身影。10月4日失利之夜，他几乎挨个找运动员倾心交谈。作为一名老教练他深知，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如果工作做得稍不仔细有遗漏，错过纠正错误的机会，就会出现前功尽弃的可怕后果。他和队员一起分析，一起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时候他反而精神抖擞，精力旺盛。直到队员们重新坚定了信

心，他才悄悄离去。

决战东京

由于稳定了军心，中国足球队摆脱出失利的阴影，一鼓作气连赢劲敌泰国两场，又燃起夺得最后胜利的激情。

但中国队仍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日本队5战5胜，积9分，士气正旺；中国队4胜1负积8分，这就是说，中国队必须战胜日本队才能出线。

这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恶仗，更何况决战要在东京举行。这次能经受得住考验吗？

10月23日早上，袁伟民向党的13大会议请了假，带领中国足球队东征日本。年维泗到机场送行，过了检票口，年维泗还拉着高丰文的手不放，千叮咛、万嘱咐，他不放心。高丰文搀扶着年维泗，嘴角闭得紧紧的，看得出他的目光中噙满了泪水。呵，几代人要冲出亚洲的梦想，就要在这一趟东征中决出分晓。其情其景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

到了日本，决战前夜的赛前布置会上，袁伟民一改过去赛前准备只是教练灌输的方法，要队员自己开会，由队长贾秀全来主持，教练、团长只是听，最后再集思广益，确定战术方案。

这一招果然灵，队员们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会后队员们对袁伟民讲，这样的会他们是头一遭，开得痛快极了。而袁伟民和队员交心地说：“只要你们尽了力，输了球，我决不会责怪你们半句。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10月26日晚，中日足球决赛的时刻到来了。袁伟民和翻译坐在主席台上，当中国队踢进第一个球时，翻译激动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拍打着袁伟民的前胸后背高叫着，“球进了！球进了！”他已高兴得忘了形，忘了他拍打的对象是身居国家体委要职的袁伟民。而袁伟民倒很平静一动不动。结果中国队以2:0战胜日本队，终于取得了进军奥运会决赛的资格。队员们拥抱在一起，5尺多高的大小伙子泪流满面，嚎啕大哭起来，他们终于体会到几代人艰辛努力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终于得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胜利报偿。积压在他们胸中的一切闷气、怨气、委屈一泄而光。他们将高丰文高高地抛起来，他们四处寻找袁伟民也要把他高高地抛起来。

回到驻地，队员们那高兴劲别提了，纷纷来到袁伟民的房间，他们和袁伟民手挽勾说：“袁主任，咱们定个合同，以后每逢遇到大的比赛，都请你来带队。”袁伟民也开心地笑了。

28日凌晨，中国足球队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当人们激动万分地请袁伟民讲几句话时，他却接过话筒说：“我没什么可讲的，还是请主教练高丰文同志讲。”……

(摄影：陈玉胜)

身高的学问

● 黄 煌 长

我国男的超过1.85米，女的超过1.75米，就可称为高个子了。身高低于1.40米的，属于侏儒症患者。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非洲的巴特瓦人平均身高只有1.30米，这与种族有关，不是病态。

身材高的人主要高在腿上，可以说身高主要受下肢长管状骨头（称为长骨）生长的影响。长骨的两端膨大部分叫骨骺，是不断形成新骨而使长骨变长的地方，一旦骨骺闭合，长骨不再加长，身高也就停止增长了。

人的最终身高主要由遗传因素决定。遗传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用百分数表示，叫做遗传力或遗传度。若遗传力为50%，表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所起作用相等。男性腿长和体高的遗传力分别为77%和79%，女性腿长和体高的遗传力都是92%，足见遗传因素起

主要作用。

身高属于多基因遗传，就是说人的高矮至少受三对基因控制，如果用ABC表示高基因，用abc表示矮基因，那么基因组成为AABBCC的人长得最高，aabbcc则长得最矮。从父母那里得到高基因越多，身材就越高。矮个父母由于本身所带高基因就少，故子女获得较多高基因的机会就不多，长成高个子的机会也就少一些。

一般女孩和男孩分别在10岁和12岁左右进入青春期，此后三四年身高增长最快，然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到20岁左右下降到零，不再长高，但身体仍在发育。

有些人长得特别高。如芬兰的万奈，身高2.48米，做一件衣服要用布6.5米；英国人亚顿，18岁时身高2.52米，供8个人吃的筵席他能一扫而光。还有资料说，苏联的马可诺夫竟高达3米，根本无法出外旅行。他们的“疯长”，往往是生长激素分泌过多的结果，大多属于病态，到成年期，则会出现手大指粗，鼻高皮厚，下巴突出的“肢端肥大症”。非病态的巨人和正常人一样，巴图齐人布特拉，身高2.30米，竟是当地最出名的舞蹈家呢！

有助于身高的锻炼，主要是那些伸展和开放性的项目，如跳高、跳马、跳远、体操、引体向上、游泳等等。而举重、举哑铃、长跑、摔跤、拉拉力器等，则无助于长高。

千百年来，非洲人习惯于头顶重物行走，而且怡然自得，毫无压迫之感。尤其是东非卢奥族的妇女具有头顶庞然大物的奇特本领，使广大旅游者叹为观止。但直到不久以前，这种搬运重物的方法才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

专家们使用仪器对这些妇女在头顶重物时的呼吸情况进行仔细测量，以便摸清能量消耗实况。根据呼吸的频率和深度很容易标出顶物行走时的需氧量，然后用需氧量求出耗能量。经测定和算出平均值，卢奥族妇女可头顶相当于自身体重70%的重物，而且行走自如。如果体重是72公斤的话，那么头顶重物是50公斤，这时需氧量均增加50—60%。如果头顶重物只占自身体重的20%，能量的消耗和空身走路时的消耗几乎没什么差别。

为了进行对比，对士兵进行了同样的测量。结果，这些士兵背负背包的重量达到自身体重的70%时，则耗氧量要增加一倍，即增加100%；而背包重量是自身体重的20%时，对于卢奥族妇女根本无影响，士兵的耗氧量却要增加13%。显然，头顶重物的能量消耗

头顶重物的奥秘

● 李 荒

大大低于背负重物。

怎样对头顶重物可以减少能量消耗进行解释呢？我们知道，人向前走步时，身体总要产生一高一低的波动运动，能量主要就消耗在迈步时使身体抬高上。生理学家为了揭示头顶重物的奥秘，把测试仪器放在人身上的几个部位进行行走步测试，发现人在行走时头顶部上下波动的幅度比身体其它肢体动幅都小得多，而这又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以保护脑子少受震动。特别是富有弹性的两头微弯的脊椎，更在起着一种弹簧的作用。习惯于头顶重物的民族，恰恰是利用了人在走路时的这一特点，使他们减少了搬运重物时的能量消耗。



独步人生

● 张 慈



我做人是很压抑的，从小到大我畏惧很多东西，在内心心里树人为敌，这影响到我在艺术中的爱情。

我小的时候确认为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我没有形成意志以前，是受夸奖的好孩子、优秀生，进大学后，我忽然厌恶周围，为自己是一个处处受夸奖的好人而感到自卑。

分配到个旧市文联《个旧文艺》编辑部，有人跟我说：

“枯井一口，不值留恋。”

“常规不破，则无大才。”

这些说法对人要求很高。我退职的念头是世俗的念头，个旧人的冷漠和市侩，使我自杀过，以后我开始领悟到，死原来是世间最容易发生的事，同时也是可笑和不可思议的事。

从分配到个旧的那天，我就强烈地感到有一天我会离开，百分之百的会离开。

回忆我过去的生活，感到不幸福。

1985年初，我自动离职离开了《个旧文艺》，拿着1000多元积蓄，在广州和四川南部盲流，1987年4月来到北京。

我追求的东西决不在北京。在这里我远远地端详云南，清晰地看见了我的过去，看清楚酣醉无聊、窘穷浑噩和怨恨忧愁……这些永远地消失了，再不计较了。北京社会吸引我，我居住下来，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写作。

在流浪的环境中写作，有一种挣扎的心情。我要通过写小说追求人生。

起初我住在一个熟人的空房子里，他们背后很怀疑我

的来历。一个女孩子，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穿着一身脏衣服，在北京大街上晃晃荡荡，晚上趴在一大堆纸里写，使着人家的水、电、煤气和家具，又不能给人家半点好处。有一天，房子的女主人来说，让我白天出去一天，她弟弟要在这间房间里漆家具。等我晚上回到住处，漆黑的房间里只剩下两个顶着天花板的组合柜，床和日常用品统统被搬走了，油漆味刺激得我想吐。我不平静起来，第一次这样清楚地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我坐在地上，捡起个烟屁股，把它塞进嘴里，划着了火。吐出一口烟，这种局面使我产生一种疯狂的昂扬情绪，我想到了许多阴暗的行为。

我从玉泉路走着路回城里，走了10多个钟头，天空红得像一块布，星星发抖，我非常害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

我的肚子像一个面口袋那样瘪，双眼有一只看不见东西，周围混乱的一片，我心里动摇，想回到云南原来的单位去。

很多卑屈的姿态，只有事后才真正刺痛我的心。每当我想到我曾经回去复职又被一脚踢出来，我为自己感到羞辱。我永远不可能再混政府的饭吃，正像一个朋友的话：“当第一个猴子从地上爬起来，宇宙就有了‘人’。人的第一特征是直立行走，第二特征是大脑的形成，所以，人就应当像个人样，要正直、清晰地活着。”

从16岁到现在已过去了整整10年，10年中我写了百来万字，发了10多万字。留下来的那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文学垃圾还是有用的东西。我痛恨将写作看成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对文学没有作过任何研究，无文学观。

但我追求的是一种值得为之披肝沥胆的东西，是值得抒写的真理。我喜欢一些忘掉名字的强有力的作家，喜欢指的是追求他们的感情和风格，读他们的作品但不摹仿。我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熟练地完美地运用本民族语言，写出云南人乡土的生活。在写作中，如果顺利，写作就成了世界上一种最好的消遣。

这些当然是在吃饱有闲的时候想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背着那个类似逃难的大包，到处打烂战，东家睡地板，西家睡沙发，碰上有地毯的人家，裹着地毯也能睡一夜。小心翼翼地看脸色蹭饭吃，早上那顿吃饱，中午那顿就可以省下不吃，晚上又到另一家蹭。慢慢地我的本领高起来，能够根本不看冷漠的脸色就吃，晚上陪尽好话地与人聊天，直到坦然地蜷缩在别人家里睡一觉，天亮就赶快离开。也有这种情况，打了一个白天的电话仍然落实不了吃住，心中不免幸怯起来。

我多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在家里穿拖鞋，放屁，爱做什么吃就做什么吃……生活不规律和卫生条件差，使我染上了好多病，内心紧张、耳鸣、月经不规律、寒颤心跳。我有一次病倒了，巴氏腺恶性肿瘤，这是一种急性妇科病，不能站不能坐，躺床上没有一个姿势能减轻疼痛，要么等待它自己穿孔溃破，要么开刀引流。由于抵抗力低，我很快要人事不省了，被两位朋友送到海淀医院，医院拒

收，原因是我交不出200元住院押金。两位朋友苦苦哀求，说只要让我躺在床上，他们马上就去凑钱来交。收费处就是不让我跨进住院部那扇门，几个人把我堵在外面，旁边有个老太太看见我抱着柱子不成人的样子，拍拍我的手哭了起来……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道天下的人都那么令我失望吗？住院那几天，我透过窗户看着升起的太阳，我想，只有太阳才是生活中唯一不会幻想破灭的东西。要是问我我在生活中信仰什么的话，我信仰太阳。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红旗》印刷厂厂长听别人讲起我的遭遇，出于同情，答应我去印刷厂排字车间上班，每月45元，条件是不许拿架子，要和工人搞好关系。这算什么条件呢？我天生就和底层人有一种亲近感。我刚来北京时，有一次昏倒在澡堂外面，是一个守澡堂的大妈（她叫史文出）背我回去，第二天又专门包饺子给我送饭，还用她那点钱给我买了5只又大又香的苹果。所以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在排字车间干活了。我干的是拣字送字，一天8小时一分不差地干下来，又苦又累。第三天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指甲被磨得裂了道缝，疼得钻心，衣服一天就见脏，又没地方洗，浑身酸痛得不由自主地歪着，由此我才深深地感到除了发展心灵之外，人生是悲怆的，徒劳的。我对那些年龄比我小，已干了几年排字工的女孩子充满了敬意，同时，对那遥远渺茫、难以想象的未来的向往，使我像块硬骨头一样活下来。

不久，我的一个女友的丈夫出国了，房子空了出来，准确地说就是我可以跟她同住。我厚着脸皮打电话跟她商量，她犹犹豫豫地同意了，约我第二天晚上10点直接去酒仙桥商场附近的家见面、居住。当晚我吹着口哨打点好我的全部家当——一只大背包，手提塑料袋，离开了家。家早已厌烦我的地方，提前到达了女友的家门口。我坐在门口等哇等，大雨哗哗下个不停，我愈来愈冷，抖索起来，等到深夜12点还不见她回来。我心神恍惚，像隔绝了世态，看见的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像和昨夜里的梦。

难道对一个人的憎恨会超过对一个人的爱吗？哀痛和愤恨占据了我的心身，日复一日，我的心总也留不下欢乐，我昏昏欲睡，明天我将在哪里？

我坐在那里，虽生犹死，拿出纸和笔，写些什么完全不知道。我从未有过这种爆发的心情，一方面才思喷薄而出，一方面走马松缰，稳稳当地写一个故事，我和今夜的故事，它夹杂着我的心智的溃散，我的忧伤，我对云南故乡的思念。我写人生的温饱与感情饱和的过程，不问本源。我坐在门口看自己的脚，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我悲愤和不能自制。

几天以后我和一个也是从云南来北京闯天下的女孩住在一起，她靠画画在中央工艺美院免费旁听了一年，又靠画画去西藏画了一大批画，还靠画画租到了十里堡的一间民房，置下了家当，养起了一只猫、一条狗，一群鱼和泥鳅。身上穿着就算在北京也显得时髦的衣裙，交了许许多多本事的洋人国人朋友。不理解的人说她“太浪漫了”我和

她同处一室，却常感到她的勇气和女性的独立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也慢慢摸到了流浪生活的规律，认识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手中有了一大串钥匙，有时我凝望着它们，分不清哪一把是开哪一家的门？我住过的人家太多了。

在《自学》杂志社我找到工作，在海淀区租到了房子。这面临着一大堆麻烦事，要去派出所交证明和押金，报临时户口，每月要交昂贵的房租和水电费，以及治安管理费，这靠我那每月80元的临时工工资是绝对活不了命的。我还必须再找一点别的路子赚点钱。我对面的屋子住的是一个盲流画家，隔壁住满安徽人，也是盲流。你要找最好的劳动保姆到北京西郊来，在这一片圆明园废墟上，有第一流的保姆、木工、裁缝；价廉物美的编辑、翻译，还有画家、甚至导演演员……

我每天清早6点起床去赶331，坐两小时到东单上班，这种路程在昆明会吓死人，但在北京和我一样情况的人多得是。到单位后主要负责编辑，这是个说轻松就轻松说苦恼也苦恼的活计。办公室里有几大袋拆开或未拆开的稿件，能用的少得可怜，我真心同情投稿人。

我有时有种想法，想自己办个刊物，管他妈什么样的稿件都往上登，这叫畅所欲言，劳有所报。

我下辈子是再也不做文人了。

前几天，一位将赴加拿大的同学来找我，他带我去北京语言学院外国教育咨询处查到了美国的12所语言学校地址，要我发12封信去求索相关资料，然后让美国的亲戚担保我出去，他说：“你太苦了，还是出去吧。”又说：“只要一心想出国，会有办法的，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我琢磨大家奔出国的念头，都是一心认定国外无拘无束，性情自在，活法自在，做人自在，可以做一个人，硕大无朋的人。我的这种念头也很强烈，于是将12封信统统发出去了。美国人办事效率高，几天之后12份回信和学校相关资料全来到我手中。然而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一下子还找不到在美国的担保人，傻蛋一个！这件事的尴尬结局我倒是不在乎，只是渴望浪迹天涯的路给堵起来了。

我也常常怀疑自己搞文学是不是僧越之举？但除了这个，我的志向不可能是别的。我的经历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了许多东西。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我只希望能用双手牢牢抓住世俗中一切幸福和痛苦的经验，我信任自己。

我在北京七颠八倒地活着时，收到了云南一个同学的来信：“你生活勇气够可以的，策略够蠢的，不过想当作家的人大约都这么干。要么一败涂地，要么得胜回朝。”

我才知道人们心目中的想法与我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到了为写作所做的种种努力，想到了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关系的迷宫里所走过的路程，不禁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坦然。既然认定只有作家的生活才是富有意义的生活，就这样下去吧。



我要自己试试

●胡小弟

我这个人要是自我概括起来，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但表面上看不是太张狂。我很少在同龄人中说要超过他们。我这个人好面子，怕说了做不到脸上不好看。步鑫生大露，我不露。我只是心里使劲，干什么都要比人家漂亮，而且要比人家新，当第一个。没人干过的或者人家达不到的事特有意思，也特冒险，但我想自己试试。

我原来在首钢特殊钢厂工作。辞职前，我遵循的是一个传统的做人模式，听上头的話，做好学生、好工人。不能说这样就不好，只能说这样不够。我内心里总是渴望更出色，更有胡小弟自己的颜色。业余时间搞技术革新，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技术革新有了成果，我也因此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劳动模范。没想到，我的出名把我更呆板地套入了那个无形的做人模式。

出名后我自己也觉着别扭，不像原来说得那么好。什么都敢。出名后不一样，你是劳模，是榜样，有一定之规。工作、生活甚至包括谈恋爱，一切都得按照最正规、最传统的来。举个例子，我身上穿的老是一身工作服。连我出国那会儿做了好衣服，都放着不敢穿，怕人家说我不像劳模。我也不知道劳模怎么着，反正领导要求咱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生活是个大舞台，我成了一个演员，别别扭扭地被推上台演劳模。舞台效果还挺好，只是自我感觉不好。我也是人哪，人总有七情六欲。搞对象还不能搞，好像搞对象就是学坏了。说是“小青年要一心一意地工作，不要谈恋爱”，其实那时我都27岁了，够老的。

没法谈恋爱不说吧，还让我一个大小伙子管计划生育。从钢厂学了3年回来后，领导重用我提了个工段副段长，主管生活杂务。那笑话多了。人家一大堆年轻小

媳妇，我还没结婚，也不懂这个事，红着脸去问：“哎，采用什么避孕措施？”“你他妈的懂吗？滚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硬是把我轰了出来。没法子，你是干这个的，厚着脸皮还得去说。

工人上班三班倒，我呢，有时成了三班连，哪一班我都得跟着，叫人家填计划生育表。当“官”后我搞技术革新的时间一点也没了。我觉得我一天也混不下去了。烦透了。

无形的模式还框住了人的思想，起码是影响真实思想的表达。人家以为我胡小弟大红人，一定是心情舒畅，真是天晓得！我当时能说的话都是报纸上的、广播中的、领导讲的，都是大路货思想。不是我愿意如此，而是我只能如此。谁叫我是劳模！工人说话粗，常常发牢骚，骂头儿。我一在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是劳模，还是个小头儿，真是没有办法。

我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我在想，如果中国10亿人都像我这样活着，哪怕都是劳动模范，中国也肯定完蛋。没有差异，没有个性，没有竞争，没有勃勃生机，这个民族怎么能不走向衰亡？我一想还想着挺大。具体到一个人来讲，总是这么走下去，最后会把自己给走没了。

一提劳动模范，大家都有一种既定的印象：超额的 workload；特别听话，稳当；然后评上劳模。然后提拔为干部。

我要不改变，大概也就这么一条路了。我想我要是这样走下去，肯定少活十年。为什么？我精神高度紧张，我觉得脑子要炸了。特别想干的事不能干，要我干的事都是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我想了想，认为后半生不能照前半生那么走了。

我的抉择跟我们国家的抉择是有联系的。这不是我故意要往高里说（没有必要往高里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我恐怕也很难挣脱旧的羁绊。

也是凑巧。突然有一天一个好友来找我，说沧州有一个厂不行了。咱们去帮帮如何。这可是个大事。我要是不说就走了这条道，显然属于不听话。劳模形象没了，一切荣誉会反过来说了。一切跟劳模有关的物质利益也不会有了。市劳模在分房时加15分，全国劳模说不定能加多少分呢！而我一走，别说加分，连房也别想了。

我要是跟上头说我要走，上头肯定不会放我走。当时这个事我15分钟就决定了。我说行，咱去帮。

其实要是能好好用我，我并不愿意离开这里。我在首钢干了那么长时间，从1971年到1984年。上了3年钢厂学的也是金属压力加工专业，成绩从起初的全

班倒数第一到后来的全班第一。我干的这行，学的也是这行，本想干出名堂来，突然要离开，挺伤心的。我还是找头儿们去了。他们正开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得哭了。伤心归伤心，走还是要走。他们说：不行。别提我当时心里窝得有多难受了。你们确实看中了我，你们和我的个人关系也都不错，挺关心的。可看中我也不能如此用我，应当用我所长。以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以提拔当官来体现对人的重用，在中国这是一个不算毛病的毛病。为什么不能有别的衡量法和体现法？为什么不能考虑个人的特点和意愿？

我当时是铁了心要走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失掉很多，马上能得到的几乎没有。但我突然看到我的前面出现了另一条道。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也应该像我的技术革新一样时时创新。中国很少有人去试那些得不偿失的事儿，我为什么也不能试试？

要求辞职那天，我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把一纸辞职报告放桌子上。厂家哪里干？天天上我们家找我，打电话，没找着。

其实他们找我那会儿，我已经骑着车去沧州帮忙了。帮忙帮得很笨重。两个泵300多斤，要绑在后车架上帮带去。第一天骑得很快，第二天骑不动了。我想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命，吃苦。我的人生开头就不顺，我从小失去了父亲，从小也就没有靠爸爸的思想，没有依靠思想。甭管前方有多大困难，都要逼着自己走过去。想想这些，发沉的腿又轻快些了。

在沧州也是酸甜苦辣什么味都有。我雄心勃勃，可也有害怕、忧伤、丧气的时候，也有弱的一面。有时空下来我就拉手风琴，想把我所有的不快请出来送出去。后来的某一个时刻，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有些原来很好的人会突然犯罪呢？往往是由于承受不住非常情况，精神崩溃了。人之所以能够干大事，就在于能在坎上过去。人与人能差多少？差不了多少，不一样往往在于关键的一两步。

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己的作为和构想。我不能到这世界上白白走一遭。

在沧州我呆了一年，1985年春节是回北京过的。为什么回来？我想当一把手，我想干得痛快些，但在沧州做不到。那个地方的地方色彩比较浓，在一个姓张的地方是不会让一个不姓张的人说了算的。我试试的想法本想在那里放大，放不大，只能装在脑子里带回来了。

回来后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我只知道我必须

在这社会上争一个位置。

回京不久就结了婚。那几年一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也老大小不了。去沧州前我就见了她，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我去沧州，她家不同意。我说那就算了。后来她跟人商量，人家说，你可别错过胡小弟啊，你别看他忙，要看他的人品和才华。那些喝酒打牌的人倒是不忙，可男同志总得有个事业才好啊。哎，她跟我好了。可没法照顾她。结婚的一切用品都是她准备的。也没陪她出去旅行。我的时间都用在筹办研究所上了。

那会儿已经允许成立民办研究所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就考虑成立现代应用技术研究所。很熟悉，也很新鲜，又是一次试试。我们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一个人的目标应该定得高一些。人生的山峰你定8000米，实际上你的生理极限可能也就7000米，再也爬不上去了。但如果你一开始就定7000米，肯定连7000米也爬不到。现在我们所情况还不错。联系了好多单位好多人，资本总值稳定，项目越来越多，也得到了社会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时时冒出新想法来。

新鲜总是有吸引力的。就说我们今年10月准备启程的环球汽车旅行吧。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要试着干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创个纪录振奋振奋。过去管这叫名利思想，可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国外有长途汽车拉力赛，有没有汽车环球我不知道。但中国人开车环球肯定是第一次。这次如果成行，还可以和国外一些公司建立经济联系，可以带回好多关于国产汽车性能的技术资料，也是对我们国产汽车和其他产品的一次极好宣传。

还有个更深一层的考虑，想通过这个举动震动一下国人的封闭观念和心态。中国人什么都太平稳了，不会动，也不想动。中国人一定要动，一定要有人主动走向世界。闭关自守的墙太厚了。哪怕我们这个举动只能震下一块土坷垃来，也是好的，比不震要好。

只要活着，我这颗心就安分不了。我总是想自己试试。





我要自己试试

●胡小弟

我这个人要是自我概括起来，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但表面上看不是太张狂。我很少在同龄人说我要超过他们。我这个人好面子，怕说了做不到脸上不好看。步鑫生大露，我不露。我只是心里使劲，干什么都要比人家漂亮，而且要干就干新的，当第一个。没人干过的或者人家达不到的事特有意思，也特冒险，但我想自己试试。

我原来在首钢特殊钢厂工作。辞职前，我遵循的是一个传统的做人模式，听上头的話，做好学生、好工人。不能说这样就不好，只能说这样不够。我内心里总还是渴望更出色，更有胡小弟自己的颜色。工余时间搞技术革新，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技术革新有了成果，我也因此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劳动模范。没想到，我的出名把我更呆板地套入了那个无形的做人模式。

出名后我自己也觉着别扭，不像原来说呀笑的，什么都敢。出名后不一样，你是劳模，是榜样，有一定之规。工作、生活甚至包括谈恋爱，一切都得按照最正规、最传统的来。举个例子，我身上穿的老是一身工作服。连我出国那会儿做了好衣服，都放着不敢穿，怕人家说我不像劳模。我也不知道劳模怎么着，反正领导要求咱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生活是个大舞台，我成了一个演员，别别扭扭地被推上台演劳模。舞台效果还挺好，只是自我感觉不好。我也是人哪，人总有七情六欲。搞对象还不能搞，好像搞对象就是学坏了。说是“小青年要一心一意地工作，不要谈恋爱”，其实那时我都27岁了，够老的。

没法谈恋爱不说吧，还让我一个大小伙子管计划生育。从钢院学了3年回来后，领导重用我提了个工段副段长，主管生活杂务。那笑话多了。人家一大堆年轻小

媳妇，我还没结婚，也不懂这个事，红着脸去问：“哎，采用什么避孕措施？”“你他妈的懂吗？滚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硬是把我轰了出来。没法子，你是干这个的，厚着脸皮还得去说。

工人上班三班倒，我呢，有时成了三班连，哪一班我都得跟着，叫人家填计划生育表。当“官”后我搞技术革新的时间一点也没了。我觉得我一天也混不下去了。烦透了。

无形的模式还框住了人的思想，起码是影响了我真实思想的表达。人家以为我胡小弟大红人，一定是心情舒畅，真是天晓得！我当时能说的话都是报纸上的、广播中的、领导讲的，都是大路货思想。不是我愿意如此，而是我只能如此。谁叫我是劳模！工人说话粗，常常发牢骚，骂头儿。我一在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是劳模，还是个小头儿，真是没有办法。

我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我在想，如果中国10亿人都像我这样活着，哪怕都是劳动模范，中国也肯定完蛋。没有差异，没有个性，没有竞争，没有勃勃生机，这个民族怎么能不走向灭亡？我一想还想得挺大。具体到一个人来讲，总是这么走下去，最后会把自己给走没了。

一提劳动模范，大家都有一种既定的印象：超额的工程量；特别听话，稳当；然后评上劳模。然后提为干部。

我要不改变，大概也就这么一条路了。我想我要是这样走下去，肯定少活十年。为什么？我精神高度紧张，我觉得脑子要炸了。特别想干的事不能干，要我干的事都是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我想了想，认为后半生不能照前半生那么走了。

我的抉择跟我们国家的抉择是有联系的。这不是我故意要往高里说（没有必要往高里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我恐怕也很难挣脱旧的羁绊。

也是凑巧。突然有一天一个好友来找我，说沧州有一个厂不行了。咱们去帮帮如何。这可是个大事。我要是不说就走了这条道，显然属于不听话，劳模形象没了，一切荣誉会反过来成了议论，一切跟劳模有关的物质利益也不会有了。市劳模在分房时加15分，全国劳模说不定能加多少分呢！而我一走，别说加分，连房也别想有了。

我要是跟上头说我要走，上头肯定不会放我走。当时这个事我15分钟就决定了。我说行，咱去帮。

其实我是能好好用我，我并不愿意离开这里。我在首钢干了那么长时间，从1971年到1984年。上了3年钢院学的也是金属压力加工专业，成绩从起初的全

班倒数第一到后来的全班第一。我干的这行，学的也是这行，本想于出点名堂来，突然要离开，挺伤心的。我还是找头儿们去了。他们正开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得哭了。伤心归伤心，走还是要走。他们说：不行。别提我当心里窝得有多难受了。你们确实看中了我，你们和我的个人关系也都不错，挺关心的。可看中我也不能如此用我，应当用我所长。以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以提拔当官来体现对人的重用，在中国这是一个不算毛病的毛病。为什么不能有别的衡量法和体现法？为什么不能考虑个人的特点和意愿？

我当时是铁了心要走了。我知道我一走会丢掉很多，马上能得到的几乎没有。但我突然看到我的前面出现了另一条道。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也应该像我的技术革新一样时时创新。中国很少有人去试那些得不偿失的事儿，我为什么也不能试试？

要求辞职那天，我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把一纸辞职报告放桌子上。厂家哪里？天天上我们家找我，打电话，没找着。

其实他们找我那会儿，我已经骑着车去沧州帮忙了。帮忙帮得很笨重。两个泵300多斤，要绑在后车上给带去。第一天骑得很快，第二天骑不动了。我想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命，吃苦。我的人生开头就不顺，我从小头去了父亲，从小也就没有靠爸爸的思想，没有依靠思想。甭管前方有多大困难，都要逼着自己走过去。想想这些，发沉的腿又轻快了。

在沧州也是酸酸苦辣什么味都有。我雄心勃勃，可也有害怕、忧伤、丧气的时候，也有弱的一面。有时空下来我就拉手风琴，想把我所有的不快请出来送出去。后来的某一个时刻，我突然顿悟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有些原来很好的人会突然犯罪呢？往往是由于承受不住非常情况，精神崩溃了。人之所以能够于大事，就在于能在坎上过去。人与人能差多少？差不了多少，不一样往往在于关键的一两步。

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己的作为和构想。我不能到这世界上白白走一遭。

在沧州我呆了一年，1985年春节是回北京过的。为什么回来？我想当一把手，我想干得痛快些，但在沧州做不到。那个地方的地方色彩比较浓，在一个姓张的地方是不会让一个不姓张的人说了算的。我试试的想法本想在那里放大，放不大，只能装在脑子里带回来了。

回来后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我只知道我必须

在这社会上争一个位置。

回京不久结了婚。那几年一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也老大不小了。去沧州前我就见了她，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我去沧州，她家不同意。我说那就算了。后来她跟人商量，人家说，你可别错过胡小勇啊，你别看他忙，要看他的人品和才华。那些喝酒打牌的人倒是不忙，可男同志总得有个事业才好。哎，她跟我好了。可我没法照顾她。结婚的一切用品都是她准备的。也没陪她出去旅行。我的时间都用在筹办研究所上了。

那会儿已经允许成立民办研究所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就考虑成立现代应用技术研究所。很熟悉，也很新鲜，又是一次试试。我们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一个人的目标应该定得高一些。人生的山峰你定8000米，实际上你的生理极限可能也就7000米，再也爬不上去了。但如果你一开始就定7000米，肯定连7000米也爬不到。现在我们所情况还不错。联系了好多单位好多人，资本总值稳定，项目越来越多，也得到了社会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时时冒出新想法来。

新鲜总是有吸引力的。就说我们今年10月准备自建的环球汽车旅行吧。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要试着干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创个纪录振奋振奋。过去管这叫名利思想，可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国外有长途汽车拉力赛，有没有汽车环球我不知道。但中国人开车环球肯定是第一次。这次如果成行，还可以和国外一些公司建立经济联系，可以带回好多关于国产汽车性能的技术资料，也是对我们国产汽车和其他产品的一次极好宣传。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考虑，想通过这个举动震动一下国人的封闭观念和心态。中国人什么都太平稳了，不会动，也不想动。中国人一定要动，一定要有人主动走向世界。闭关自守的墙太厚了。哪怕我们这个举动只能震下一块土坷垃来，也是好的，比不震要好。

只要活着，我这颗心就安分不了。我总是想自己试试。





他也孤独

(外一篇)

● 曹 明 华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只要你给他以不
孤独的感觉，你便征服了
他的一半。

——是吗？（我笑起
来）

看来上帝征服人
的勾当，便是从这里下手
的？

再遇到我怨恨什么人的
时候，或者因感觉我的
对手很强大而灰溜溜，只要
用力想一想：“他也孤独”。
便释然了许多。

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
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
无聊是一颗空虚的心
灵寻求消遣而不可得。

寂寞是寻求普通的人
间温暖而不可得。

错以无聊充孤独，“我
孤独了。”啊，你配吗？

——第一次见尼采这
样的话，我惊讶，我以为
他是穷尽了人间这个题目
上的所有体验了。

有这样一类，他们不
使用“孤独”，也不用“寂
寞”类。这类内感状的词
汇在他们这儿不总是受青
睐。他只冷淡地使用客观
状词汇，他至多说“孤单。”
就如流放他到一个鲁
滨逊式的孤岛，他咬定的
只是——孤单。

他不用内心式的词汇。
他当然不是诗人。

想起一位诗人亲口告
诉我的：“在给我哥哥的信

里，我称自己是这世界上最辛酸的男人……”

偶尔我站在院子里，望着我们家那群老母鸡。

我们家那群老母鸡，怕也各有各的心事吧？……
别看它们整日里挤在一起，很合伙的样子。过几天她
们就会发现有一只因为长得特别肥，提前失踪了；有
一只因为特别瘦，还老不下蛋，也突然失踪了；还有
一只天下蛋，受到很大的优待，顿顿有米吃……反
正各有各的心事的。即使有一天上帝赐给了她们开口
交谈的功能，在啄米之余，她们能在那些空闲的时间
里彼此交谈了，又将会有多少完全共同的内容呢？

生命的平等，在于造物主的公允。

孤独，还有孤独的人……有人清晰地意识到有人
模糊地感觉到，有的人叫出来有的人不叫。他们叫出
来，以便充分地自我感受着。他们往往既抱怨这个世
界，又私底下极渴望加入这个世界。无想作这世界“中
心”。无疑这又是困难的。

愿意以为么，天才大多是一种物质生命虚弱的人，
or至少有“虚弱感”的人。

他们创造文化，他们通过创造文化来与命运抗衡
更多是“have to”，客观的逼迫较之主观选择在这时候
更有力量。

文化，终究成为他们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副产品。

——紧接着的一个美妙的结局，是这个“副产品”
可以较之生命本身来得更丰富更辉煌。

孤单，令人想起鸟，想起形单影只的大雁类，想
起空中的动物……想起背景的辽阔。

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它体现了生命的平等。

寂寞是人类独有心灵的东西。

孤单则远远一些来看人类，也看生物or看尚无生
命的自然……

看人类的时候，何不置它于芜杂的生命种类里？
看生物的时候，还可以再退一步，退一步到更悠远的
距离上。

“喧嚣的地球，只不过是宇宙中一个无声的点”。

——在这样的距离上，生命体现出空前的平等。

有这样的距离，这样遥远的距离。

再回头让我们面对那创造了人类灿烂文化的巨匠
们，便也有了面对孤独而不孤独，并进而生发出通过

创造去同命运抗衡的力量。

——不是么？你说。

会有么美感

诗化的感情与美感。尤其诗化的爱情。

偶尔看一部英国电影，男主角简直在一个观众毫无心理准备的镜头里对女主人公说——

“嫁给我吧？”

正蹲在地下零乱摆弄着什么的女主人公抬起头，表情极简单地回答：

“行！”

很久以后我仍每每忆起，我感觉到美。

谁知道呢？也许哪一天连这两句台词都不说就嫁给了一个人？

依旧是有美感？

一个层次会有一个层次的美感的。

曾经我不相信。领会它也并不在当初。

现在我很轻松地把别人告诉我的还给他自己。

和O走在路上我突然问：你正和A在热恋中？

——凭什么这样说？

我说了一个根据，然后又说了另一个。

Perhaps So. 他认可。然后要我谈谈“感觉”。

嗯。你和S（我原先怂恿他去爱的一个姑娘），可以很谈得来。但第一次见到A，我相信你们间有一种默契的东西，不多需要语言……

他赏我一块巧克力——

“还有呢？”

“还要什么？没有了。”

喇喇地继续走他忽停下，

“告诉你吧，其实我和A，发生过很惨一段波折的。她背叛过我……现重新开始，我在担心我们间感情再不能如从前。”

“从前怎样？”

“从前纯洁无猜，彼此形象都完美。”

于是我提起几年前我们困惑过的一个话题。

有人写信给我看弗洛伊德，而我自己则因刚看《自

私的基因》，疑问是对这世界的探究是不该再走下去了？再走下去，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生的乐趣将遭损坏？

那时O很坚定地说不。他说科学史上许多大突破不都在毁坏人的尊严人的自我中心感么？

哥白尼日心说是第1次，宇宙间万物原来并不围绕人类在旋转哪！

达尔文进化论是第2次，人较之猴子，竟然并不再有根本性的尊贵？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是第3次，人类众多隐蔽的欲望，也并不都如他们衣冠楚楚的外套……

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物学”是第4次，人本身，却原来只不过是基因运载体呵！

最初，都难以接受。后来都接受并正继续接受着。

拒绝接受是原有的理智和情感的平衡被无情打破；能够接受并愈来愈欣然接受则显出极美的生命力。他同时也找到新的“美感”，不必担心失落。

爱她吧——我说，她会加倍回报你。

别把不忠诚过的女人想像得那么可怕。

谁知道呢，也许反倒是较之原先眼中的“纯洁”更真实、更成熟的一种面目，一种更人性的面目，一种更接近这世界本来面目的东西。

——打破幻想后会有真实的情感享受么？我想会。

一个层次会有一个层次的平衡，一个层次会有一个层次的乐趣，一个层次会有一个层次的美感。别担心的。其实人的情感层次是可以很丰富的。当感情已被我们弄得不再像从前那样透明，最好的掩饰办法自然是“默契”。

——这叫“心理同步”。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那时候的透明是一种美。如今，如今你若还留在那阶段，反会让我因你的没有长大而疏远了。那岂不是缺憾？

唉，告别就告别吧，那纯净、缠绵的、动不动就痛心疾首的时代。失去就失去吧，会有另一些在前方等待着，诱惑你，补偿你。在得到新的一点什么的同时，你也在付出一点什么，有时候是以付出我们的本色作代价。

人生它终于是不单纯的。

感谢那些复杂微妙的，不敢进入光天化日之下的人类情感吧，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欢乐的时候，带给我们以美和安慰。



“百万富翁”和他的保镖

新华社通讯员 陈大光 罗忠玉 新华社记者 何大新

10年前，他还是中国东北大地上一个极普通极贫困的农民，除了本村父老乡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如今在辽沈地区，他和他的运输公司，几乎无人不晓。“刘希贵”三个字成了“暴发户”“大富翁”的代名词。人们上百次、上千次地将这三个字与一组阿拉伯数字连在一起：刘希贵拥有520万元巨额资金。

有人称赞他：好样的，顺应潮流，担风险，干起了大事业。有人看钱眼花：呀，这小子赚了这么多钱，一辈子的吃喝玩乐都够了。有人在继续沿着传统观念的思路“划线”：这么干，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还有人说不咸不淡的：别以为他小子发财是好事，世道一变，不是上头收拾他，就是下边收拾他。

最近又有一条快讯在辽沈地区不脛而走：大富豪刘希贵花大价雇了3名打手，都快两年了，嘿，威风着呢！记者听着有趣，急忙赶到位于沈阳市郊的希贵运输公司，想弄个究竟。

1

刘希贵今年34岁，家住桃仙乡桃仙村，因在家中排行老四，所以熟人都称他“刘四”。10年前，他刘希贵是个卖血小伙。在那些穷困的日子里，他靠卖血自救。1979年，刘希贵承包了生产队的两台旧解放牌汽车，跑了3个月运输，净赚4000元。从此开始了他经营运输业的生涯。

刘希贵性格特异，不爱好吃喝，不喜好穿戴，不愿添置高档家具和电器，不愿花钱盖新房。一个念头，就是多赚钱，多买车。到1983年，他已拥有6辆载重货车。1985年他又买进4台“黄河”和一辆装载车。此后，只要赚得的钱一够数，他便急着将票子换成汽车，而且越买越高级。

如此“滚雪球”使刘希贵在10年中迅速成为东北最大的私营车主。人们议论他发了大财，而对他如何善于经营，对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520万！毕竟热得烫手。

2

刘希贵的苦恼与家底同步递增。

——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明着暗着卡我，有

时甚至是勒索。我统统忍着。若是与他们抬气叫真，一场官司打赢了，以后永运输。心里有气，脸上还得陪着笑。没办法。

——社会上不少人，话里行间时常流露出对我们的歧视，好像我们于私营的，天生就是偷税漏税和行赌的坯子。他若明说，我会和他争辩。可人家暗说，背后埋怨你，实在令人恼火。

——干私营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就拿念书的孩子来说吧，提起爸爸当处长、科长、工程师、医生，小脸多风光。哪个孩子愿意说自己的爸爸是个体户？根本问题是没有形成公正的社会舆论。

“相比较之下，这些苦恼还不算啥。”刘希贵说，“眼下，我最担心的是家里人及我本人的安全问题。钱多了，招惹的是非也多了。发财之后得提防挨刀子。”

“有这么严重？”

“当然。”

刘希贵以巨富扬名以后，登门伸手要钱者接踵而来。有的人价码低，给个20元30元的就走了。有的人价码高，不见上百元不起身。这里边，不乏亲戚朋友、邻里熟人，也有不少是陌生人，他们或露出一副可怜相，恳求接济，或摆出侠客的架式，直言不讳，你是富翁，我们到此杀富济贫。

如此“来客”，去年一年，竟有200多个。

居然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外地乞丐从桃仙村经过，马上有人出来指点：“你到村西头老刘家去要。他是咱村大地主，钱有的是，吃的花的都能要到。”

去年夏天，刘希贵收到一封来信，白纸黑字：“刘大哥，你是义气人。现在我活不下去了，你得给我一万元钱。如果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提出某月某日把钱送到某处小树林中。没有署名。

刘希贵没有理会。

有一天晚上，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敲开刘希贵的家门，自我介绍道：“我叫李荣飞，是从城里来的。听说刘大哥有几百万块钱，能不能帮我个忙？”

“帮什么忙?”

“我把区长儿子扎伤了，不敢回家，没钱花了。”

说话间，刘希贵发现对方身上带着匕首，便厉声说，“我不认识你，你带着凶器晚上到我家，就凭这一点，告到法院，也可判你犯法。”

对方一愣神，寻思片刻，一转身，走了。

不久，一封信寄到刘家。信纸上画着一把刀子，刀尖下写着两个名字：刘希贵、李荣飞。信中写道：“刘大哥，我一生的赌注就押在你身上了。现在约你，×月×日中午12点整，带3万元现金到沈阳至桃仙的长途客车终点站等我，我穿一身黑。”

刘希贵按时去了。身上没带钱。事先，他在公司职工中选了儿名手脚麻利的小伙子，已在接头点做好了“战斗”准备。

12点半过去了，车站上没有出现穿黑衣服的人。时隔几日，李荣飞来了第2封信，价码降到1万元。不久，第3封信又到了，索价落到3000元。

刘希贵始终没送这笔钱。

他的性格中确实具有东北大汉的特点，宁折不弯。“这样给钱，太熊蛋。说小话要点钱，我还真能给他。这聪明目张胆地来敲诈我，没门。”

亲戚朋友替他操心：老四，该给就给点吧，不定哪一天，惹着哪位愣爷，割你鼻子，绑你的票，或者把你的孩子推到河里。到那时，你还心疼钱不？

担心，苦恼，刘希贵想甩也甩不掉。

刘希贵还是个慷慨人物。他戴上富帽子几年来，先后解囊20多万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其中，资助辽宁省少年足球队每年3万元，帮助乡中学和村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分别资助1万元和3000元，给乡敬老院每年3000元；为乡亲请戏班子，3次花掉3000元；赞助区运动会，出资4000元；大兴安岭着火，又寄去1万元。此外，他还投资60万元，在村里办起一个以生产雪花膏为主的福利工厂，安排了本乡和运输公司所在的五三乡共31人就业，其中16人为残疾人。这里有刘希贵觉悟的一面：富裕之后，没有忘记父老乡亲。但是，也应看到另一面，即在刘希贵的心理活动中，也不排除这种因素：花钱买安宁，买名声，以戴红帽子来冲减来自各方面的“红眼”压力。

刘希贵曾经拍过胸脯：“本人不怕富，也不怕死。”可他还是雇了3名保镖。“对图财害命者，我不得不防。”

几年前，刘希贵雇本村的青年倪伟侠为其打更。每当刘希贵带车队外出施工时，倪伟侠便承担了刘家的“保安”工作。1986年，倪伟侠不干了，其弟倪伟

福接替这份差事。

倪伟福今年23岁，是桃仙中学的体育教员，练过“功夫”，通些拳脚。白天，他照常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天黑之前，便赶到刘家。他的任务是负责“内宅保卫”。倪伟福与刘希贵一家住同一栋房，其住室与刘家夫妻的寝室隔客厅相对。门外稍有动静，他便先迎出去，看看是谁，有什么事。对陌生人，一般情况下，他都横眉挡驾：“主人不在家。”刘希贵接待客人时，有时对来者不托底，也暗示小倪在旁边照应。有一次，一个陌生人不好好意地来到刘家，一进门，其怀中暗藏的匕首就被小倪“下”了下来。

除了倪伟福，还有两名姓张的中年汉子负责“室外警卫”。此两位均是本村农民，前年应刘希贵之邀，到此“任职”。白天，他们忙于农家活计，晚上到刘家。他俩不进屋，只是在院子内巡逻。遇有生人进院，他们便从暗处走出来。

远近都有传言，说刘希贵花高价雇保镖。实际情况是：前年正式开雇保镖，刘希贵每个月付给保镖每人100元。前一段时间，刘希贵主动将每月报酬提高到150元。对此举，他解释道：“物价不是也涨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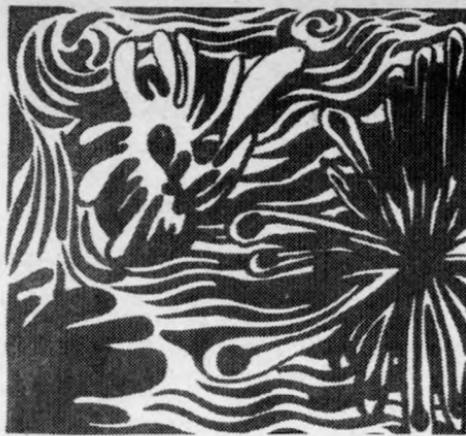
刘希贵与3位保镖之间的关系处得很好。相互间有什么为难之事，并不避讳，互相商量，互相帮助。3名保镖每天自觉地在天黑之前到“岗”。两位姓张农民的晚饭和早饭均在家中吃，而倪伟福则随便一些，有时在自家吃，有时在刘家用餐，也不特做。

倪伟福住的房间很宽敞，室内还摆着一套很时髦的组合家具。那是刘家专为他备的。

刘希贵关于雇保镖的一套理论耐人寻味：刚开始时，人们都感到别扭，也不叫什么保镖，叫守卫，叫打更的。后来，社会上有人经常这样叫，我们也就不在乎了。现在，国内许多城市不都成立保安公司了吗？咱老百姓管它叫哪局，保安人员自然也就是保镖了。当然，两者是有区别的，但大家咋顺口就咋叫了，谁也犯不上去解释清楚。我是这样想的，国家的政策不是允许私人雇工吗？于是，我就雇用了他们。至于让他们为我看家护院，这也是一种劳务。开始，我怕人说我雇保镖。现在，尤其是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保护私营经济后，我已无所顾忌了。相反还时常在公开场合自我宣传，让人们知道我雇了保镖。

10年前，他还是一个极普通极贫困的农民。如今他是一个需要保镖的百万富翁，而我们需要思索的是：他雇保镖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背景。

(图：韩磊)



迪·博诺的思考术

●姚诗煌

思考是人的一种本能，通过思考，人类才创造出今天地球的灿烂文明。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尽管他们天天都在思考，却可能是不善于思考的人。

迪·博诺是个会思考的人。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对思考技术的研究，迄今已出版了25本著作，被译成21种语言。他是如何看待思考和怎样思考的呢？

聪明不等于会思考

人们常常爱说“谁聪明，谁不聪明”，其实，聪明并不等于会思考。许多很聪明的人，在思考方法上很差劲。如果自以为聪明，不掌握思考的方法，还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变成十分愚蠢的人。在加拿大曾有人作过试验，把一些智商很高的学生集中起来，教了6年，结果发现，他们在思考上并不显得比别人出色。所以，迪·博诺说，一个人很聪明或智商很高，只是说明他有创造的潜力，但并不说明他很会思考。智力和思考的关系，就好比一辆汽车同司机驾驶技术的关系，你可能有一辆很好的汽车，但如果驾驶技术不好，一样不能把车开好。相反，你尽管开的是一辆旧车，然而驾驶得高超，照样能把车子开好。因此，智力作为头脑的潜力，必须通过思考这个“头脑的操作过程”才能发挥出来。这表明思考是一门技术，可以通过后天教授、训练、培养出来的。

尤伯罗斯的成功奥秘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本来预计要耗费5亿美元的资金，可结果不仅分文不补贴，还盈余2亿美元。

为此，组织者彼得·尤伯罗斯名声大噪。奥秘何在呢？尤伯罗斯透露道：他是用了迪·博诺教授的“水平思考法。”

什么叫“水平思考法”？譬如说挖洞，一种方法是盯住一个地方，埋头往下挖，找不到宝还往下挖；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同的地方挖。前者是垂直思考法；后者则是水平思考法，若用中国成语来说，就叫“另辟蹊径”。文能活跃思路，激发创造力。迪·博诺说：头脑的思考过程，很容易循着自己形成的规则、模式去进行。这种规则性的东西，是很有用的，没有规则，就会思路紊乱，理不出头绪。然而，只是循规则思考，就会因循守旧，没有创造性。因为，在A→B的思考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岔道，只是习惯于沿着正常的思路走时，往往看不到这些岔道，而这些岔道很可能是通向创造性的所在。水平思考法就是帮助思考者去发现通向创造性思维的岔道。迪·博诺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一次他给一批小朋友出了个题目，如何测量一幢高楼的高度？小朋友纷纷举手发言，有的说可以到最高一层放下一根绳子着地，再量一下绳子的长度就知道了；有的说只要量一层的高度，再乘以层数；还有的说可以用几何方法等等。这时，一个小朋友忽然说，还可以把房子推倒在地上量。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迪·博诺却肯定了这个想法，认为这才是别出心裁，而别的方法都没超出常规。当然，房子是用不着推倒的，只要稍加修改测定方法就行：在距房子10米处的地上画一个白点，然后把房子和白点拍在一张照片上，在照片上用尺一量，马上就可以称出房子的高度了。这不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测高方法吗？所以，水平思考法就是要提倡从常规思路中走出来，寻找新的思路。

迪·博诺认为，这种创造性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的。他分析了创造性的产生，大致有3种类型：第1种是无知导致的创造性。因为不懂别人已有的方法，反而常提出别人没有想到的方法。这种情况在刚进入某个领域的新手或者孩子身上经常发生，所以不要压抑新手和孩子的创见，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种是放松带来的创造性。旧的知识会把创造性压抑起来，这时通过放松，就能把创造性释放出来。当然这种放松，不是一般的精神放松，而是抑旧放新，让大脑潜意识中具有创造活力的意识活动显示出来，发挥出来。第3种则是借助思考方法产生的创造性。如有一些人的创造性，往往来自偶然的错误，反从常规的思路中跳了出来，而当我们掌握了思考技术，就可以不必依靠偶然性或犯错误，而直接走向创造的道路。

揭开石像之谜

复活节岛是一个神奇的岛。当航海家们第一次踏上这个荒凉的小岛时，沿海整齐排列的神情肃穆的石像使小岛充满了神秘的气氛。石像都用整块巨石雕成，最大的高十几米，重数百吨。石像头上的石冠也有好几吨重。而岛上只有几千个居民，使用着原始的石器工具，没有铁器，没有锄头，没有吊车，即使他们能制造出这些石像，又是如何搬运并树立起这些石像的呢？

瑞士著名的宇宙考古学家丹尼肯认为，复活节岛远离大陆，不可能是别的民族前来建造，土著居民又很原始，也不可能有能力建造。他认为，神通广大的宇宙人可能来到过这个小岛，是他们建造了石像。

美国考古学家穆罗来到岛上考察，见岛上有古代的采石场，有没有完工的石像，他相信是古代的人们用原始但却聪明的方法制造的。他判断岛人尽管无法举起石像，但是却能利用斜坡把石像头足倒立着拉上坡顶，然后再让石像底部落下。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把石冠放到石像头上，最后运走泥土，石像就巍然挺立。

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说，穆罗用人工造起斜坡，用岛上的纤维做的绳子和古代的工具竖起了7座石像。这7座石像有力地证明了古代岛民自己建造石像的可能性，从而揭开了一个撩人心智的谜。

还有许多谜

模拟考古取得了许多出色的成果，揭示了许多历史真相，如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对古代制造木乃伊的方法进行模拟实验，重新掌握了制造木乃伊的诀窍；英国历史学家耶脱，用大象远征的模拟实验证实了公元195年迦太基军队翻过雪线远征罗马的历史。考古学家沃特曼用模拟古代秘鲁人制造汽球的方法来说明原始人如何绘制巨大的纳斯卡图案……

但是，还有更加艰巨的课题。比如说，古代中国人远航美洲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谜：在秘鲁，发现过一尊女神铜像上铸有“武当山”3个汉字；墨西哥有“大齐田人之墓”的石碑……考古学家推测，周朝灭商，殷人纷纷入海逃逸，此后也许还有人向往淼淼海洋中的仙山而远航，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可能经琉球，沿日本列岛向东向北，过阿留申群岛到达加利福尼亚，再沿美洲海岸抵达墨西哥、秘鲁一带。如果现代的探险家能模拟古代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就可能回答这个历史悬案。此外，日本考古学家正在模拟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条件，用原始方法建造一座新的金字塔，如果用模拟方法造出了金字塔，金字塔建造之谜也就解开了。



●朱长超

寻找历史的真实

时光的流转，常使历史的真实面貌只留下一点痕迹，以致有些历史变得朦胧起来，有些历史被扭曲了，有些历史变成了谜。该如何透过时光的迷雾，看到这些历史的真相呢？模拟考古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神话的真实

在南太平洋的茫茫波涛中，有一个波利尼西亚群岛，岛上生活着纯朴、原始的波利尼西亚人。波人的起源是一个人类学之谜。波人是土生土长的吗？不是。考古表明，波岛上有人的历史才1000多年，说明波人是外来的。但是，波岛离亚洲、非洲、澳洲、美洲各有3000多海里，而波人还处于原始时代，只会使用石斧，只能制造独木舟，他们怎么能漂洋过海呢？

挪威海洋考古学家海尔达尔决心找出答案。他发现，波人有一个古老的神话，说有个神带领他们漂洋过海从东而来。而在秘鲁的印第安人那里，也有同样的神话，一个同样的神率领他们漂洋西去。神话是历史的投影，它很可能反映着某种真实。海尔达尔进一步发现，波人与秘鲁印第安人用同样的土灶煮饭，用同样的方式制造木乃伊。这说明波人很可能起源于秘鲁。海尔达尔又从古代秘鲁的墓碑上看到了一种古老的木筏，筏上有帆，他推测波人可能是用这种木筏漂洋过海的。他用原始的方法造了一个木筏，模拟古代的条件和方式，不用一个铁钉，全用藤条和纤维捆扎。海尔达尔与同伴从秘鲁海岸出发，经过100多天的漂流，来到了波岛。波岛老人们看到他乘筏而来，激动地说，他们看到了关于自己起源的一个真实的神话。

1 致富受挫怎么办?

2 学会“放松术”

1

编辑同志:

我苦苦经营了两年的工厂,由于经营不力破了产,负债4万元。现在,新婚的妻子离我而去,债主天天上门。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际,我该怎么办呢?

河南 张保

张保同志:

你是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农村青年。看了你的来信,使我想到一位和你有过同样命运的青年。他叫邱黎桃,今年27岁,是湖南常德县金仁村的回乡青年,照片上这位凝神遐思的小伙子就是他。

1984年粮食丰产,小邱眼看乡亲们的余粮卖不出去,就联合两户村民,办起了小酒坊,当年赢利上万元。1985年他用带股进厂的办法,集资10万元,办起了白酒酿造厂,创产值80万元,赢利16万元。正当他放手大干的时候,由于不懂法律,被皮包公司骗去了40万元,酒厂濒临破产。沉重的打击使邱黎桃陷入绝境。他曾同死神握过几次手,但最终他战胜了自己,从失败走向了成功。

邱黎桃说:“面对失败,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垮,关键是战胜自己的绝望情绪,总结失败的教训。”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小邱找到当地有名的律师为法律顾问,半年内,就连回欠款18万元。加上他四处筹集资金、贷款,使厂子度过了难关。

产品是工厂的命根子。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邱黎桃也没有忘记开发新产品。他从河南高薪请来了四代行医的退休老中医李车舒,用家传秘方,将30多种药,配制成一种叫“康寿龄”的药酒,经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和临床证明,“康寿龄”具有舒经活血、强身壮体、益寿延龄的功效,是医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良药。“康寿龄”深受湖区、矿山等地群众欢迎,使他的工厂信誉剧增。

小邱没有停步,他继续开拓前进。当他获悉,中国环境保护公司、东方卫生保健制品研究中心共同研制了环境保护保健饮料——“百龄



可乐”,就马上赶到北京亲自考察。得知这种饮料具有生津止渴、润喉利肺、保肝解毒、消除疲劳、调整代谢、增强体质的功能,小邱果断决定引进,办起了湖南常德金城玉液饮料厂。现在年产“百龄可乐”250吨,由于价格低廉,很受欢迎,被群众称为“中国的可口可乐”。邱黎桃的企业兴旺发达,他也成了很有管理才能的厂长。

邱黎桃的成功说明,只要有信心,敢奋斗,就能战胜厄运。希望你从小邱转败为胜的经验中受到启发。

赵玉强

2

编辑同志:

我好不

容易才说服

父母,同意我今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我好不容易才央求老师,同意我回校重读。为的全是今年的“决战”。

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整日的头痛搅得我看不了书。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要我休息。“休息”对我意味着什么?编辑同志,您可以想像我有多么心焦……

河北 王芳

王芳同学:

安慰的话不再说了。我拿不出医生那样的“药方”,但可以介绍你几条“放松术”。

第一,学习50分钟后,一定要休息10分钟。5:1是绝对必要的。舍

不得1,就得不到5。大脑需要这样一种调节。

第二,午饭后,晚饭后,各听20分钟音乐,要轻音乐,立体声效果更好。娱乐的价值远远不在娱乐本身。大脑需要这样一种过滤。

第三,打破“三点一线”(教室、食堂、宿舍)的生活范围,要扩大到四点、五点。球场算一点,草坪也可以算一点。大脑希望接触“多颜色”。

第四,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找个人少的地方“放肆”一下。可以跳,可以唱,可以手舞足蹈。每天“浪漫”一会,大脑就没意见了。

决战前夕,紧张是通病,谁会“放松”,谁就能成功。

王雁

主持人林兵：今年第四期刊登了一位女工的来信，因她一月只有40几元工资，拾到个体户的提包便没有归还，并讲了一番不平的理由……这封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截止5月20日，我已收到400多位读者的来信，现选登几封，供大家讨论。

假如我拾到孔先生的提包，也会像这位女工一样的。这是目前分配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就拿我这个教师来说吧，一个

月的奖金还不如个体户一个晚上的收入，难道我们的劳动就这么廉价？难道个体户的贡献就比我们大这么多？难道同他们相比，我们这些一心教书育人者就缺乏开拓精神？个体户的桌上鸡鸭鱼肉，教授的锅里青菜萝卜，这真是极大的讽刺。即使如此，我们每天还要在课堂上大

假如我

拾到提包……

了它对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是认为改革会给每个人带来同等的好处。一旦发现自己吃了亏，立刻便会转为愤愤不平。第2，我们不能仅仅把收入作为公平的唯一砝码。仅仅追求表面上金钱的公平，恰恰是一种不公平，势必使我们一“钱”障目、不见现代化这座泰山。

其实，改革的目的是使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讲社会的合理公平。有个学生问我：现在是不是越自私的人越发财？我无言以对。它起码表明了我们目前分配体制的混乱，各行业间的劳动还缺乏一个公平的价值尺度。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认真的思考：我们的分配是不是越来越偏离了按劳分配的轨道？难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急功近利，纷纷涌向简单劳动？这种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必然会引起更多的人愤愤不平。浙江省嘉兴市 梅子实

使大家通过平等的竞争，带来民族共同富裕。如果仅以个人的利害得失来衡量，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公平的准绳。

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平只能看个人的价值能否得以实现。就拿我来说吧，尽管个体户挣钱很多，但我也不会去干的，因为我觉得这难以实现自我价值。

北京 郭钧

不能一“钱”障目， 不见泰山

这位女工的来信，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1，许多人对改革期望甚高，并不是看到

关键是

机会均等

目前，人们对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议论较多。大多数人评价收入差距的方法是：单纯比较收入的多少。这种方法往往不问劳动投入的多少、产生结果的好坏，来评价差距是否合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平均主义。这位女工的不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这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正确评价收入差距的方法应该是以收入指数为比较指标，看每个人的收入指数是否相等，即：
$$\text{收入指数} = \frac{\text{收入}}{\text{投入} \times \text{机会}}$$
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当他觉得自己的收入与投入大体相等时，才会感到

合理，只有当与其他人获得的机会相等时，才会感到公平。因此，我们应该强调的不应是收入的相等，而是收入指数的相等。

当然，我国目前收入指数是不相等的。而导致不合理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机会不均等。因为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双轨制的情况下，还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国家政策有很大不同，这对于全民所有制与个体或私营企业就是不同的机会。如价格，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定价权，而个体或私营企业可自由定价，价格机会不均等，竞争关系受到扭曲，反映在分配上，就不能获得相同的收入。个体或私营企业收入偏高，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这种双轨制的经济体制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就必然存在。

可见，造成不公平的首先不是收入差距本身，而是导致这种差距的客观条件。因而一味地埋怨个体户赚大钱，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要消除不公平，重点在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在同一市场展开竞争。

尽管合法的收入无可非议，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种种议论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个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问题。那位女工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接受不了收入差距太大这样的事实所致。因此，改革既要立足于长远目标，又要适当照顾眼前的矛盾。因为能否产生高的经济效率，与这种承受力密切相关。

当然，我国政策的立足点仍应是：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 武汉 肖玉明



1 致富受挫怎么办?

2 学会“放松术”

1

编辑同志:

我苦苦经营了两年的工厂,由于经营不力破了产,负债4万元。现在,新婚的妻子离我而去,债主天天上门。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际,我该怎么办呢?

河南 张保

张保同志:

你是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农村青年。看了你的来信,使我想到一位和你有过同样命运的青年。他叫邱黎桃,今年27岁,是湖南常德县金仁村的回乡青年,照片上这位凝神深思的小伙子就是他。

1984年粮食丰产,小邱眼着乡亲们的余粮卖不出去,就联合两户村民,办起了小酒厂,当年赢利上万元。1985年他用带股进厂的办法,集资10万元,办起了白酒酿造厂,创产值80万元,赢利16万元。正当他放手大干的时候,由于不懂法律,被皮包公司骗去了40万元,酒厂濒临破产。沉重的打击使邱黎桃陷入绝境。他曾同死神握过几次手,但最终他战胜了自己,从失败走向了成功。

邱黎桃说:“面对失败,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垮,关键是战胜自己的绝望情绪,总结失败的教训。”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小邱找到当地有名的律师为法律顾问,半年内,就追回欠款18万元。加上他四处筹集资金、贷款,使厂子度过了难关。

产品是工厂的命根子。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邱黎桃也没有忘记开发新产品。他从河南高薪请来了四代行医的退休老中医李车舒,用家传秘方,将30多种药,配制成一种叫“康寿龄”的药酒,经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和临床证明,“康寿龄”具有舒经活血、强身壮体、益寿延龄的功效,是医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良药。“康寿龄”深受湖区、矿山等地群众欢迎,使他的工厂信誉剧增。

小邱没有停步,他继续开拓前进。当他获悉,中国环境保护公司、东方卫生保健制品研究中心共同研制了环境保护保健饮料——“百龄

可乐”,就马上赶到北京亲自考察。得知这种饮料具有生津止渴、润喉利肺、保肝解毒、消除疲劳、调整代谢、增强体质的功能,小邱果断决定引进,办起了湖南常德金城玉液饮料厂。现在年产“百龄可乐”250吨,由于价格低廉,很受欢迎,被群众称为“中国的可口可乐”。邱黎桃的企业兴旺发达,他也成了很有管理才能的厂长。

邱黎桃的成功说明,只要有信心,敢奋斗,就能战胜厄运。希望你能从小邱转败为胜的经验中受到启发。

赵玉强

2

编辑同志:

我好不

容易才说服

父母,同意我今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我好不容易才央求老师,同意我回校重读。为的全是今年的“决战”。

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整日的头痛搅得我看不了书。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要我休息。“休息”对我意味着什么?编辑同志,您可以想像我有多么心焦……

河北 王芳

王芳同学:

安慰的话不再说了。我拿不出医生那样的“药方”,但可以介绍你几条“放松术”。

第一,学习50分钟后,一定要休息10分钟。5:1是绝对必要的。舍

不得1,就得不到5。大脑需要这样一种调节。

第二,午饭后,晚饭后,各听20分钟音乐,要轻音乐,立体声效果更好。娱乐的价值远远不在娱乐本身。大脑需要这样一种过虑。

第三,打破“三点一线”(教室、食堂、宿舍)的生活范围,要扩大到四点、五点。球场算一点,草坪也可以算一点。大脑希望接触“多颜色”。

第四,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找个人少的地方“放肆”一下。可以跳,可以唱,可以手舞足蹈。每天“浪漫”一会,大脑就没意见了。

决战前夕,紧张是通病,谁会“放松”,谁就能成功。

王雁

主持人林兵：今年第四期刊登了一位女工的来信，因她一月只有40几元工资，拾到个体户的提包便没有归还，并讲了一番不平的理由……这封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截止5月20日，我已收到400多位读者的来信，现选登几封，供大家讨论。

假如我拾到孔先生的提包，也会像这位女工一样的。这是目前分配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就拿我这个教师来说吧，一个

月的奖金还不如个体户一个晚上的收入，难道我们的劳动就这么廉价？难道个体户的贡献就比我们大这么多？难道同他们相比，我们这些一心教书育人就缺乏开拓精神？个体户的桌上鸡鸭鱼肉，教授的锅里青菜萝卜，这真是极大的讽刺。即使如此，我们每天还要在课堂上大

假如我

拾到提包……

讲社会的合理公平。有个学生问我：现在是不是越自私的人越发财？我无言以对。它起码表明了我国目前分配体制的混乱，各行业间的劳动还缺乏一个公平的价值尺度。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认真的思考：我们的分配是不是越来越偏离了按劳分配的轨道？难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大家急功近利，纷纷涌向简单劳动？这种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必然会引起更多的人愤愤不平。浙江省嘉兴市 梅子实

不能一“钱”障目， 不见泰山

这位女工的来信，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1，许多人对改革期望甚高，并不是看到

了它对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是认为改革会给每个人带来同等的好处。一旦发现自己吃了亏，立刻便会转为愤愤不平。第2，我们不能仅仅把收入作为公平的唯一砝码。仅仅追求表面上金钱的公平，恰恰是一种不公平，势必使我们一“钱”障目、不见现代化这座泰山。

其实，改革的目的是使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使大家通过平等的竞争，带来民族共同富裕。如果仅以个人的利害得失来衡量，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公平的准绳。

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平只能看个人的价值能否得以实现。就拿我来说吧，尽管个体户挣钱很多，但我也不会去干的，因为我觉得这难以实现自我价值。

北京 郭钧

关键是 机会均等

目前，人们对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议论较多。大多数人评价收入差距的方法是：单纯比较收入的多少。这种方法往往不问劳动投入的多少、产生结果的好坏，来评价差距是否合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平均主义。这位女工的不平，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这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正确评价收入差距的方法应该是以收入指数为比较指标，看每个人的收入指数是否相等，

即：
$$\text{收入指数} = \frac{\text{收入}}{\text{投入} \times \text{机会}}$$
，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当他觉得自己的收入与投入大体相等时，才会感到

合理，只有当他与其他人获得的机会相等时，才会感到公平。因此，我们应该强调的不应是收入的相等，而是收入指数的相等。

当然，我国目前收入指数是不相等的。而导致不合理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机会不均等。因为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双轨制的情况下，还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国家政策有很大不同，这对于全民所有制与个体或私营企业就是不同的机会。如价格，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定价权，而个体或私营企业可自由定价，价格机会不均等，竞争关系受到扭曲，反映在分配上，就不能获得相同的收入。个体或私营企业收入偏高，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这种双轨制的经济体制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就必然存在。

可见，造成不公平的首先不是收入差距本身，而是导致这种差距的客观条件。因而一味地埋怨个体户赚大钱，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要消除不公平，重点在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在同一市场展开竞争。

尽管合法的收入无可非议，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种种议论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个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问题。那位女工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接受不了收入差距太大这样的事实所致。因此，改革既要立足于长远目标，又要适当照顾眼前的矛盾。因为能否产生高的经济效率，与这种承受力密切相关。

当然，我国政策的立足点仍应是：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武汉 肖玉明



贾东升来信呼吁——

还我产权

本刊记者

● 李 军 姜万信

贾东升说：他们踢个体户的摊子，抢个体户的篮子。

今年3月，河南省南阳市青年贾东升的来信，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信中说：“我于1985年辞去正式工作，自筹资金和设备，创建了一个小型企业，主营销售我发明的专利产品——方便被。企业挂靠于地区科技开发中心。建厂后，由于销路没有打开，生产一直不景气。时至1987年初，正当我厂刚刚转向盈利时，中心经理杨国定却提出要将我厂收归中心所有，被我拒绝。杨经理说：‘你同意，这个厂得收，不同意，也得收。’果然，时隔不久，杨国定便带人到我家宣布，撤销我的厂长职务，并把我家变成了中心的直属厂。就这样，我个人辛苦创办的企业，被中心强占去了……”

经核实，贾东升说的基本是事实，可他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

接到贾东升的来信，我们认为，这是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于是赶赴南阳，走访了与此案有关的方面。

1985年，24岁的贾东升，主动辞去县供销社的正式工作，与南阳地区科技开发中心签订了联营办厂协议。协议规定：乙方（贾东升）开办方便被服厂，附属甲方（中心）。乙方经济上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人员自行安置，每年向甲方上缴税后利润的10%。甲方有协助乙方打开产品销路的义务……企业性质，个人与集体联营。

看来，毛病首先就出在这个协议上。又是个体，又是集体，又是附属，又是独立。怪不得当地一位干部这样评论它：“非驴非马非骡子，媳妇的财产嫁到了婆家，到底归媳妇，还是归婆家，谁说得清？”

另一位干部则这样说：“这份协议一签，杨国定就被装到‘兜里’了，贾东升既用中心这块招牌赚钱，又让你管不着，那10%还不是他想给则给，不想给就不给？”

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杨国定可不是傻瓜，他出了这块招牌，是把它当成了‘财神’卖。现在是‘一方土地’就得享受‘一方香火’，你不烧香纳贡，就得踢你的摊子。”

带着这些议论和疑问，我们找到了中心经理杨国定。经核实，贾东升的来信是基本属实的，可问题的另一半贾东升没有说……

杨国定说：“我们不能让贾东升打着我们的招牌骗钱！”

见到杨国定时，他的心情很不好。联营办厂时，他与贾东升签定了协议，本来是想一举数得的。既为中心扩大影响，又可获得经济效益。可是没想到，鸡飞蛋打，不仅分文未得，还惹出了这场打不清的官司。最近，他已被免了职，这不能不说是与他办厂不力有关。

“办厂时，我们都很糊涂。”杨国定说：“只有一个好的愿望，不仅要生产方便被，还要生产方便衣裤。可谁知，从招工开始，贾东升就吹得很大，说什么地区科委下属企业，可以农转非，还收了工人合同保证金近5万元。一个70多人的小厂，他竟设了七八个科室，一人兼任厂长、会计、出纳。开工几个月，工人拿不到工资，便纷纷找到中心哭闹。外单位要账的也追着他们屁股。为了这，我多次找贾东升，苦口婆心地跟他讲，可他说他签了协议，这里的事就由他负责。我说你负责，可人家告状，还不是找主管单位？就这样，拖到去年初，法院判贾东升还账，扣押了厂里的产品，我们才下决心撤销贾东升的职务……”

摊子、篮子到底是谁的？

杨国定说的也是事实，他道出了问题的另一半。听起来似乎贾东升经营不善，又不服从中心管理，撤他的职收他的厂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按照协议，中心并没有过问企业经营的权利呀！谈到这个问题，杨国定一语带过：“协议就是那么回事。”对此，一位地区干部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宪法不是都可以修改吗？协议也不是死的。”倒是贾东升说得理直气壮：“就算我有一千条毛病，可工厂是我办的，法人代表是我，经营风险由我承担，即使倾家荡产，也不会有人替我还一分钱。中心一没出人员，二没出资金，三没出场地、技术和设备，有什么权收我的厂？可法律明明摆在哪儿，有些人就是瞪着眼不照办。我的营业执照逾期未换，按工商条文规定，应予罚款，我也认罚。可他们偏偏晚上把我传到派出所，强行收缴我的公章和执照，明明是我发明的专利，可中心收厂后，却偷偷生产销售，为什么在南阳，总有那么些人不依法办事？”

如今，中心把贾东升原来的摊子变成了新的直属厂，换上了中心的法人代表。这场官司打来打去，竟出现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三方同时向法院起诉。原厂的工人告贾东升，收了合同保证金至今未还；贾东升则告中心侵犯了他的产权，使他无法生产还债；而中心则反告贾东升违约，骗取工人的合同保证金。据了解，南阳市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一案件。对此，贾东升信心十足，他说：“这场官司，

我肯定赢！”而行署信访办的梁主任却对我们介绍：“法院本来准备制裁贾东升，但担心抓了他，工人的钱还不上，所以至今还未裁决……”

我们认为：贾东升的毛病固然不少，但产权毕竟是他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回到北京，我们带着这场众说纷纭的官司，走访了全国工商总局。据工商总局的同志介绍，目前此类纠纷甚多，它是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防止集体或国营企业强收个体户产权，工商总局特发了319号文件。今后此类联营一律不准再搞。个体就是个体，集体就是集体，既不允许个体打着集体的招牌，也不允许集体把自己的招牌出卖给“个体”。至于说产权问题，原则上讲，谁出的资金，谁配备的人员，谁提供场地和设备，谁承担企业风险，产权就理应由谁。由此看来，产权自然是贾东升的，中心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

在调查中，我们自然注意到，贾东升的确有很多毛病。“自以为是，好耍小聪明，经营无方”等等。但毛病与产权毕竟是两回事，毛病归毛病，产权归产权。在经济规律面前，谁的毛病多，谁就必然自食其果；亏损、倒闭、甚至去坐牢……但作为协议的另一方，有什么权利因为对方的毛病多，就将企业收归己有呢？其实，中心正是抓住了贾

东升的毛病，大作了文章。如果他没有这些毛病，中心收厂，一看便知侵权；难道他有了毛病，收他的厂就不是侵权吗？

尽管杨经理有他的道理，但这只是人们习惯了的道理而已。我们强调的是依法办事，这在目前经济生活中尤其重要。面对要账的，告状的，杨经理是否可以“去找贾东升，去上告法院”呢？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因为根据协议，中心不负任何经营责任，因而也就没有同样的管理权。中心作为主管单位，是否就该什么都管呢？还是根据协议该管的管，该谁负责就谁负责？相比之下，哪一个更符合改革的精神？

贾东升近况：又成了南阳“第一个”。

企业被强行收归后，贾东升为了自己的产权四处上告，一年多来，奔波于各级法院，走遍了有关部门，但是结果依旧。如今，为生活所困，他在法院对面开了一家小店，专门替人代笔诉讼，据说一天能有1元钱的收入，用来维持生计。3年前，他是南阳地区第一个获得国家专利的人，现在他又成了南阳市第一个替人代笔打官司的人。这一点，连他自己说起来也好笑，自己的官司打得一塌糊涂，反倒替别人打起官司来。不过他说：“我相信法律！”



愿友谊天长地久

——封面赏析

●紫 汕

也许是相聚，也许是分手；

也许你来自天边，也许我来自

海角；也许我们挥手在初春，

也许我们离别在深秋。月亮有阴晴圆缺，友谊却天长地

久……

让我们为友谊干上一杯，心灵的撞击要比这酒杯的撞

击更清脆；情感的甘露要比这橙红的酒浆更醇厚。醉——

这是至真善至美的甘露。醉——这是最真最善最美的情

感。青年朋友，让我们举起酒杯，为友谊，为相聚，为分

手，干一杯，让人生的甘露沁满心头。

二

生活是美的，然而人们仍向往美的艺术。生活中无时不有的友谊，生活中千百次的碰杯，平凡而繁杂，然而人们仍希望看到表现友谊的艺术。

艺术是凝练，是集中，是升华。

“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诗人的千古绝唱。

摄影有着自己特有的摄影造型语言，这一对相对无言的剪影，这两杯红酒醇厚透明——如此简洁，如此集中，如此意味无穷……

三

显然，作品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刻意求工的。显然，作者不是偶逢机遇而是匠心独运的。

作品以残缺表现完整，人物仅仅是个意象的符号，酒杯自然成为视觉兴趣中心。

作品以简明表现丰富，人物轮廓如同装饰画框，却引来人们无穷遐想。

作品以静表现动，人物处理成剪影，不仅是为了简洁，而且衬托出酒杯的玲珑剔透。

作品以淡雅表现浓厚，背景的明快，酒杯的透明带给人们对深情厚谊的联想。

作品以静表现动，默默无言，酒液不兴，这是强烈感情波涛的前奏或延续。

残与整，简与繁，暗与明，淡与浓，静与动，对立而统一，这是艺术辩证法的魅力所在，也是摄影艺术造型语言的魅力所在。

迁址公告

中国青年杂志社今年6月迁至北京丰台区广安路小井318号。电话中横线：3062288。电报挂号：6125。邮政编码100071。

特此公告。

口吃,口吃!

口吃,真...真...真痛苦,需要早治疗
口吃,口吃,口吃,讲话结结巴巴

请用 电子口吃矫正器

同...同...同志,您好!朋友,当您连问句都困难时,您为患有口吃(结巴、刻巴、急老巴)而烦恼、悲伤。我厂专此研制生产的“电子口吃矫正器”,经省级医院临床验证和广大口吃患者使用证明,疗效显著,是口吃患者获得语言新生的良好工具,产品已通过省医药管理部门鉴定,与会医学专家一致认为,它是国内治疗口吃方法上的一大创新。电子口吃矫正器生产以来,荣获浙江省名、优、新、特产品“金鹰奖”,省青年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家家乐”全国创新发明三等奖。我厂备有介绍“电子口吃矫正器”资料,来信必复,欢迎来信。(随信请附邮票一角)

该产品畅销全国三十省市,远销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意大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食用菌函授班招生

食用菌当前畅销国内外市场,它营养丰富,为食用之佳品。栽培食用菌成本小,收益高,是一项新型的家庭副业。栽培原料广泛,稻草、杂木屑、棉籽壳、农作物秸秆等任意一种原料即可,一年四季均可栽培,全国各地均适用。

利用12平方米的面积,40~50天可收干银耳200~250斤,木耳150~200斤,价值过千元,菇类斤料产斤菇。在城市栽培食用菌,即能美化环境,供你欣赏,又能改善生活,供你食用,业余时间即可种植。在农村年产量较大的农作物秸秆、稻草即可培植出较好的食用菌,为你增加可观的收入。本校已栽培办校多年,为全国培养出几万名学员。我校为全民快速致富,将继续举办函授班,向广大传授银耳、黑木耳、猴头、平菇、香菇、凤尾菇、灵芝的栽培和制种技术,函授费12元,邮局汇款,款到发资料,一次发清,资料全部铅印,通俗易懂,并配有图解和疑难问题解答,按资料操作保你成功。本校函授班常年开办,严谨教学,讲究信誉,通信迅速,教材配套完整,并有专职教师辅导,负责学员咨询,学期不限,学会为止,优先供应学员菌种和工具。



浙江省天台凯迪新兴工业实验厂

址:浙江天台县中山东路272号 电话:727 电挂:8855

地址:山东省曹县袁辛楼乡食用菌专业学校
联系人:袁照生



为您服务 为您提供

快速冷热淋浴器

调节开关 电源220V

地线



本器采用先进技术和优质材料制成,能代替锅炉供应热水,适用于家庭、厂矿、医院、机关、旅馆等作为洗头、淋浴、医疗卫生之用。自来水进入本器即能自动通电,10秒钟后连续流出热水(水温36~62℃),对人体绝对安全,耗电极省。凡有220V电源与自来水的单位、家庭均可安装使用。无自来水地区把水箱升高3米以上即可使用。本器带有小喷头及易损件一套。

▲出厂单价:24元。▲个人邮购请

从邮局汇款,每只价26元(含邮资)。

▲购一包装10只以上免收邮费,欢迎经销单位订购。

·现货供应·代办邮寄·保用半年·款到发货·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合格承认学历

法律大专自学教材全套邮购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无需入学考试,不受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的限制,只要按规定的学习计划安排自学,经过各省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国家承认其学历。法律专业(专科)依照“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考试计划”指定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基础理论》……等十四门课程。其毕业待遇与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相同。

福州文教书店依照法律专业全国自学考试计划指定教材及全套各科自学考试大纲,为自学者办理配套邮购服务。凡欲参加法律自学考试的,请通过邮局汇款60元(包括考试计划、全套考试大纲及教材和全部挂号邮费),到福建省福州市达道路(图书馆院内)“福州文教书店发行部”款到即寄收款凭证及有关说明,并陆续发书,四个月分批发完全套。

主管经理:潘岑

(备有考试简介及购书简章,可寄5角邮资到我店索取,并乐意解答有关问题。)



浙江永嘉县侨中机械实验厂

北京文化艺术学校 表演艺术专业函授招生简章

为了适应现代影视表演的需要；为了尽快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报考高等艺术院校、专业团体；为提高广大艺术爱好者的表演专业水平，特邀首都艺术界表演名家任教，一九八八年度面向全国招收新生。

一、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的具有表演水平的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习，使学员具有一定的表演基础知识和表演基本技巧，较全面的掌握电影、电视表演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有适应现代影视表演技巧的初步能力。根据专业需要，建立学员艺术档案，对坚持学习、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证明其专业进修学历。

二、招生对象和条件：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作风正派、有事业心、有艺术追求、年龄在三十四岁以下的干部、工人及业余艺术爱好者中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均可报考。报名者必须身体健康。

三、招生专业、学制学习内容：

1. 电影表演专业：学制半年，本专业设置电影表演基础知识、电影表演基本技巧、表演艺术专业知识、电影史、中外电影表演流派介绍、学员个人表演训练方法等必修课及“如何当一名合格的电影演员”书面讲座等选修课。2. 影视配音专业：学制半年，本专业设置电影、电视配音基础知识、配音基本技巧、影视配音专业知识、音色的运用、影视配音现状介绍、学员个人训练方法等必修课及“如何当一名合格的配音演员”书面讲座等选修课。

四、教学方式：业余时间学习。每月定时寄发各专业专题教材、指导学习方法、解答疑难问题。期末进行考试。经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证明其专业进修学历。同时发给报考全国各级艺术团体专业人材推荐卡。

五、报名日期：

即日起报名。11月30日止。

六、学费：

每一专业，直至毕业，报名费、邮费、挂号费、讲义费、学费等电影表演专业52元；影视配音专业3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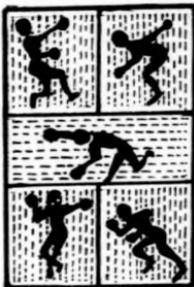
七、报名和录取方法：

报名者需将本人一寸免冠照片两张及学费通过邮局分别邮寄和邮汇至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七条28号北京文化艺术学校招生办公室。请在汇款单上清楚填写姓名、通信地址，切勿电汇。收到汇款后即 will 将录取通知和学费收据寄发给学员。

北京文化艺术学校 拳击函授培训班招生简章

为适应我国恢复拳击运动的需要，

为尽快发现人材，培养人材，造就具有专业水平的拳击运动员，为使广大拳击爱好者了解正确训练的方法，提高广大拳击爱好者的技术水平，特邀拳击界名家任教。一九八八年度面向全国招收新生。



一、招生对象和条件：思想端正，作风正派，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军队、公安、武警干部战士及行业中的拳击业余爱好者均可报名。报名者必须身体健康。

二、学期及学习内容：学期四个月。本培训班系统讲授拳击的基本技术、拳击的战略战术、学员个人训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拳击运动的专项辅助训练方法、拳击运动的辅助课、身体素质的训练方法、练习课示例、学员实战参赛的训练方法和原则等专项知识。

三、教学方式：业余时间学习，每月定期寄发训练与练习教材，指导学习方法，解答疑难问题。通过本学期的教学训练，使学员在短期内迅速掌握拳击运动的技术和战略战术，并全面掌握拳击的实战知识。

四、报名日期：即日起报名，11月30日止。

五、学费：每一学员，直至毕业，报名费、邮费、挂号费、教材费、学费等共45元。

六、报名和录取方法：报名者将学费通过邮局汇至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七条28号北京文化艺术学校招生办公室，请在汇款单上详细填写姓名、通信地址、字迹工整，切勿电汇。

收到汇款后，即将录取通知和学费收据寄发给学员。



Kodak



柯达·倍添欢欣色彩

柯达——1988年奥运会指定胶卷

在天朗气清的日子，与友好把臂同游，
或在喜庆节日，与亲友聚首一堂，把酒言欢，
是人生一大乐事；那张张笑脸，那阵阵喜悦，
教人时刻怀念。要更真实地留住这欢乐情景，
您应使用柯达彩色金奖100或200胶卷。

柯达彩色金奖胶卷采用最先进的药膜
配制科技，使照片的色彩更接近原色。
即使在不同光源下拍出的照片，色彩仍然
保持稳定，鲜艳夺目，影像更加清晰鲜明，
为每张笑脸倍添欢欣色彩。

无论您要拍摄家庭生活照或专业照片，
采用柯达彩色金奖胶卷都那么合适，
那么出色！

柯达

1988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
指定胶卷



国内代号：2-39 国外代号：M8 定价：0.55元

柯达胶卷 奥运显颜色